

## 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及发展前景

【编者按】2018年5月8日，李克强总理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让中日和平友好合作事业再起航》。在中国总理时隔8年再次访日、中日关系出现改善的历史节点上，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认为，重新梳理实现邦交正常化40多年来的中日关系，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检讨两国双边关系中的得与失，无论是对于中国的发展，还是对于东北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人民的福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5月10日，和发中心在京召开了“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及发展前景”研讨会，邀请相关方向的专家学者围绕“中日和平条约缔结40周年与中日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兼谈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角色与作用”、“从日本国内政治变化看日本战略走向及中日关系”、“CPTPP的生效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对未来发展中日关系的思考与建议”等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现将部分发言内容整理刊出，以飨读者。

【关键词】中日关系 日美关系 印太战略 美日同盟 半岛形势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8) 03-0001-29

## 从李克强总理访日看未来的中日关系 ——开创中日新时代“知的外交”

(刘江永,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今年5月8—11日, 中国总理李克强应邀出席在东京举行的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正式访日。这是继温家宝总理2011年5月访日以来, 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日本, 也是中日两国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活动的一场重头戏。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务实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使两国关系重新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未来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打开了前行的通道。

### 一、李克强访日取得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

访问期间, 李克强总理强调, “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 双方都要恪守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 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 维护政治基础, 妥善管控矛盾分歧, 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未来。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多次表示愿正视和反省过去那段历史, 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加以体现。在台湾问题上, 希望日方信守承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双方要共同维护东海局势稳定向好的局面, 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真正视对方发展为机遇, 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在行动中, 使和平共处、世代友好始终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和前进方向”。<sup>[1]</sup>

安倍首相表示, “日方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愿以李克强总理此访为契机, 继承前辈的精神, 持续改善并推进日中关系, 推动将战略互惠关系落到实处, 构筑更加成熟的日中关系。日方愿同中国加强政治互信, 保持高层往来,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日方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

[1] 《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1/content\\_5290028.htm](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1/content_5290028.htm)。

的规定，仅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sup>[1]</sup>

务实合作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支撑，也是这次李克强总理访日的基调。李克强总理提出，中日两国要加强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合作，探讨“一带一路”合作，并发扬民间友好传统，加强文化、地方、教育、体育、媒体、青年等交流，进一步做好拉近民心的工作。安倍首相表示，日本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愿继续推进双方重点领域合作，进一步扩大投资、旅游、文化、食品、减灾、海洋开发等领域交流合作。

中日双方达成以下共识：1. 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基于规则的公正、开放的多边体系；2. 中日两国民间企业联合开展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3. 双方就签署本币互换协议达成原则共识；4. 中日双方恢复高层交往。

在务实合作方面，中日双方签署了十个成果文件，其中包括两项协议和八个备忘录。两项协议是：1. 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社会保障协定；2. 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关于合作摄制电影的协议。八个备忘录是：1.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商务部与日本外务省及经济产业省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事项的备忘录；2.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关于发展服务业产业合作备忘录；3. 中国商务部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关于加强服务贸易合作的备忘录；4. 中国国家林业草原局与日本环境省关于继续实施保护朱鹮合作的备忘录；5. 中国国家健康委员会与日本厚生省关于卫生及医疗科学合作的备忘录；6. 中国海关总署与日本农林产业省关于日本产精米出口备忘录；7. 中国海关总署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关于设立应对日本农产品、食品对华出口放射性物质污染问题联合专家小组的备忘录；8. 中国国防部与日本防卫省有关海空联络机制备忘录。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备忘录》的签署经历了10年谈判，来之不易。其中强调，建立“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意外冲突，防止在海空域的不测事态发展成为军事冲突。该机制主要包括

---

[1]《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1/content\\_5290028.htm](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1/content_5290028.htm)。

三项内容：一是中日防务部门每年相互举行一次局长级或副局长级年度会议及专门会议，对联络机制的运用状况和技术性改善进行协商；二是在两国防务当局之间设专用联络“热线”；三是确定中日军舰、战机一旦相互接近发生紧急状况时的联络方法与规避危险的守则。双方要遵照《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有关规定行事，根据双方所确定的无线电频率，使用英文进行现场通信联络。但由于其中未明确钓鱼岛列岛海域及上空是否包括在内，具体如何落实还有待协商。

## 二、未来中日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未来3-5年，伴随朝鲜半岛南北和解与东北亚大变局，中日关系也将迎来进一步改善的新机遇。首先，中日高层互访日程基本确立。今年秋季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后，日本首相可能应邀访华；2019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2020年，中国领导人可能应邀出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其次，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为中日两国体育、人文交流创造新的机遇。2007年3月26日（距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有一年半时间的时候），以时任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为首的225名日本众参两院议员组成“支持北京奥运会国会议员之会”，与中方共襄盛举。2008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可以期待2020年夏季奥运圣火在东京燃起之际，也将是中日友好与体育盛事相互促进之时。

第三，2022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中日联合声明》签署50周年、中韩建交30周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举办之年、中共将召开二十大并将主办第十一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可以相信，中日、中韩关系均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取得新进展。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也将面临诸多挑战，那些不希望中日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力，必然会明里暗里给中日关系发展制造麻烦和障碍。对此，中国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应对预案。此外，中日关系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仍有可能成为未来中日关系的“定时炸弹”，使两国关系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这些结构性矛盾包括历史认知矛盾、

台湾问题、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与地缘战略认知相关的海洋战略、安全观矛盾、战后国际秩序认知矛盾等。因文章篇幅所限，这里仅就历史观认知矛盾做一分析。目前，中日之间的这一矛盾由于安倍首相的做法有所收敛而稍有缓解，加之钓鱼岛问题的突出而显得相对淡化，但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安倍的历史观、战争观毫无改变。

例如，2014年以后，安倍虽未在任内正式参拜过靖国神社，但每年春季、秋季大祭都以总理大臣身份献上贡品的方式，进行间接变相参拜。他一旦卸任还可能每年前往参拜。另外，日本和歌山县高野町寺庙“奥之院”每年4月29日都会举行所谓“昭和殉难者法务死追悼碑”祭祀，为1,180名日籍战犯招魂，其中包括东条英机等被供奉在靖国神社的14名甲级战犯，公然否定东京审判。安倍晋三曾以日本首相名义发去悼文。

又如，安倍首相2015年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不仅未继承“村山谈话”精神，反而在历史、台湾问题上的表述方面暗藏玄机。安倍谈话称：“我国就上次大战中的行为，反复表示痛切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为以实际行动表明这种想法，心中铭记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台湾、韩国、中国等亚洲邻人走过的苦难历史，战后一贯为其和平与繁荣而尽力”。<sup>[1]</sup>这表明安倍并未对日本当年发动甲午战争以及其后对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做任何反省，而只是铭记别人的“苦难历史”，甚至把台湾与韩国、中国并列，有刻意制造“一中一台”印象之嫌。

安倍还称，“100多年前，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各国的广大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19世纪，以技术的绝对优势为背景，殖民统治亦波及到亚洲。毫无疑问，其带来的危机感变成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动力。日本首次在亚洲实现立宪政治，守住了国家独立。日俄战争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们”。<sup>[2]</sup>安倍的这段话几乎就是靖国神社附近“游就馆”内解说词的翻版，与日本右翼教科书所宣扬的历史观别无二致。其中最后一

---

[1]《安倍发表战后谈话(全文)》，环球网，<http://china.huanqiu.com/hot/2015-08/7279650.html>。

[2] Ibid. 同上。

句话说明，安倍并未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战争史，但却回避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与殖民统治等罪行，而借颂扬日俄战争来美化这段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

再如，尽管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与安倍首相交谈和会晤时，一直强调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重要性。然而，安倍却从未表示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只是就《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做过较为正面的表态。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安倍对1998年中日两国发表的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简称《中日联合宣言》）心存抵触。因为日方只在这一政治文件中明确承认了日本的侵略罪行，并表示反省，称“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sup>[1]</sup>

然而，从安倍在1995年“村山谈话”发表前后的立场和言行不难看出，上述这句话是安倍最不愿看到和认同的。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强调中日双方要遵守前三个政治文件，当然也难以得到安倍首相的赞同。

### 三、共同思考中日关系新时代“知的外交”

中日关系新时代是指21世纪20年代中日两国将进入告别日本侵华战争“四世同堂”的新时期——现实生活中的日本人与其曾祖父那一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毫无关系。然而，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则可能误导未来，而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知道过去的历史给中国等亚洲邻国带来怎样的伤痛。一般而言，不知者不为过，但一个对历史无“知”的日本社会必然对邻国的主张产生民族逆反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的日本人应该认真地了解过去对邻国的加害史，以免重蹈历史覆辙，否则就可能是不知者亦为过。

---

[1] 《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2015-09/15/content\\_36591628.htm](http://news.china.com.cn/2015-09/15/content_36591628.htm)。

作为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安倍的历史观、战争观是从小接受其家族言传身教的结果，是在右翼团体和政治环境中耳濡目染形成的。因此我们看到，安倍一方面确有改善日中关系的需要和愿望，而另一方面对中国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忠告却得过且过。

思想认识问题往往很难通过拒绝来访等方式得到真正解决。相反，要使日本领导人真正理解中国人作为受害者的历史认知，了解其本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对中方的伤害，就应多邀请其访问中国，尤其要欢迎他参观访问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沈阳九一八纪念馆等地。中方可考虑不以安倍首相在参访时道歉、谢罪为前提条件，而只是让他仔细了解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然后让他有一种发自内心慰灵的自然流露，并不再做参拜靖国神社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即可。这将对中日关系的改善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

这是因为安倍本人并不是那场战争的加害者，也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右翼反华分子；因为我们绝不是要为难他，而是要和他打交道；因为他的地位对于日本和中日关系都很重要，而他对中日关系中基本问题的认知却又相当缺乏与负面；因为安倍首相 2016 年访问了美国的珍珠港并致哀，2018 年访问了莫斯科并向无名烈士墓献上花圈，而他却迟迟没有到访他最该到访的地方；因为这不只是针对安倍这一代“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也是针对未来日本“60 后”“70 后”“80 后”“90 后”日本人中可能出现的安倍式领导人的对日新外交。

其核心的关键词不是“批”或“压”，而是“知”，即开创中日新时代“知的外交”。其实，不仅是历史问题，解决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的关键似乎也在于此。这是 21 世纪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一大课题。这首先要求中国人自身要学习、了解和铭记历史，然后才能掰开了、揉碎了，和日本人坦诚交流，友好相处。

【收稿日期：2018-05-27】

## 从日本内政看其对华政策调整

吕耀东（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近来,安倍政府的内政可谓问题重重。随着朝野政党对立激化,关于“森友学园”和“加计学园”问题再次受到在野党追究。为此,急需以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变化、日中韩首脑会谈和缓和中日关系等外交政绩,来对冲内政不力的乱局。从日本政局来看,安倍想摆脱持续发酵的内政丑闻,赢得自民党总裁连任,完成“修宪”战略意图,只能谋求外交层面的政绩突破,而缓和中日关系是其最佳外交选择。

### 一、安倍政府丑闻导致支持率下降及政局不稳

安倍政府有关森友、加计学园问题和自卫队日报隐瞒等政府丑闻接连不断,内阁支持率下跌。关于森友学园问题,已查明确实有中央政府与学园方面围绕出售国有土地、事先进行价格磋商的财务省近畿财务局内部文件的存在。关于加计学园新设兽医系的问题,前首相秘书官柳濑唯夫承认2015年与学园相关人士会面。在野党拟抓住与首相关系亲近的柳濑和加计学园方面的接触嫌疑,凸显围绕加计学园新设兽医系的“首相官邸参与”背景。加之,日本陆上自卫队有关伊拉克战况报告书一直没有向防卫大臣报告事件,反映出陆上自卫队和防卫省在内部管理上存在重大问题,并导致日本国民对于自卫队的不信任感,势必影响安倍首相的修宪步骤。

日本电视台(NNN)于2018年4月13日—15日在全国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首次跌破30%大关,仅为26.7%,这是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创下的最低内阁支持率,较上月减少了3.6个百分点;有34.8%的人要求安倍为自己介入森友学园和加计学园问题引咎辞职。<sup>[1]</sup>日本共同社于5月12日—13日进行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安倍内阁支

[1]《安倍内阁支持率跌至26.7%》，日本新闻网，<http://www.ribenxinwen.com/articles/26132>。



持率有所回升，为 38.9%，较上次民调上升 1.9 个百分点，但不支持率仍为 50.3%；围绕加计学园新设兽医系问题，对于否认安倍参与其中的前首相秘书官柳濑唯夫在国会的说明，表示“无法接受”的比例高达 75.5%；“可以接受”的只占比 14.7%；关于加计学园新设兽医系相关手续，69.9% 的受访者“不认为妥当”，大幅超过“认为妥当”的 16.9%；关于 2018 年 9 月即将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对谁适合担任下一任总裁的设问，选择首席副干事长小泉进次郎的最多，占 26.6%（较上次民调增加 1.4 个百分点），其后为前干事长石破茂 24.7%（减少 1.9 个百分点）、安倍 21.2%（增加 2.9 个百分点）。<sup>[1]</sup>

上述民调反映出安倍内阁的内政问题及解决不力，导致日本政坛正陷入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对抗状态。一方面，在野党认为财务省可能参与了安倍好友购买国有土地、建设学校一事，因此要求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辞职，并以拒绝参与国会法案审议相威胁，甚至准备联合向国会递交“内阁不信任案”。另一方面，联合执政党在国会内占据了三分之二的议席，依仗所拥有绝对的优势对在野党施压。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明确表示，如果在野党继续“捣乱”的话，将会考虑解散国会，重新选举。在日本通常国会召开期间出现在野党拒绝出席的状况，说明安倍政府执政不力和政治腐败，是导致日本政坛运作混乱局面的直接原因。

## 二、内政不力影响日本保守势力“修宪”的战略进程

安倍首相提出，在 2020 年施行修改后的《宪法》，甚至考虑 2018 年年底由国会提议修宪，但一系列政府丑闻导致国会讨论陷入停滞，国民对修宪的认同感也有所下降，保守势力因此处于尴尬境地。围绕自民党修宪条文草案，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保持一贯的谨慎态度，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也加大批评力度。安倍仍在力图推动由国会提议修宪，但具体何时实现则无法预计。

日本众参两院修宪势力占到提议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以上议席优势下，自民党于 2018 年 3 月汇总了集中于 4 个项目的修宪条文草案，具体内容包

[1] 《安倍内阁支持率微升至 38%》，日本共同社 2018 年 5 月 13 日电，<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5/f3f676d61d5d-38.html>。

括将“自卫队存在”明确写入宪法第九条、充实教育、新设紧急事态条款、消除参院选举区的“合区”。自民党党内原本设计的日程方案是，经国会讨论敲定反映其他政党意向的修宪草案，并在2018年秋天的临时国会提议修宪。因为，2019年将迎来4月的统一地方选举和夏季的参院选举，预计朝野双方对立将加剧，此外还有天皇退位等重要日程，这也是修宪势力力争2018年年内实现国会提议的背景。因此，安倍力求尽快向国会提交修宪草案。他称“宪法反映的是国家的理想面貌”，重申了实现修宪的意愿，表明了对在国会深化修宪讨论的期待。不过，他对外宣称，修宪“并没有既定日程”。<sup>[1]</sup>这是因为修宪派和护宪派双方各持立场，势均力敌；森友、加计学园等问题导致朝野政党对立激化，国会讨论停滞不前。所以，自民党制定条文草案后，众参两院的宪法审议会并没有召开，也没有进入将条文草案出示给各政党的阶段。

另外，安倍打算以2018年秋季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续第三次当选为前提，借势敦促国会展开修宪草案的讨论，但修宪势力达成协议也非易事。公明党主张，把配合《公职选举法》的《国民投票法》修改放到优先位置；日本维新会则认为现阶段很难展开修宪讨论；希望之党计划与民进党组建国民民主党，忙于党内事务，无望得到众多议员的修宪配合。可见，随着朝野政党对立激化，由国会提议修宪的具体时期尚难确定。

### 三、安倍调整对华政策源于执政党内部及经济界的要求

为了扭转内政乱局，诉诸外交突破成为安倍寻求政绩的必然选项。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安倍政府在外交政策层面的调整，也是为实现“修宪”战略构想的外交铺陈。中日关系事关地区和平与稳定。因此，缓和中日关系就成为安倍政府改变内政不力的政绩突破口。

一直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取向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巨大。安倍政府一贯奉行对华“两面下注”的手法，表面上声称重视中日关系，却常常在国际社

---

[1]《安倍政府丑闻不断 难以年内由国会提议修宪》，共同社2018年5月3日电，<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5/a8127f7623a2--.html>。

会渲染“中国威胁论”。安倍在向国际社会策略性展现缓和日中关系姿态的同时，力图以“价值观外交”“战略性外交”等手段炒作“中国崛起”的国际危害性和危险性。这既恶化了中日关系，也客观上影响了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受到日本执政党联盟内部和经济界的强力诟病，要求安倍政府寻求走出对华“外交困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关于区域合作及经济一体化的理念和构想，不仅得到东亚国家的认同，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这让日本执政党及经济界的一些人对于安倍政府一味渲染“中国威胁论”提出质疑，要求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日盛，加之内政不力，使安倍政府调整对华策略成为可能。

首先，日本执政党联盟内部出现要求安倍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缓和日中关系的呼声。2017年两次出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向安倍政府呼吁要推动和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强调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有潜力的构想”。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于2017年底达成的《共同倡议》指出，愿不断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在第三方市场推动中日企业间的合作；愿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上，积极探讨两国具体合作项目。<sup>[1]</sup>2018年初，安倍首相听取年前访华的二阶俊博和井上义久的汇报时，就日本参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问题表示应做出积极“应对”。

其次，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寻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日中区域经济合作方式。2018年5月10日，经团联会长榑原定征在日本经济界欢迎李克强总理访日的活动上致辞，“希望以‘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为首，积极推进在第三国市场的合作”，希望日中两国企业在亚洲各国的港口、公路、铁路等建设方面开展合作；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三村明夫也对中日设立旨在

---

[1]《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在福建举行》，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8日3版。

完善亚洲基建的官民磋商机制达成一致表示欢迎。<sup>[1]</sup>这反映出日本经济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日中区域经济合作、扩大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商机的意愿。日本经济界出于经济利益，而要求日本政府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要求缓和、改善日中两国关系的意愿强烈。中方意识到日本经济界和执政党联盟内部有改善对华关系及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所以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改变对华遏制政策，从东亚共同利益出发，共同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轨道上来，全面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努力推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基于上述原因，安倍一反常态，逐步调整“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他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要以2018年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在“战略互惠关系”的原则下，努力改善日中关系。安倍这一表态的战略意图是：在强化日美同盟对华针对性的同时，又对国际社会表达“缓和”日中关系的意愿，展现出其战略性外交的姿态。也就是说，在东亚安全层面，安倍不放弃依托日美同盟遏制中国的既定战略；在经贸层面，又力图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合作利好，谋求自身经济利益。为此，日本借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机，力促开展日中高层来往，试探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意向，逐步重启日中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与磋商机制。

#### 四、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影响中日关系发展进程

安倍转而强调缓和中日关系的向好取向，是对近年来日本政府“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的策略调整。日方呼吁开展日中高层来往，启动对华全方位对话交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意向。中方强调中日关系事关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相关原则，珍视两国关系的向好契机。

但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策略性，加之，中日关系中业已存在的问

---

[1]《日本经济界期待扩大亚洲商机》，日本共同社2018年5月10日电，<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5/9bd4800c584a.html>。

题随时可能凸显和尖锐化，两国关系仍然存在反复的可能性。中日两国间依然存在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实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之路仍将曲折坎坷，很难断言日本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可以做到不犹豫、不退步。中国呼吁日方放弃对华“两面下注”的做法，全面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共同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18年3月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所言，“希望日方能够政治上讲信用，行动上守规矩，切实维护好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并且把‘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真正落到实处”。<sup>[1]</sup>4月下旬访日时，王毅部长还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表示，8年来重启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已迈出了使中日关系重返正常轨道的一步，重要的是保持这一势头，需要努力避免两国关系再次倒退。<sup>[2]</sup>2018年5月8日—11日，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强调：“我们要铭记历史，汲取深刻教训。以互信为本，悉心维护双方达成的共识，夯实政治基础。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不构成威胁的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努力实现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避免再出现大的波折和反复”。<sup>[3]</sup>

总之，安倍政府理应顺应财界借力“一带一路”谋求互利共赢的意愿、执政党联盟内部缓和对华关系的意向，综合国内外局势，调整对华政策，不要再渲染“中国威胁论”，彻底抛弃“两面下注”的手法，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轨道上来。只有认真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才能真正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顺利发展。

【收稿日期：2018-05-17】

[1]《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540582.shtml>。

[2]《王毅与日自民党干事长会谈，强调要避免日中关系倒退》，日本共同社2018年7月17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4/7ceb2045d468-.html>。

[3]《李克强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上的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premier/2018-05/11/content\\_5290000.htm](http://www.gov.cn/premier/2018-05/11/content_5290000.htm)。

## 亚太大变局中日本战略选择和中日关系走向

(项昊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访问学者)

### 一、亚太大变局中的日本

当前,以朝鲜半岛局势转圜和中美大国博弈加剧为标志,亚太地区格局正在酝酿深刻变化,区域政治安全经济秩序面临重塑。日本作为区域传统大国,在这一轮大变局中不甘充当配角,但迄今其作为有限,难掩战略焦虑。目前,日本亚太战略面临多重挑战。

(一)中美之间如何抉择。随着中国加快崛起和影响不断外溢,长期以来美日联手主导西太平洋政治经济安全格局的霸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为了维系既得利益,不愿放弃“倚美制华”的既定战略,但考虑到特朗普政权内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又不敢在美国身上“孤注一掷”,特别是中美贸易争端勾起日“伤心往事”,联系到自身对美贸易现状,不能不感到“唇亡齿寒”。中美贸易争端本质上是围绕未来国际秩序与规则的一场博弈。在中美两个大国间如何做到左右逢源,避免选边站队,新时期日本外交面临重大战略抉择。

(二)朝鲜半岛政策如何调整。在此轮中美朝韩一系列双边互动中,日本置身事外,再遭“越顶外交”。日本对朝政策一贯坚持一揽子解决朝鲜核导与绑架日本人质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的基本方针。安倍的政治生涯发迹于“绑架”问题,此次上台以来一直意欲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有所建树,但在对朝直接对话无望的情况下,出于内外政治考量,安倍政权对朝鲜核导开发高举“施压”大棒,日朝关系久陷僵局。对于南北走向和解融合的朝鲜半岛,日本内心并不乐见其成。一方面,安倍政权借“朝鲜核导威胁”推进修宪强军的口实被釜底抽薪,今后继续推动相关政治议程将失去

不少“大义名分”；另一方面，源于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日本未来面对的半岛对手将更加棘手。就对朝而言，如何重启双边对话谈判，“绑架”问题能否“软着陆”，历史旧账如何“清算”，如何参与朝鲜弃核和改革开放进程，已成为安倍政权面临的最紧迫外交课题。

（三）“大国战略”何去何从。东北亚安全环境变化对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可能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半岛局势峰回路转，今后推动朝鲜弃核进程中，东北亚和平机制乃至亚太安全架构建设势必提上议程。在此过程中，日本将扮演何种角色，既考验其战略思维，也会折射出日本未来发展走向。迄今，日本拉紧对美军事同盟、强化“自主防卫”的军事部署，虽有防范朝鲜核导威胁的现实需要，但实际上主要针对中国。如果朝鲜走上弃核之路，安倍将难以再借“朝鲜核导威胁”服务修宪强军需要，再提所谓“外部威胁”，其矛头只能对准中国。如果“中国军事威胁论”从含糊其辞走向摊牌，势必对改善中的对华关系带来冲击，安倍政权对此不能不有所忌惮。另一方面，如果外部安全环境趋缓，不仅会影响安倍推进修宪强军等一系列国内议程，进而可能对日本国内近年来持续发展的保守右倾化思潮形成牵制。自民党一党独大、保守势力主导政坛的格局也可能逐步出现变化，政治钟摆有望迎来一定回摆。

## 二、新形势下日本的内外战略选择

日本国力相对下滑，但大国雄心未泯。安倍晋三作为冷战结束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执政5年多来，打着重新打造“强大日本”的旗号，一手推进以修宪强军为目标的“国家正常化”进程，不断取得新突破；一手推进“安倍经济学”，推动日本经济持续温和复苏，多数经济指标趋于好转。

安倍实现长期执政，不仅得益于在野势力一盘散沙，自民党内缺乏众望所归的挑战者，更主要还是源于其内外政策务实有效，执政表现得到广泛认可。作为右翼保守政治家，安倍在践行其一贯政治理念的同时，强化“首

相官邸主导”的中央集权，大胆推行以实用主义为指向的内外政策，打破了传统官僚决策体系的僵化低效，树立了敢做敢为的强势领导人形象。

2017年以来，“森友学园”丑闻持续发酵，安倍政治形象和声望受到一定打击，支持率逐渐走低，民众对安倍政权开始出现“审美疲劳”。但在当前日国内政治现实中，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难以动摇，安倍执政前途尚未受到致命影响。如不发生特殊变故，安倍有望顺利赢得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谋求继续执政至2020年东京奥运会，乃至更久。

近年来，保守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蔓延，保守政党长期主导政坛，折射出的是日本暮气沉沉的社会现实。“安倍经济学”推动日本经济实现战后第二长的景气期，而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不过1.2%。安倍在年初的施政演说中坦言，日本面临少子老龄化的“国难”。对内，空前严峻的低出生率和老龄化严重制约了日本社会的活力和长期发展潜力，长期量化宽松带来巨额政府债务和财赤负担。对外，则面临欧美和新兴大国的挤压和竞争压力。长期看，日本国力相对下滑的大趋势难以逆转。安倍充满进取的内外战略，掩盖的是以攻为守的无奈。

同时也要看到，日本综合国力、软硬实力依然雄厚，在国际舞台和治理体系中仍拥有很大影响力和话语权，是全球和地区事务中不可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日本精英阶层危机意识浓重，不甘国运就此走向衰弱。而作为一个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产业和科技底蕴的国家，日本依然不乏维持大国地位的基础和条件。

日本未来发展走向将主要取决于国内深层次矛盾问题的处理，今后内外战略将主要围绕“重振经济和社会活力”、“维系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两大目标展开。

（一）政治安全上，稳步推进“国家正常化”进程，谋求实现“自主防卫”。这是战后日本保守势力孜孜以求的国家目标，也是安倍一贯的政治抱负。安倍将首相任内实现修宪为目标，但这一政治课题在日本国内依然充



满争议，左右阵营尖锐对立。民调显示，尽管多数民众对于修宪的大方向予以认可，围绕如何修宪却存在严重分歧，焦点还是在事关战后日本和平发展道路的宪法第二条上，短期内难以形成社会共识。在支持率走低的背景下，安倍难以贸然推进相关议程，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危及其政治生命，未来只能稳扎稳打，谋求小步推进，积少成多。

军事安全方面，日不愿长期依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谋求实现“自主防卫”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面对中国军力快速发展和制海能力的提升，日本视中国为“潜在军事威胁”，担心被中国“夺走”钓鱼岛成为统治阶层挥之不去的“梦魇”，未来不会放松对华军事防范，将继续加强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同时，由于财政捉襟见肘，日本社会反战和平思潮根深蒂固，安倍政权难以在扩大军备的道路上走远，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有限作为。

（二）经济上竭力延续复苏势头，维持“经济强国”地位。由于少子老龄化、债务高企等深层次问题积重难返，结构性改革举步维艰，安倍政权已将量化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用至极限，未来政策空间极为有限，对内只能寄希望于提高消费税率、削减财政赤字，通过改善就业、育儿和教育环境以鼓励生育，刺激内需，并且对外开放就业市场以弥补日益短缺的劳动力。随着大企业丑闻频发，日本制造业神话褪色，传统优势领域面临中韩等有力挑战，而在以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经济领域又逐渐落后于中美，将促使日本痛定思痛，加大产业扶持和新经济的投入力度。近年来，日本受益于快速增长的海外游客，还将继续大力推进“观光立国”和“地方振兴”战略，着眼2020年东京奥运会，吸引更多海外游客，提振国内消费。总的政策目标是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维持内外需求增长和产业竞争优势，争取早日实现2%的通胀目标，推动经济进入自律增长轨道。

（三）外交上维持进取态势，谋求重点突破。执政以来，安倍打着“俯瞰地球仪”的“战略性外交”旗号，频繁出访，四处兜售“积极和平主义”，

推动经贸合作,进取势头十足。但热闹的表象掩盖不住日本外交的突出短板,即始终未能处理好同中、朝、韩、俄等主要邻国的关系。安倍外交要打开局面,根本上还是要立足亚太,着力改善同周边邻国的关系。当前,安倍丑闻缠身、支持率走低,更需要通过上述外交运筹来彰显政绩,转移民众视线,提振民意支持。

与此同时,基于安倍政权的保守主义本质,日本外交不会放弃“日美同盟”基轴,将继续配合美国在全球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加大对“印太战略”的投入,平抑中国影响。其根本目的还是要维系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地区秩序,维护日本在全球和地区的既得利益。

值得关注的是,如何打开对朝关系局面,是安倍外交当前面临的最大考验。日朝关系的症结在于“绑架”问题。多年来,这一问题不断发酵,一定程度上“绑架”了社会舆论,民众期待颇高,而理想与现实之间难免会有落差,高高举起,能否轻轻放下,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朝关系前景,甚至关乎安倍政权的前途命运。

### 三、中日关系走向及思考

中日关系 2012 年因钓鱼岛问题跌入谷底以来,经过 5 年的艰难“磨底”,去年以来出现加速回暖势头。这主要得益于三方面背景:一是高层发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保持多边场合接触会晤,李克强总理作为中国总理时隔 8 年访日取得圆满成功;二是双方有效管控矛盾分歧,在钓鱼岛、历史等问题上斗而不破,严重干扰两国关系的敏感问题逐渐降温;三是双边人员往来规模迅速扩大,2017 年迈入“千万人大交流时代”,为两国关系改善创造了良好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

中日关系中,历史感情纠葛、领土海洋争端、现实利益摩擦等相互交织,十分脆弱敏感。从大的历史跨度看,两国关系的演变最终取决于国力对比。此轮中日关系恶化始于 2010 年中日经济总量发生逆转的背景下,改

善于 2015 年中国 GDP 达到日本 2 倍之后，目前中国 GDP 已相当于日本的 2.5 倍。在中国对日实现赶超的过程中，日本社会民众从内心失衡、抗拒到不得不正视和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正在经历艰难的心态调整。

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对日本实现赶超，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质量同日本依然有不小差距。这也决定了日本精英阶层还未能心悦诚服地认可中国发展，难以从对华优越感中摆脱出来，体现在对华认知上依然极为纠结：一方面对华戒心重重，充满防范和抗衡意识；同时，又不想错失中国发展机遇，始终摇摆于“威胁论”和“机遇论”之间。

在当前全球和地区的大变局中，日本深知对华关系事关自身长久国运，如何与快速崛起的巨大邻国打交道，是日本统治集团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双方围绕历史认识和领土争端的矛盾具有长期复杂性，以及东亚的地缘政治现实，都决定了短期内日本不会放弃“合作与牵制”两手并重的对华政策基本取向，双边关系改善发展进程难以一蹴而就，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从长远看，稳定中日关系大局，推动日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有益无害的作用，符合中国根本利益。在当前亚太形势酝酿重大变化的过程中，为主动引领塑造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日本是中国需要重点争取和合作的对象。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而言，双方需要抓住两国关系改善势头，下大力气化解制约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关键是要破解四大难题：“安全困境”“互信赤字”“感情隔阂”“合作瓶颈”。

（一）管控矛盾分歧，力避战略误判，走出“安全困境”。双方有必要认真回顾总结过去几年来两国关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化管控历史、领土、台湾等问题的认知分歧和机制化建设，从源头上防范两国关系受到新的冲击。在此基础上，双方应加强战略沟通和军事安全对话，尤其是就各自发展战略和国防政策展开坦诚沟通，明确发出“互不视对方为威胁”的政治信号。中方应主动面向日本社会各界加强政策宣介，树立开放透明的中国形象，不给日本在国际国内渲染“中国威胁”的口实。同时，对于安倍政权推进修宪强军有关动向，中国也宜客观理性看待，将右翼保守势力过激言论与广

大日本民众的正常诉求区分对待，引导形成客观理性的涉日舆论，避免制约对日政策的空间。

（二）强化高层引领，善加正面引导，削减“互信赤字”。回顾中日关系发展历程，高层交往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的严重缺失，很大程度上源于高层沟通的不足。李克强总理正式访日标志着中断多年的两国领导人互访重启，对于双方重建政治互信、改善两国关系氛围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今后，两国保持领导人定期会晤和互访，也有利于抑制日本对华消极面，促使日本对华政策的积极转变。

（三）扩大双边往来，深化交流互鉴，消融“感情隔阂”。中国游客大举赴日旅游，对于促进两国相互理解、改善舆论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双方交往不平衡的状况依然突出，日本来华游客减少，民众对华认知偏于负面，跟不上中国的发展变化。中方需要加大投入，多渠道促进日本社会对华认知的改观，推动两国人员往来从浅尝辄止的旅游接触向深层次的人文交流发展，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四）开辟新领域，打造新增长点，突破“合作瓶颈”。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日间传统的垂直型产业分工模式逐渐难以为继，日本制造业企业对华投资收缩，导致两国经贸合作发展动力不足，经济纽带减弱，成为两国关系低迷的一个重要背景。新形势下，两国经济中优势互补的领域依然很多，在高端制造、节能环保、消费升级、健康医疗、养老护理等领域的合作依然大有可为。尤其是中方应抓住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转变的机遇，推动两国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在第三方开展互利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收稿日期：2018-05-18】

## 美日同盟与中日关系

（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这是时隔八年之后中国总理再次访日，表明中日关系正在逐步改善。在中日关系重新走上正常轨道之际，本文试图从美日同盟的角度来解读一下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 一、美日同盟的日趋强化

同盟体系是美国的“霸权之翼”，是美国权势的重要支柱。在亚太地区，冷战后美国一直试图强化双、多边同盟体系，以更好地发挥“离岸平衡”的作用：从前是美日、美韩、美澳等双边同盟；现在是努力构筑美日韩、美日澳，或美日印澳多边同盟机制。

美日同盟是美国最重要的同盟关系之一。它形成于冷战期间，主要是对抗来自苏联的威胁。冷战结束后，由于主要对手的解体，美日同盟一度处于“漂流”状态，但很快就找到了新的针对目标。

尽管经历过波折，但美日同盟关系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实际上，美日同盟正在经历从之前相对单纯的军事同盟（military pact）发展为现在全方位的安全机制（security institution）。在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先后经历了三次调整。美日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再拓展到“应对全球挑战”，日本自卫队逐步向海外拓展，实际突破了和平宪法的限制。而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加强美日同盟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安倍再度上台后，美日之间加快了合作的步伐。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进一步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全球范围内“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与反应。

除朝核问题之外，应对中国的崛起是美日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日在制衡中国方面有共同需求。进入新世纪，面对中国的不断崛起，以及维护自身在西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不断通过各种举措来强化同盟，甚至不惜“放日出笼”，同意和鼓励日本修宪，允许日本自卫队出征海外，力图弥补同盟中长期存在的短板，使整个同盟更有效力，更具威慑力。而日本则以此作为跳板，寻求美国在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和实现其大国抱负上的支持，试图修改和平宪法，提升军事力量，以实现防卫自主的目标。美日同盟的强化必然关系到西太地区的安全形势，给中国的外部环境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

## 二、美日印太战略协调与合作

特朗普上台以来，明确提出了“印太战略”构想，更加强调印度的作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并不是一个新东西。实际上，自克林顿时期开始，美国就非常重视同印度的关系，重视印度在地缘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小布什时期，美印关系就不断加强。到了奥巴马后期，美印关系颇为火热。以2017年11月美日印澳越南岷港非正式会议为起点，已经着手开始打造四国协调机制。

从早先“印太”概念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提出，日本是主动的建构者、积极的推动者。相较于其他国家，日本政策宣示更早，积极性也更高。实际上，日本提出的一些理念也融入到美国印太战略之中。日本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推动印太战略，原因也并不复杂：一是维护日本从中东、印度洋到西太地区的海上生命线的安全；二是配合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进军海外的海洋战略；三是有意联手围堵中国的崛起；四是对冲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也就是说，日本大力推进印太战略是和日本自身的战略目标相结合的，诸如应对地缘格局变动并制衡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实现安保自主化等。

美日在印太战略上的协调有不断强化的趋势。除了加强安全合作外，日本还正在试图推动将基础设施建设也作为印太战略的组成部分。在特朗

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将更多精力放在美国国内发展的情况下，日本希望承担更大的责任，推进四国协调机制的发展。未来，特朗普政府更多是扮演领导角色，而日本则会出钱出力，有意将四国协调机制做实做大，不断向前推进。

### 三、特朗普政府对美日同盟的态度

特朗普上台执政，让日本长舒一口气的是这届政府依旧重视同盟体系，强调美日同盟的作用。无论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是《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都强调美国的同盟和伙伴体系依然是美国全球安全的支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盟友对于回应共同威胁（如朝鲜）和保持在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非常关键。该报告明确指出，“欢迎和支持我们关键的盟友日本担负强有力的领导角色。”

然而，特朗普对盟友的态度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特朗普秉承的“美国优先”原则，要求包括日韩在内的盟友担负更多自身防卫的义务。《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的同盟是基于自由意愿和分担责任的基础之上；美国将承担义务，但也希望盟友和伙伴能公平地分担互惠集体安全。特朗普一度公开表示，如果日韩不能够分担更多的自我防卫义务，那么美国将考虑从这两个国家撤军。这让日本忧心不已，迫使安倍在特朗普上台之初就匆匆忙忙赶往华盛顿。

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不顾日本的反对，执政之初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让日本倍感挫折。还有就是贸易逆差问题，特朗普不仅对华施压，也对日本不断施压，贸易摩擦引发日本的极大担忧。一方面是美日贸易摩擦。削减贸易逆差是特朗普主要竞选承诺之一。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7年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为688.5亿美元，位列第三大贸易逆差国。前不久安倍访美，两国领导人同意就促成“自由、公正和互惠贸易协定”展开新一轮磋商。而特朗普对重返TPP兴趣不大，更愿意与日本展开双边贸易谈判，以削减美国对日“巨大贸易逆差”。满怀希望的安倍

最终也没能说服特朗普就征收钢、铝产品高关税对日本“网开一面”。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也引发日本的高度关注。毕竟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在华投资企业超过2万家。中日双边贸易额最高峰时曾突破3,400亿美元，近两年一直保持在2,700亿美元左右。一旦中美贸易战爆发，那么日本在华企业的对美出口也会受到很大冲击，因为这些产品的原产地都是标注中国，挂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账单上。

一边是中国的日益强大，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另一边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自私自利，无视盟友的诉求。这两个方面都迫使安倍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做出一定调整。这也是自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有所改善的深层次原因。

#### 四、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由于美日同盟日趋强化的态势，美国因素是影响，甚至某种程度上左右日本对华政策的外部因素。时至今日，影响中日关系有四大问题。而在这四大问题当中，美国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作用。

一是历史问题。中国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则出尔反尔，不敢正视侵略历史。在历史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比较暧昧。一方面，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含含糊糊，也和美国当初出于冷战需要、没有彻底清算日本侵略问题有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在日本侵略、慰安妇等问题上还是不能容忍日本走得太远。其总体态度是极力淡化美日战争的历史，强调和解，但不能容忍日本全盘否定侵略战争历史；同时对于日本发展军备也有底线，即不能容忍日本拥有核武器，而是由美国来提供核保护。同时，美国也试图通过强化美日同盟来加大对日本的影响和掌控，防止日本自行其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在对日的一些问题上还是有利益交汇点的。

二是领土争端问题。钓鱼岛的归属是中日间领土争端问题，近年来你来我往，趋于尖锐化。尽管美国并没有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甚至美国国会研究局曾发布报告认定钓鱼岛历史上归属于中国，但在不同场合表达



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日本的施政之下，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美国反对任何试图损害（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施政的单方面行动”。不仅如此，美日还在钓鱼岛方向加大了军事部署。在台湾问题上，美日联手应对台海局势的变化，发展同台湾的关系，实际上为中国的统一大业设置了障碍。

三是地缘安全问题。一段时间内，日本将中国视为其在东亚地区主导地位威胁。因此，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目的之一就是为自身扩大军备、解禁自卫队做铺垫。在战略布局上，日本也将重点防范对象指向中国。美日在联手制衡中国崛起的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美国有意发挥日本的牵制作用；而日本则依托美日同盟实现自身的安全诉求。美国驻军日本，使得强化美国军事前沿存在的意图得以落实。可以说，美日同盟的战略布局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中国崛起的战略空间。

四是战略互信问题。上述三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中日双方很难建立起战略互信。美日同盟的存在使得日本被纳入到美国的亚太战略轨道当中，而日本也愿意借助美国来围堵中国的崛起，并试图“借船出海”，实现日本“正常国家地位”。由此，本就因为历史、领土争端问题而摩擦不断的中日关系更加复杂化。

总而言之，中日关系短期内要得到实质性改善所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我们不要对一次高层访问抱太高的期望。不过，中日毕竟是近邻，两国改善和稳定关系，不仅有利于维护两国人民的福祉，而且有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改善和稳定中日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

【收稿日期：2018-05-15】

## 新全球化下的中日关系新起航

(刘军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2018年5月8—11日, 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 宣告中日关系“新起航”; 迈上新台阶”, 驶向全面合作的新时代。通过此访, 中日达成“建立长期稳定健康的互惠关系”共识, 作出以“以史为鉴、向前看”的战略合作姿态, 折射出近邻大国浓浓的一衣带水情谊。满足具体内容的协议及备忘录, 描绘着中日互惠关系的新路程。访问成果既有中日维护共同安全的“海空联络机制”, 也有着眼未来、开辟第三方市场的“官民协作委员会”, 以及力促金融开放、共建金融安全体系的 RQFII 机制。同时, 在社会福祉、亲民惠民领域, 也积极互鉴, 取长补短, 达成了社保、养老等合作备忘录; 在未来的技术领域, 双方描绘了包括技术合作、服务贸易等创新创业合作蓝图, 内容充实, 言之有物。

### 一、中日关系回暖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日两国领导人早有修复相互关系的意愿及行动。回顾过去5年, 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多边场合频频接触, 正面会谈, 为中日关系预热。特别是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 中日达成发展两国关系的“四点原则共识”, 为中日关系向好趋暖确立了指导方针。2015年, 习近平主席亲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 为扩大民间交往提供了理论支持。

随着 G20 杭州峰会成功召开, 中日高层接触频繁, 日本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积极负责任的大国行为开始理解。2017年, 安倍政府派代表出席“一带一路北京国际高峰论坛”, 表示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 对在第三方推进基础设施、环保产业和智能创新合作做出了正面表态。围绕中

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及其相关纪念活动，中日双方都积极安排，中国领导人更是多次关心过问，支持民间企业、智库及友好人士先行先试，尝试民间起步、以经促政、扩大交流、务实合作的交往形式，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奠定了民间和经贸基础。

2017 年是中日恢复邦交 45 周年，中日民间交往次第增加，中日关系渐趋转暖。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增幅扩大，扮演了助力日本经济内需扩张的角色；同时，两国民众商旅、游学、访学、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全面扩展。这为 2018 年春“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复会奠定了民意基础。中日抓住历史契机，深化经贸合作，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中日经济合作必将成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相互依存的产业分工体系、深化人文交流的关键形式和有生力量。

## 二、中日关系回暖顺应新时代的需求

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全球经济屡遭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阻击。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各种政策多不确定：安倍依赖的日美同盟基轴外交不能落地；安倍匆忙建立的“日美经济对话”机制屡次不能切入正题；安倍倾尽外交资源力促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被特朗普丢在地上，使得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历届政府苦心经营近 20 年的亚洲统合战略及其“东亚共同体”框架自行瓦解。而截至 2016 年，安倍试图摆平日俄关系、了结北方领土问题，但都毫无进展；安倍意图在美俄之间推进大国关系、围堵中国的政策宣告破产。

痛定思痛，安倍政府终于重新正视现实，不得不看到中国在推进世界经济复苏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 2017 年中国重新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且根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一年一度的调查结果，中国再次成为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地。企业的投资愿望以及海外投资选择，推动日本政府不得不顺应民意，启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

中日经贸合作为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两国经贸关系已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格局，成为中日双边关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分别是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且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国；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重要外资来源地。2017年，中日经贸合作企稳回升，双边贸易额达3,000亿美元，增幅超过10%；日本企业对华实际投资32亿美元，同比增5.3%；中国企业对日投资2.5亿美元，保持增长态势。截至2018年1月，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累计达5万余家，总投资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日本直接投资金额也达35亿美元。

与此同时，日本对亚洲整体的经贸往来活跃，特别是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直接投资增加。日本企业从中国和东盟国家获得的投资收益占其海外总收益的45%以上，超过欧美，这改变了长期以来“发达对发达”国家投资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亚洲成为日本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主战场。

10年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总有代表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技术，及其主导产业和发展模式。在新全球化时代，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堪称主导新未来的技术及其产业，驱动着世界资本在全球流动，世界经济的力量重新分布，结构快速重组，必将形成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经历了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日趋呈现“美欧亚三极体制”格局，以及美元、欧元与“以人民币为代表的非美元”的“三极货币体制”雏形。这种“三极体制”既表明了中国的发展且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同时也折射出世界经济正在酝酿新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中国以及亚洲国家尚未为此做好应对准备。这种新风险不仅包括汇率的不确定性，也包括资金流向流量的不确定性，更不能忽视的是，随着电动汽车、自动驾驶、智能化、数字化与环保节能化等新技术涌现和新产业诞生，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体制及其规则体系相对滞后，还不能有效地管理这种新趋势和新风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相关金融体系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也相对落后，并没有准备好应对“三极货币体制”的制度。旧制度的滞后与新形式的逆全球化风险相叠加，必将上升为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风险。中、日、韩及东盟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区域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这在客观上要求它们走到一起，共同应对时代的变化。这就是李克强总理在中日韩领导

人会上主张的“中日韩+X”所反映的时代模式。

### 三、中日关系回暖可以大有作为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将达26万亿美元，今后每年的资金需求将达1.7万亿美元，而其中的一半将很难依靠政府融资解决。而亚洲基础设施不仅关乎亚洲国家共同的发展环境，其战略通道、基础市场、基础产业、基本动能直接左右亚洲的产业分工体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这是亚洲繁荣与稳定的条件，也是未来时代及其战略技术对亚洲发展的客观要求。安倍政府将“基础设施出口倍增计划”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支柱；中国也提出了更具长远性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世界经济实力第二、三位的亚洲近邻大国，中日如何着眼亚洲的未来，以亚洲发展为重展开合作，关乎亚洲能否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及其风险。这是中日改善关系及中日韩领导人再聚首，共商合作大计的时代背景。新起航的中日关系，折射着世界经济的时代特征。

2017年11月，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分别会见安倍晋三首相，就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向好发展达成共识。习近平主席指出，互利合作是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双方要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积累有利条件，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这为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值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历史新机遇，丰富合作内涵，扩大共同利益，中日合作将大有作为。在战略上，以“中国制造2025”为前瞻引领，以“一带一路”为共同的地区发展空间和战略合作落脚点，以亚洲产业升级为共同目标，以互惠互利投资及自由公平贸易为承载，推进中日产业企业全面合作，努力在节能环保、物流、智能及金融服务、惠民厚生领域强化合作，促进彼此的经济转段升级。中日合作必将成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相互依存的产业分工体系、深化人文交流的关键形式和有生力量。

【收稿日期：2018-05-17】

# 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与 日美同盟的嬗变

栗 硕

【内容提要】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与日美同盟的构想、途径及效用，分别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伴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演变，日本自战后初期构建起安保法制基础以来，相继于冷战结束后初期、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两次进行了系统性改革；与此同时，日美同盟自确立以来也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作为现阶段日美同盟嬗变过程中的构想，与安倍内阁推动的安保法制改革具有紧密一致的战略契合性；而加深军事一体化作为同盟嬗变的途径，则与日本安保法制改革存在着一种“相互倚托”的关系；两者将共同促使日美在介入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方面发挥更大效用。

【关键词】日本安保法制 日美同盟 中国周边安全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栗硕，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8) 03-0030-16

日本安保法制改革，指日本对规定自卫队“武力行使”范畴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的国内政治行为，是国家行为体对本国军事力量的运用进行变革的一种单向对外战略举措；日美同盟的嬗变，指日美两国军事联盟关系的历史演变，是两个国家因应各自内外部形势变化而对同盟关系走向进行调整的双向互动过程。由于历史惯性及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与“日美同盟的嬗变”之间衍生出一种复杂而紧密的互动关系。

第一阶段，二战结束后，日本于1954年通过了《自卫队法》与《防卫厅设置法》，正式开启了“渐进式再武装”的过程，同时构筑起了日本安保法制的基础；另一方面，日美两国于1951年签署并于1960年修订了《日美安保条约》，确立了日美军事联盟关系中的“美主日从”基调，而后通过1978年签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对战后初期的日美同盟进行了细化与巩固。第二阶段，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安保法制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性改革，相继通过了《PKO合作法》《反恐特别措施法》《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等扩充海外“武力行使”权限的法律；同一时期，日美两国于1997年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一系列举措使日美同盟朝着“扩大合作内容”与“日本主动作为”的方向转变。第三阶段，2012年底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日本对安保法制再次进行了系统性改革，于2015年9月通过了“新安保法”；与此同时，日美两国于2015年4月再次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企图通过加深军事一体化等途径，促使日美在介入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效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其亚太政策依然沿着日美同盟嬗变过程中第三阶段的方向运行。

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对正当国家利益的追求，美国开始在亚太地区加大政治影响力与军事投入，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均带有明显的“对华遏制”色彩，其持续开展的“南海航行自由”活动以及新近挑起的贸易争端，无不透露出制衡中国的企图。与此同时，日本推动“国家正常化”的政治诉求，使其不断强化自

自卫队的能力建设、大规模拓展自卫队的职能范畴，并由此带来了安保法制的改革。在此背景下，美国需要日本协助其强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则需要美国对其强化军事力量加以认可与支持。另一方面，除了传统地缘政治领域的利益需求外，网络、太空、极地等新兴国际公域相关的秩序构建，也为日美两国间的军事合作提供了需求与空间。由此，伴随着日本安保法制的改革，日美同盟关系及合作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 一、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

2014年7月1日，日本安倍内阁通过了题为《构筑保卫国家、守护国民的无缝安保法制》的决议文件，表示要通过安保法制改革来扩充自卫队在“应对灰色事态”“参与国际维和”“支援多国部队作战”“防护美军”等“武力行使”方面的权限。<sup>[1]</sup>随后，日本执政党开展了一系列的立法筹备工作，最终于2015年9月19日促使国会通过了《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与《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实现了日本战后历史上第二次安保法制改革。同一时期，日美两国于2013年10月3日召开了外交防务部长级“2+2”会谈，一致同意对1997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订。<sup>[2]</sup>尔后，日美两国于2014年10月8日发表了“新指针中期报告”，并于2015年4月27日公布了修订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作为现阶段日美同盟调整的方针性构想，与安倍内阁目前推动的安保法制改革具有紧密一致的战略契合性。

#### （一）紧密契合的战略背景

伴随着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国际新公域主导权竞争的开展，日美两国均提出了各自的战略构想。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提出了“亚

[1] 閣議決定、『国の存立を全うし、国民を守るための切れ目のない安全保障法制の整備について』、<http://www.cas.go.jp/jp/gaiyou/jimu/pdf/anpohosei.pdf>。

[2] 防衛省、『共同発表：より力強い同盟とより大きな責任の共有に向け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anpo/kyougi/js20131003\\_j.html](http://www.mod.go.jp/j/approach/anpo/kyougi/js20131003_j.html)。



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方面，除了表示要强化与盟国间的合作外，还要加大在亚太地区的部署与参与。<sup>[1]</sup> 尔后，日本安倍内阁于 2013 年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并在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强调：“将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作为我国国家安全保障的基本理念，努力实现‘维持我国和平与安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推进安保合作等手段来改善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在构筑国际秩序、解决国际纷争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并改善全球安全环境’三大目标”。<sup>[2]</sup> 在国际安全形势变化与美日国内政治生态发展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希望日本协助其在亚太地区强化军事存在与影响；而日本也希望借助美国来打破“和平宪法”关于“武力行使”的束缚，并进一步强化军事实力。

在此背景下，美日两国对指导军事同盟未来发展的《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了修订，表示“要共同构筑无缝、强力、灵活、有效的应对能力，开展与其他伙伴国家间的合作，确保美日同盟的全球性质”。<sup>[3]</sup> 在国内政策方面，日本通过了“新安保法”，为自卫队增加“武力行使”权限提供了法律保障。“新安保法”通过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等均表示欢迎与支持。<sup>[4]</sup> 现阶段，日美两国又共同提出了“印太”战略，主张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维持并强化在印度洋 - 太平洋地区的政治主导权与军事影响力，从而为日本安保法制改革后的实践以及日美同盟的深化发展继续提供战略背景的支撑。

---

[1]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Defense Strategic Review,” the Pentagon, January 5, 2012,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2/01/05/remarks-president-defense-strategic-review>.

[2] 閣議決定、『国家安全保障戦略』、<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nss-j.pdf>.

[3] 『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kohoshiryo/pamphlet/pdf/shishin.pdf>.

[4] 産経新聞、『「同盟強化の努力」歓迎 米国務省』、<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50919/pl1509190035-n1.html>.

## （二）高度一致的战略方向

一方面，2015年版《防卫合作指针》表明了现阶段日美同盟演变的具体方向，指出“为了在新指针下实现两国间的有效合作，日美政府有必要进行紧密的磋商，并在政策层面与运用层面进行切实的调整。一是有效运用同盟协调机制，强化自卫队与美军从平时到战时所有阶段的联合运用，确保及时的情报共享与认知共通；二是深化自卫队与美军在运用层面的调整，时常进行要员交换，并利用各种指挥系统采取行动；第三，持续制定并更新共同计划，确保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运用方面的整合性、灵活性、及时性与高效性”。<sup>[1]</sup> 在新指针的构想下，日美同盟将朝着“促进军事一体化”与“提升自卫队作用”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新安保法”同样强调了“深化日美军事合作”以及“扩充自卫队职能”等内容。《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由《自卫队法》《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等10部法律的修正案综合而成，其中引入了“存立危机事态”<sup>[2]</sup>、“重要影响事态”<sup>[3]</sup>等概念，打破了“和平宪法”对于集体自卫权的禁止，并扩充了自卫队在海外的活动内容。《国际和平支援法》则确保了自卫队对多国部队作战的支援。在新安保法制下，自卫队增加了对美军舰艇进行防护等任务，从而使得日美军事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此外，自卫队进一步扩大了在海外行使武力的权限，其在介入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方面的作用获得提升。

## （三）相辅相成的战略内容

新指针为了强调日美同盟的“无缝性”，摒弃了原有“三种事态”的说法，

---

[1] 『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kohoshiryo/pamphlet/pdf/shishin.pdf>。

[2] “存立危机事态”是指由于其他国家遭受武力攻击而导致日本面临生死存亡危机的情况，该概念的引入使得日本自身在没有遭受攻击的情况下也可以行使武力，从而解禁了集体自卫权。

[3] “重要影响事态”是指会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态，替代了原有“周边事态”的说法，从而将日本武力行使的范围由“周边”拓展至“全球”。

将两国军事力量的运用按照“平时”、“重要影响事态”、“日本遭受武力攻击”、“存立危机事态”、“日本发生大规模灾害”5种情况进行规划，增加了自卫队“防护美军舰艇”、“对美军进行弹药补给与空中加油”、“与美军共同防御离岛”、“参与海上扫雷”等新内容。而且，新指针为了凸显日美同盟的“全球性”，强调自卫队将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维和、多国部队作战、打击海盗等活动，同时将进一步发展与其他国家间的军事合作。此外，新指针还声称日美两国将在网络空间及太空领域强化合作。<sup>[1]</sup>

与此相称的是，日本“新安保法”同样采取了“无缝性”的安保理念，扩充了自卫队在各种事态下的行动权限。首先，《自卫队法》《美军行动关联措施法》《海上输送规制法》《俘虏处置法》《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增加了自卫队在“存立危机事态”下的应对内容，《武力攻击事态法》更名为《武力攻击·存立危机事态法》；其次，《船舶检查活动法》《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增加了自卫队在“重要影响事态”下的应对内容，《周边事态法》更名为《重要影响事态安全确保法》；第三，《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自卫队法》《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增加了自卫队执行“驰援护卫”、“救援在外日本人”、“宿营地共同防卫”等任务<sup>；[2]</sup>第四，《国际和平支援法》为自卫队能够随时支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作战提供了法律保障。<sup>[3]</sup>由此可见，新指针规定的行动内容与“新安保法”赋予自卫队的任务相辅相成，共同为日本今后的军事力量建设划定了方向。

[1] 徐万胜，栗硕：《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剖析》，载《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4期，第17页。

[2] 第189回国会法律第七十六号『我が国及び国際社会の平和及び安全の確保に資するための自衛隊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housei.nsf/html/housei/18920150930076.htm](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housei.nsf/html/housei/18920150930076.htm)。

[3] 第189回国会法律第七十七号『国際平和共同対処事態に際して我が国が実施する諸外国の軍隊等に対する協力支援活動等に関する法律』、[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housei.nsf/html/housei/18920150930077.htm](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housei.nsf/html/housei/18920150930077.htm)。

## 二、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与日美军事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新指针将加深日美军事一体化程度作为调整日美同盟的重要途径。日本安保法制改革将在国内政治层面上推动并确保日美军事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同时，日美军事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也将为日本安保法制改革的具体实践提供平台与支撑。以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为依托，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加深主要体现在同盟机制、军事演习、装备合作三个方面。

### （一）日美军事同盟机制不断完善

2015年11月3日，日本防卫相中谷元与美国防部长卡特在会谈中确认正式设立“同盟协调机制”(Allia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该机制依据新指针而设，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的代表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驻日大使馆、联合参谋部、太平洋司令部、驻日美军司令部等部门的代表组成“同盟协调小组”(Alliance Coordination Group)，分为局长级、课长级、组长级，负责日美军事活动在政策方面的协调，与原有的日美共同委员会(Joint Committee)进行情报共享与磋商；二是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陆海空各幕僚监部的代表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驻日美军司令部的代表组成“共同运用协调所”(Bilateral Operations Coordination Center)，负责日美军事活动在运用方面的协调；三是日本陆海空各自卫队的代表与美军相关部队的代表组成“部队协调所”(Component Coordination Centers)，负责双方部队在共同执行任务时的协调。此外，日美两国还成立了由自卫队代表与驻日美军代表构成的“共同计划制定委员会”(Bilateral Planning Committee)，与原有的防卫合作小委员会(Sub Committee for Defense Cooperation)进行磋商，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制定共同行动计划。<sup>[1]</sup>

[1] 外務省、『同盟調整メカニズム(ACM)の構成』、<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108947.pdf>。

在此之前，1997年版《防卫合作指针》也曾规定了类似的协调机制，但其仅限于在“周边事态”与“日本遭受攻击”时设立。如今，“同盟协调机制”的常态化设立，使自卫队与美军从“平时”到“战时”乃至日本发生自然灾害或者朝鲜发射导弹等任何情况下，均能在联合行动前及过程中保持高效的沟通与协调。<sup>[1]</sup>此外，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间的会谈、外交与防务（“2+2”）会谈、防长会晤、最高武官会谈、各种级别间的军事长官互访等活动也一直在高频度地进行。日美军事同盟机制的不断完备，是双方军事一体化程度加深的重要体现与实现路径，也为日本在新安保法制下运用、建设与发展军事力量创造了条件。

## （二）日美联合军事演习逐步升级

日美联合军事演习的逐步升级，是两国军事一体化程度加深的另一重要体现，在日美新指针与日本“新安保法”的框架下呈现出三点趋势。

第一，注重对新协调机制的利用与检验。2016年1月，日美两国在“利刃”大型年度综合军事演习中，通过桌面演练等方式，以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等周边紧急事态为假想背景，首次对“同盟协调机制”进行了检验。演习过程中，“共同运用协调所”与“部队协调所”根据想定事态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充分的情报共享与沟通。<sup>[2]</sup>2017年4月，日美两国军舰针对朝鲜多次试射导弹问题进行了共同训练，“同盟协调机制”在此次联合演习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sup>[3]</sup>

第二，加大对新增任务的演练频度。2016年7月，日本海上自卫队与

---

[1] 産経新聞、『日米「同盟調整メカニズム」設置 自衛隊と米軍の連携強化へ ミサイルや大規模災害にも活用可能』、<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51103/plt1511030026-n1.html>。

[2] 共同网：《日美开展首次“同盟协调机制”演习》，<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01/113360.html>。

[3] 朝日新聞、『「航行、北朝鮮に見せつける」日米共同訓練、増す圧力』、<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K4R5SK0K4RUHBI02V.html>。

美国海军在日本青森县陆奥湾实施了联合扫雷训练。安倍晋三曾将自卫队在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扫雷作业视为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具体案例，而此次行动便是“新安保法”自当年3月施行以来，日美首次在日本国内实施的大规模扫雷训练。<sup>[1]</sup>11月，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冲绳附近首次实施了以“重要影响事态”为想定背景的联合演习。<sup>[2]</sup>2017年2月，日本在泰国参与美泰两国举行的“金色眼镜蛇”多国军事演习期间，设想在海外的日本人与美国人遭遇危险时，自卫队联合美军、泰军共同实施救援。这是自卫队首次在海外实施“救援在外日本人”这一“新安保法”任务的演习。<sup>[3]</sup>5月1—3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及“涟”号护卫舰对美军补给舰进行了护卫，首次执行了新指针与“新安保法”为自卫队增加的“美舰防护”任务。<sup>[4]</sup>7月26日，日本海上自卫队依据“新安保法”，在青森县陆奥湾首次实施了对美军舰艇进行防护的实际训练。<sup>[5]</sup>2018年1月22日，安倍在施政演说中证实“自卫队已首次实施了对美国军机的防护任务”。<sup>[6]</sup>

第三，强化与其他伙伴国家间的共同训练。2016年6月和11月，日美韩三国各派出“宙斯盾”舰，相继在夏威夷海域、日本近海举行了弹道导弹探测追踪演习。<sup>[7]</sup>2017年7月，日美印三国在印度南部金奈海域的孟加拉

[1] 共同社：《日美举行安保法实行后的首次在日本扫雷训练》，<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07/124344.html>。

[2] 共同社：《日美实施首次反映安保法的联合演习》，<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11/129694.html>。

[3] 産経新聞、『海外初の邦人保護訓練 自衛隊、安保法に基づき』、<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70220/pl1702200004-n1.html>。

[4] 読売新聞、『米艦防護、護衛艦2隻に』、<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70503-00050018-yom-pol>。

[5] 共同社：《海自依据安保法首次实施防护美舰实际训练》，<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07/7d93560daa21-.html>。

[6] 共同社：《安倍提及已首次实施美军机防护任务》，<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1/d88439a97324.html>。

[7] 共同社：《日美韩在日本近海举行第二次导弹探测拦截演习》，<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11/129848.html>。

湾举行了“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日本“出云”号护卫舰、美国“尼米兹”号航母、印度“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等共约 20 艘舰船就反潜作战、水面作战、对空作战等内容进行了演练。<sup>[1]</sup>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还于当年 7 月在澳大利亚参加了美澳“护身军刀”联合军演。<sup>[2]</sup>同年 12 月，日美韩三国在日本周边海域针对朝鲜的导弹试射行动再次进行军事训练。2018 年 2 月，日本自卫队参加了美泰两国军方主办的“金色眼镜蛇”演习。伴随着“印太”战略的提出，以日美为主导、辐射印澳韩泰等国的联合军演将逐步增加。

### （三）日美军事装备技术合作日益紧密

在日美新指针与日本“新安保法”的推动下，两国在军事装备技术方面的合作变得日益紧密。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多次要求日本扩大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日本首相安倍也对此表示了同意。

一方面，日本持续强化引进美国军事装备技术。2017 年 2 月 15 日，安倍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表示，“购买美国的先进军事装备，不仅有利于日本的国防建设，也将对美国经济发展及社会就业做出贡献”，透露出积极引进美军装备的意愿。<sup>[3]</sup>3 月 27 日，日本国会通过了 2017 年度预算，其中防卫费连续 5 年增长，达到历年最高额度的 5.1251 万亿日元，以保证日本能从美国引进新一代战机 F-35、“鱼鹰”运输机 V-22、水陆两栖战车 AAV7、新一代空中加油机 KC-46A 等军事装备技术。<sup>[4]</sup>5 月 15 日，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在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上表示，“作为强化反导系统的措施，考虑正式

---

[1] 時事通信、『日米印の連携誇示 悪条件も「訓練に好都合」』、<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70717-00000074-jij-asia>。

[2] 共同社：《日本陆自空挺团在澳与美军实施联合训练》，<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07/5d0e9eec41ec.html>。

[3] 朝日新聞、『防衛装備品の購入「米国雇用に貢献」首相、国会で見解』、2017 年 2 月 16 日、<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K2H4RP4K2HUTFK002.html>。

[4] 防衛省、『わが国の防衛と予算』、<http://www.mod.go.jp/j/yosan/2017/yosan.pdf>。

启动关于引进陆基宙斯盾系统(Aegis Ashore)的研究”。<sup>[1]</sup>2018年3月28日,日本国会通过的2018年度预算中,防卫费再次猛增,高达5.19万亿日元,用于购买美国军事装备技术的经费有了明显提升。

另一方面,日美两国进一步深化了军事装备技术的共同研发。2016年2月3日,日美两国召开了第27届“装备技术定期协议会”,美国国防部负责采办的副部长弗兰克与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长官渡边秀明就进一步深化装备技术合作达成共识,并对两国共同研发的项目进行了磋商。<sup>[2]</sup>据日本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资料显示,日美两国自1992年开始共同研发以来,已完成运载火箭引擎、舰载对空雷达等17个项目;“SM-3 Block 2A”海基拦截导弹、混合电力驱动、高速多体船技术以及喷气式飞机燃料与噪音问题4个项目正在进行中。<sup>[3]</sup>据报道,日美两国相继于2017年2月和6月进行了两次“SM-3 Block 2A”的拦截试验,并计划于2021年左右在海上自卫队进行部署。<sup>[4]</sup>2018年1月31日,日美再次进行“SM-3 Block 2A”的拦截试验,虽然实验失败,但两国均表示无意改变该新型导弹的引进与部署计划。

### 三、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与日美介入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的演化

日美同盟的调整与日本安保法制改革形成一种相互推动的关系,共同促使两国在介入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方面发挥更大效用,并对东亚安全格局乃至世界安全形势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

[1] 共同社:《日防卫相称将正式研究引入陆基宙斯盾系统》,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05/c1901f3e9424.html>。

[2] 防卫省、《第27回日米装备・技术定期协议について》、<http://www.mod.go.jp/j/press/news/2016/02/03c.html>。

[3] 防卫省、《防卫白书2016》、<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6/html/ns033000.html>。

[4] 共同社:《日美共同开发的新型拦截导弹试验失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06/cf7559dbb4ef.html>。



### （一）深化干预朝鲜半岛问题

日美新指针与日本新“新安保法”均将“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作为“重要影响事态”的想定情况之一，明确规定了自卫队配合美军进行作战的具体任务。

首先，美国多次表态支持日本应对朝鲜射弹。2017年3月6日，朝鲜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其中3枚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对此，安倍政府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商讨对策，声称“朝鲜已成为新的威胁”。随后，特朗普与安倍晋三、马蒂斯与稻田朋美、蒂勒森与岸田文雄分别进行了通话，特朗普政府表示“100%与日本同在”。<sup>[1]</sup> 朝鲜每次发射导弹后，美国均会表示对朝鲜的谴责以及对同盟国的支持。

其次，日美联合彰显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威慑力量。2017年4月23日，日本护卫舰在菲律宾海与美国“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汇合，随后一路北上，并实施了阵型编排与通信训练；29日，两国军舰从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与韩国海军实施了联合演习。<sup>[2]</sup> 同期的4月25日，具备弹道导弹防御性能的日美“宙斯盾”舰也在日本海实施了联合训练，为防备朝鲜发射导弹确认了联合探查拦截目标的流程。<sup>[3]</sup> 此外，日本政府还暗自谋划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时派自卫队前往执行“救援在外日本人”的任务。<sup>[4]</sup> 近来，在朝鲜问题有所缓和的情况下，日美两国仍然保持了一定的高压姿态。2018年4月20日，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对朝鲜维持“最大限度的施压”，并就要求朝鲜废弃包括中短程导弹（射

[1] 産経新聞、『日米2プラス2の早期開催を確認 日米首脳が電話会談「北の脅威、新たな階段」一致』、<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70307/plt1703070009-n1.html>。

[2] 共同社：《美航母与海上自卫队在日本海实施联合训练》，<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04/bc39ef71f766.html>。

[3] 共同社：《日本宙斯盾舰在日本海实施联合训练》，<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04/c8d91de0ef6f.html>。

[4] 共同社：《韩国不满日方探讨应对朝鲜半岛突发事态》，<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04/250434c69f35.html>。

程涵盖日本)在内的所有弹道导弹达成一致。<sup>[1]</sup>

第三,日本积极参与美国亚太地区反导网络的构筑。伴随着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逐步开展,日本也表示要强化反导能力。2017年2月,日本自民党专门成立了“弹道导弹防御讨论小组”,就从美国引进“萨德”系统还是陆基宙斯盾系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日本部分“国防族”议员还主张政府推动构筑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建议从美国引进巡航导弹等攻击性装备。<sup>[2]</sup>同年12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从美国引进两套陆基“宙斯盾”系统。此外,两国还在规划数年内分别部署共同研制的新型拦截导弹。

## (二) 加强新型战略领域联合

现阶段日美同盟调整注重在太空、网络、极地等新型战略领域的联合;而日本安保法制改革则在强化“新疆域”合作效用方面,为自卫队的发展进行了松绑与推动。2017年2月,安倍与特朗普举行首次首脑会谈时,双方再次表示要强化同盟在新型战略领域上的合作。

在太空领域,日美两国已构筑起多种级别的对话合作机制。2016年3月2日,日美两国召开了第4次“太空安全保障协议会”;2017年5月16日,两国召开了第4次“太空统合对话”,在此之前还召开了第11次“卫星定位系统全体会议”及第7次“太空政策协议会”。伴随着日美同盟的强化,双方在太空军事利用、卫星海洋监测等方面已展开了深入的技术合作与政策协商。<sup>[3]</sup>2018年4月25日,日本自民党太空与海洋开发特别委员会提出报告,要求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新设统管太空运用的司令部门,以强化自卫队在太空领域的作战能力并推动与美军相关部门间的联合。<sup>[4]</sup>据报道,日本

[1] 共同社:《日美防长就要求朝鲜废弃中短程导弹达成一致》,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4/9cdab62e46af.html>。

[2] 沖縄タイムス、『社説「巡航ミサイル検討」専守防衛逸脱する恐れ』,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70507-00096368-okinawat-oki>。

[3] 外務省、『宇宙に関する包括的日米対話第4回会合の開催』,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4622.html](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4622.html)。

[4] 読売新聞、『自衛隊の宇宙対応力「危機的に不足」…自民委』,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426-00050016-yom-pol>。

自卫队将于今年秋季首次参加由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举行的多国军事演习，期间将以卫星遭受军事攻击为想定背景，而对多国间合作进行演练。

在网络领域，美军与自卫队在情报共享、训练演习、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2016年10月20—21日，两国召开了第5次“网络防卫政策小组协议会”；2017年7月20—21日，两国召开了第5次“网络对话”。<sup>[1]</sup>2018年3月，日本防卫相小野寺表示“法理上采用网络攻击的手段不被否定”；4月，自民党网络安全对策本部提出报告，称“应通过修改法律等方式明确自卫队发动网络攻击的权力”。<sup>[2]</sup>5月4日，美军战略司令部下设的网络司令部升格为与太平洋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同级且独立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由此可见，自卫队今后将强化网络空间的作战能力，并将会与美军展开更加深入的合作。此外，在极地领域，日美两国联合抢夺战略优势，不断深化资源开发、航路开辟、军事部署、作战训练等方面的交流与协作。

### （三）竭力遏制中国和平发展

日美两国将中国近年来在东海、南海等领域的正当活动视为对地区秩序的挑战，不断通过加深军事一体化、推动日本军事转型等途径，竭力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

首先，强化对东海问题的备战。美特朗普政府执政伊始，多次表态“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2017年2月14日，安倍就日美首次首脑会谈后的联合声明表示“这是首次提及两国为东海的和平与稳定而合作，极有意义且是划时代的”。<sup>[3]</sup>2018年4月，安倍与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再次确认了“《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等内容。此前，日美“新指针”专门增加了“离岛作战”的项目，明确规定了日本离岛遭受

[1] 外務省、『第5回日米サイバー対話の開催』、[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3\\_000318.html](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3_000318.html)。

[2] 時事通信、『サイバー自衛権の根拠法検討を 自民対策本部が提言』、<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423-00000105-jij-pol>。

[3] 共同社：《安倍称日美表态在东海合作极有意义》，<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7/02/134274.html>。

攻击时两国军事力量的统筹运用；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也专门强调了自卫队在“离岛作战”方面的能力建设。据此，自卫队与美军以夺回被敌方占领的离岛为想定背景，联合开展了为数众多的各类演习。此外，日本防卫省资料显示，2016年度航空自卫队紧急起飞次数为1,168次，其中针对中国高达851次，显示出日本在东海问题上对中国的防备与敌意。<sup>[1]</sup>

其次，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新指针与“新安保法”均将南海问题作为“重要影响事态”的想定情况。近年来，美国持续在南海开展所谓的“自由航行”活动；日本则积极向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提供二手装备，并在多种国际场合编织中国“秩序破坏者”的形象。此外，日美两国还在南海多次实施双边、多边联合军演。2017年5月，配合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军舰船首次驶入南沙岛礁12海里内海域的举动，日美两国军舰在南海举行了两次联合训练。<sup>[2]</sup>2018年3月，日本派出“伊势”号护卫舰与美国“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等数艘舰艇再次在南海实施了联合军事训练。

最后，深度介入台海问题。2017年1月1日，日本对台窗口正式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日本政府人士透露“自卫队将实施设想中国大陆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演习，以此检验自卫队在应对‘重要影响事态’时的作战能力”。<sup>[3]</sup>此外，日本防卫研究所还在《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7》中将台湾地区作为与大陆并列的国家政治实体加以表述，声称“中台之间的军事平衡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换”，“中国的导弹和空中力量已成为台湾的巨大威胁”等。<sup>[4]</sup>另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于当年6月29日表示将向

---

[1] 朝日新聞、『空自スクランブル、過去最多1168回 对中国機が増加』、<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70413-00000074-asahi-pol>。

[2] 共同社：《日本护卫舰与美海军在南海联合训练》，<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05/c66b9fed38c5.html>。

[3] 共同社：《自卫队将实施设想中国大陆与台湾冲突的演习》，<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7/01/133112.html>。

[4]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2017——変容を続ける中台関係』、[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JP\\_web\\_2017\\_A01.pdf](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JP_web_2017_A01.pdf)。

台湾地区出售拦截导弹等装备技术,持续插手台湾问题。<sup>[1]</sup>2018年3月16日,特朗普签署《与台湾交往法》,严重破坏了一个中国原则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不断挑拨台海问题。

总之,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日美两国以同盟调整与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为推力,逐步加深军事一体化程度。在此背景下,双方不断强化军事实力,试图在介入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方面占据更大优势。两国的上述举动,不仅将增大亚太地区的不稳定性,也会使国际安全领域的军备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近期,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日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双边及多边交流逐步有序展开。然而,从军事角度来看,日本仍然在持续强化自卫队的力量建设,并针对性地扩充其西南方向的作战力量及海上制衡能力。2018年3月27日,日本自卫队成立了陆上总队及专门用于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此外,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长中谷元于4月13日表示,“应该将‘出云’号及‘加贺’号护卫舰改装成能在甲板上承载多架F-35B战机并能在海上发挥航空基地作用的‘航空母舰’”,<sup>[2]</sup>目的则在于强化自卫队的海上作战能力。对此,中国应对日本“新安保法”的实践及日美同盟的走向保持高度的关注与警惕,防患于未然。

【收稿日期:2018-05-19】

[1] 日经中文网:《美国特朗普政权首次对台军售》, <http://cn.nikkei.com/politicsaconomy/politicsasociety/25829-2017-06-30-03-01-47.html>。

[2] 《日本自民党要员建议把直升机护卫舰进行改装,成为防卫型航母》,国际在线, <http://news.cri.cn/20180415/522127b2-948c-d03d-1a96-37f2c9d1c14d.html>。

## 深化中日经济合作，助推 “战略互惠关系”

张薇薇

【内容提要】2008年，中日两国签署了《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但自2010年开始中日关系经历了一系列挫折，战略互惠关系的推进也受到不利影响。以2014年底中日达成改善关系的四点原则共识为起点，中日关系逐渐积累改善势头。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正式访问日本，显示中日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也获得新的推动力。当前，无论是中日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还是国际环境，相较十年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把握中日经济合作的新契机，挖掘两国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的合作增长点，深化务实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是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过，由于受到种种因素影响，中日务实合作的推进并不会一帆风顺，而需要两国政治家审时度势、悉心引导，也需要两国民间精诚合作、克服阻力、共创未来。

【关键词】中日关系 务实合作 战略互惠

【作者简介】张薇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8) 03-0046-14

2018年伊始，中日关系在上年显著回暖的基础上，展现了进一步向好的强劲势头。继1月和4月两国外长进行互访并重启停滞了7年半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后，5月8—11日，中国总理李克强赴日本出席第7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李总理的访问受到日本政府的超高规格接待和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其重点在于推动新形势下中日务实合作的深化。随后，中日两国还会有更多的高层互动。这表明，在历经了多年的波折后，中日关系已经重返正常轨道。2008年两国签署《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后，迄今已逾10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分析中日经济合作的新基础，并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国际形势探讨中日务实合作的新机遇，对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深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一、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演进和特点

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最初是由安倍晋三于2006年其首次出任首相时提出的。其背景是，首相小泉纯一郎2001—2006年执政期间，因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周边国家强烈不满，导致中日关系在小泉时期陷入“冰冻”状态。2006年9月，安倍晋三接任日本首相。仅十多天后，安倍就“旋风式”地访问了中、韩两国，在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提出，将“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务实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sup>[1]</sup>，是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雏形。双方一致同意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安倍此访被舆论称为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2007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开启中日关系的“融冰之旅”。两国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

[1] 国务院公报2006年第33号，《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53187.htm](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53187.htm)。

对“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内涵等进行了详细界定，并围绕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计划。当年7月，安倍内阁辞职，福田康夫接任日本首相。福田于12月访华，开启中日关系的“迎春之旅”，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关系缓和的势头。福田还称，希望2008年成为“中日关系飞跃的元年”。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被称为“暖春之旅”。胡主席与福田康夫首相共同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两国最高领导层面达成共识。这份声明也同《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和《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一起构成了中日关系的四份基础性政治文件。

但遗憾的是，迫于国内政治生态，福田康夫于2008年9月辞去首相职务，由麻生太郎接任。麻生在对华外交上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一面表示继承“村山谈话”，支持中日韩三国“共同繁荣”，其任内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举行了单独峰会；一面又大搞“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价值观外交”。2009年4月，麻生首相到访北京，展开中日关系的“合作之旅”。2010年5月，温家宝总理再度访问日本，与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涉及食品安全、节能环保、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一系列合作文件。至此，中日领导人保持了较高的互访频率，两国政治关系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2010年9月，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先后与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日方对中国渔船实施扣押，并按本国法律起诉中国船长。此举在中日之间掀起巨大的政治风波，两国关系改善的势头戛然而止。2012年9月，日本民主党野田佳彦政权更进一步做出将钓鱼岛“国有化”的决定，背离了两国先前达成的共识，蓄意挑动敏感问题，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随即也采取了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展开巡航等针对性措施，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并一度剑拔弩张。2013年底，再度就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在上任一周年之际悍然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在领土主权争议和历史问题的双重牵绊下掉落谷底，“战略互惠关系”的提法也一度尘封。2014年底，双方就改善



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在北京 APEC 会议上实现会面，中日关系开始了缓慢改善的进程。2017 年伊始，日本政府不断以实际行动表明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两国关系加速回暖。2018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赴日本参加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时隔 8 年正式访问日本，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综观近十几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自提出至今的演进呈现以下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中日两国尚未完全实现战略层面的谅解与互信，“战略互惠关系”中的“战略”一词，更多体现了两国关系发展的目标和愿景，这是造成双边关系屡经波折的深层原因。与相对稳定的中国对日认知相比，十多年来日本政府的对华认知和政策经常处于矛盾和摇摆中。以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为代表的日本主流政治势力对中国的发展抱有复杂心态，既看到中国发展给日本带来的巨大机遇，又担心中国发展可能给日本带来冲击，尤其在政治和安全方面。这一心态所体现出的政策就是“两面下注”：一面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实施对美协调外交，追随美国对中国进行牵制和防范；另一面也推动中日合作，但主要是经贸等领域的具体合作，主张以“政经分离”方式处理中日关系，强调“互惠”而淡化“战略”。<sup>[1]</sup>但历史的经验表明，半心半意的合作很难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入，缺乏战略共识的中日关系容易遭遇颠簸。今年李克强总理在访问中，多次提出希望两国“真正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在行动中”<sup>[2]</sup>，表达了对中日构建更深层次理解与互信的期待。

二是中日两国作为重要近邻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1] 邱静：《“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中日比较的视角》，载《外交评论》2012 年第 1 期，第 106-110 页。

[2] 《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时强调 努力实现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新华网新闻，[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10/c\\_1122809044.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10/c_1122809044.htm)。

地缘接近、经济结构互补、社会和价值观相通，强烈的内生合作需求往往能引导中日关系克服障碍重回正轨。“战略互惠关系”中“互惠”二字是核心与精髓。2006、2007年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和2008年的《联合声明》中，均列举了大量两国可以开展务实合作的领域。今年李总理访日期间，两国就社保、金融、卫生和医学科学、服务贸易等达成了多项具体协议，并提出要对接发展战略，重点培育在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共享经济等领域合作。这显示两国的务实合作并未因前些年的政治波折而停滞，而是在积蓄能量，一旦时机成熟，中日间的合作潜力有望迅速释放。

2017年12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公布的一份面向所有行业、规模的日企的调查显示，在华运营的日企的商业信心指数大幅上扬，有意愿扩大在华业务的企业比例比上年猛增8.2个百分点，达到48.3%；约70.3%的在华日企预计来年将实现盈利。<sup>[1]</sup>无独有偶，日本国际协力银行面向海外运营的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年度调查也显示，2017年针对“未来三年最有前景的海外运营国”一问，有45.7%的日本企业将票投给中国，使中国一举超过印度重新站在该榜的首位。<sup>[2]</sup>

## 二、战略互惠关系的新起点

战略互惠关系提出十多年来，无论是中日各自的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双边经贸关系，抑或是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和务实合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对此，可以从四个角度加以认知。

---

[1] 2017 JETRO Survey on Business Conditions of Japanese Companies in Asia and Oceania, December 21, 2017,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en/reports/survey/pdf/rp\\_firms\\_asia\\_oceania2017.pdf](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en/reports/survey/pdf/rp_firms_asia_oceania2017.pdf).

[2] FY 2017 Survey Report on Overseas Business Operations by Japanes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ttps://www.jbic.go.jp/en/information/press/press-2017/1122-58812.html>.

###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视角

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成功克服了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国家。2013—2016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7.2%，对世界经济平均贡献率达到30%<sup>[1]</sup>，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为主要特点的“新常态”。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工业产业内部，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连续5年保持10%左右的超高增速；服务业成为最大的产业，对整体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50%，2016年更是达到64.6%，远高于出口和资本对经济的拉动。<sup>[2]</sup>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将进一步转型，并由此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

### （二）日本近年的经济发展

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以“安倍经济学”为口号，先后推出两套“三支箭”经济刺激方案，但从实际效果看，却是毁誉参半。一方面，安倍执政期间，日本开始了战后第16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截至2018年3月，已经持续60多个月，是仅次于“小泉景气”的战后日本第二长的经济景气期。5年多来，日本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有不俗表现，如股指上升、失业率下降、政府税收增加、企业收益大幅提高等。但另一方面，“无实感”成为本轮扩张期的最大特征。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偏低，2013—2017年度的GDP实际增长率分别为2.6%、0.0%、0.5%、1.2%和1.6%，以及由于工资上涨幅度太低而导致国民消费低迷等。日本广播协会(NHK)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9%

[1] 《国家统计局公布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绩单”》，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10/10/t20171010\\_26488461.shtml](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10/10/t20171010_26488461.shtml)。

[2]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这些重大变化》，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om.cn/2017/1011/498950.shtml>。

的受访者感受到了经济复苏，而未感受到的达到 56%。<sup>[1]</sup>

从中长期看，日本经济增长的前景受制于一些顽疾。首要就是人口结构的进一步老龄化。尽管日本政府在应对“少子化”问题上动了很多脑筋，但劳动人口持续减少的趋势仍难以扭转。2017年，15-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只占总人口的60.8%；2030年，这一比例将可能进一步降至57.2%。<sup>[2]</sup>这不仅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源，也大大制约了日本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老龄人口比例的提升还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又会进一步挤压其他财政支出的空间。

### （三）中日双边经济关系

伴随两国经济社会的动态发展，中日双边贸易和投资状况也经历了显著转型。

1、双边贸易方面。在经历连续数年下跌后，两国贸易于2017年实现止跌回升并重现强劲增长。据日本海关统计，2012—2016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同比分别增长0.3%、-8.1%、-2.8%、-15.3%，和-1.6%，惊现四连跌，但2016年跌幅明显缩小。2017年，中日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97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9%。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1,328.6亿美元，增长16.7%；自中国进口1,644.2亿美元，增长5.0%。中国继续成为日本第二大出口贸易伙伴，与其第一大出口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差距缩小至占比0.3%；中国还继续坐稳日本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地位，与其第二大进口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占比差距达到13.8%。<sup>[3]</sup>另据最新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中日贸易额达757.3亿美元，同比增长10.1%，

[1] 张季风：《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析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载《日本学刊》2018年第2期，第26-30页。

[2] 刘畅：《日本经济中长期展望》，载《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第5期，第112-113页。

[3] 商务部：《2017年日本货物贸易及中日双边贸易概况》，[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57703](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57703)。

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sup>[1]</sup>

2、双边投资方面。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经历调整后走出低谷，而中国对日投资开始创出新局面。日本长期以来是中国接受外来投资的主要国家之一。但自2013年开始，日本对华投资连续负增长，到2016年一季度缩减至108亿美元，不足2012年时的一半。<sup>[2]</sup>那几年，各类面向日本企业的问卷均得出相似的结论，即日企对华投资意愿大幅下滑。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日政治关系不稳定引发日企对投资安全性的忧虑上升，也有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不少日企竞争优势减弱的原因；此外，中国劳动力要素价格上升、人口红利缩小，作为“加工基地”的优势显著减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随着中国国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国作为巨大消费市场的潜力凸现，使对市场嗅觉灵敏的日本企业开始逐步调整对华投资布局。经过数年调整，201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稳步上升，一举超过2012年的水平，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日本对外投资的第二大对象国。<sup>[3]</sup>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中国企业实力增长、加大“走出去”步伐，中国对日投资也在不断开创新局面。最初，中国企业瞄准日本传统制造企业的品牌和技术优势，以并购为主要方式投资日本。2011年以后，先后发生了海尔集团收购三洋白色家电业务、美的集团收购东芝80%的白色家电业务、联想集团收购NEC个人电脑业务和富士通个人电脑业务51%股权等多起大型并购案。目前，中国对日投资已经迅速扩展到消费和服务领域，其中通信、房地产、旅游服务、研发等领域备受中国企业青睐。途家、携程旅行、万科集团、摩拜单车等纷纷落地日本，刮起“中国旋风”。2018年春，阿里巴巴亦将在日

[1] 《李克强总理即将访日，中日经贸数据抢先看》，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5/08/content\\_5289165.htm](http://www.gov.cn/xinwen/2018-05/08/content_5289165.htm)。

[2] “Japan's Outward and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apanese Trade and Investment Statistics”，<h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3] Ibid. 同上。

本推出手机支付服务，并计划在年内把利用支付宝结算的商户扩大到 5 万家。据日本银行统计，2016 年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已达 4,372 亿日元。<sup>[1]</sup>

#### （四）国际环境的影响

近两年，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开始回暖。2017 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均显示出较强劲的复苏态势，全球范围内贸易和投资增长势头良好。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回暖的基础仍不稳固，经济尚未返回强劲、可持续发展的轨道。<sup>[2]</sup>与此同时，世界也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巨大压力。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坚持美国利益优先，不断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力度，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定出尔反尔，或要求重新谈判（如北美自贸协定、美韩自贸协定），或执意退出（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此外，美国还采取多项贸易救济措施，如对进口钢铝产品征税，基于本国法律开展“301 调查”、“201 调查”等。特朗普政府的举措凸显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风险。中日两国都以美国为重要贸易伙伴，其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无疑也在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在各主要国际场合旗帜鲜明地倡导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5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沿线 80 多个国家的响应和支持，已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潮流。而日本也是自由贸易和多边合作的坚定支持者。2017 年，日本与欧盟达成经济合作协定（EPA）框架协议，今年又推动 TPP 剩余 11 国最终签署 TPP11。今后，加速中日韩自贸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将是中日两国共同的工作重心。<sup>[3]</sup>这对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无疑是重要利好。

[1] 《日媒：源自中国的新商业形态正不断进入日本》，人民网新闻，<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7/0823/c35421-29489870.html>。

[2] 何七香，田丰：《2017 年世界贸易与投资形势回顾与展望》，载《国际经济合作》2018 年第 1 期，第 31 页。

[3] “日中韩ビジネスサミット 安倍総理スピーチ”，日本国首相官邸，[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8/0509jck\\_business.html](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8/0509jck_business.html)。

### 三、深化中日务实合作的新路径

经济关系和务实合作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同时也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在新的国际背景和基础上，找准合作点，为两国经济界的沟通和协作创造有利条件，是深化中日务实合作、不断扩大两国共同利益的必由之路。

（一）挖掘中日双边经济合作新的增长点，充分提振两国企业界合作的信心，为双方经济深度融合打下坚实基础

伴随着两国经济关系的升级转型，高端制造、服务、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医疗保健、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旅游等诸多领域正成为双边经济合作新的增长点。

1、日企深入中国高端制造、节能环保等朝阳产业领域。由于中国国内产业和消费市场升级，日本的传统优势领域——制造业在中国市场也面临洗牌。在低端制造业不断收缩的同时，中高端制造业，如高端电机、运输设备、工业机器人、医药及医疗器械等，则开始扩大生产和销售网络。以医药领域为例。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老龄化社会趋势的显露，中国市场对中高端医药及医疗器械的需求潜力巨大。制药和医疗产业是日本的优势产业，而中国本土企业在这一领域竞争力较弱。嗅到广阔商机后，日本的制药公司纷纷在华扩大投资。如武田药品、大冢制药、卫材医药等近年都展开了大规模投资并购活动。

节能环保领域是中日企业合作的又一个亮点。30 年的高速发展既给中国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也引发了较严重的环境问题。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做好节能减排是中国政府近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很高的高度，这进一步表明，未来中国对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的需求非常可观。日本经历过与中国相似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術优势。中日两国在节能管理、资源循环利用、新能源汽车开发、清洁煤技术等方面拥有广阔合作空间。从 2006 年开始，两国每年都会举行

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11年来，两国累计达成合作项目337个，涵盖政策研究、技术研发、项目投资等多个方面。

2、中国龙头企业进军日本市场。在数字支付、共享经济、通信技术等领域，正涌现出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努力进军日本市场。如中国的摩拜单车、OFO均已在日本地方城市落户。支付宝正全力拓展在日本的业务。此外，即使在日本相对非常封闭的通讯领域，中国公司也有所斩获。2018年5月，中国通讯巨头华为与日本软银（Softbank）、NTT多科摩（NTT DOCOMO）和AU三大运营商签订合作协议，这意味着华为正式进军日本通讯市场。<sup>[1]</sup>

3、中日企业已经开始在尖端科技经济领域展开合作。这对打破美国在某些领域的全球技术垄断和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有重要意义。比如，日本软银集团与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等通讯企业已经开始联合在5G领域展开研发和测试，可能共同引领行业潮流。2018年6月，软银集团又宣布将其旗下芯片制造商ARM51%的股份出售给中国厚安创新基金，并成立合资公司。该公司将向中国公司授权半导体技术，并将开发新的专利。<sup>[2]</sup>此外，中国国家电网与日本CHAdeMO协会已就合作研发电动汽车新一代充电规格展开接洽，若合作得以实现，两国或将掌握国际统一规格的主导权。<sup>[3]</sup>

4、中日企业间积极开展资本合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中信股份、伊藤忠商事和正大集团于2015年初签订三方合作协议，联手建立战略联盟。日本软银集团先后投资阿里巴巴、OFO等中国企业获得巨大成功。另外，许多中日企业瞄准中国民众对日本产品的庞大需求，在跨境电商、旅游服务、

[1]《华为联手软银，日本成华为继美国后第二个“阵地”？》，科技新报新闻，<https://technews.cn/2018/05/17/huawei-p20-and-mate10-enter-the-japanese-market/>。

[2]《软银出售ARM51%股份 交易价格7.75亿美元》，财新网新闻，<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8-06-05/101263639.html>。

[3]《日中或合作开发EV充电新规格主导国际标准》，日本共同社新闻，<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5/3891f3439367-ev-.html>。



金融保险等领域的业务合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二)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前景广阔，这也将是中日下阶段经济合作的重点之一

日本政府已显著转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在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安倍首相强调，中日关系已从“竞争到协调”进入“协调的时代”，并称“中日携手没有做不成的事情”。<sup>[1]</sup>回想2015年，安倍晋三曾抛出“高质量基础设施计划”，以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此番表态可谓重大方向性转变。中日双方同意在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下设立“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并与民间经济团体共同举办“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sup>[2]</sup>，这将显著推进双方的协调与合作。事实上，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而言，中国在资金实力、低成本、迅速决策等方面优势明显，而日本企业依然占据一定程度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并且在开拓和运营海外市场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今后，两国企业释放互补优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的机遇正不断涌现。

基础设施领域将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以高铁为例，中国的高铁在硬件设施方面质优价廉、竞争力强，而日本的高铁技术在车辆电气系统、信号系统、车站设计与管理等方面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如果两国相关企业能设立合资公司参与竞标或联合投标，就可避免恶性竞争，达到双赢。此外，在全球高铁市场中，既有高端市场也有中低端市场，中日企业加强事前磋商、合理分配资源，也有助于各自获得收益保证。

国际物流合作亦是合作的热门领域。日本大型物流公司，如日本通运

---

[1] “中国文化展示会及び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40周年記念 李克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総理歓迎レセプション”，日本首相官邸新闻，[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actions/201805/10china.html](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actions/201805/10china.html)。

[2] 《中日经济合作将迈上新高度》，人民网，<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8/0511/c35421-29978823.html>。

株式会社、日新株式会社等，均对参与“一带一路”跨境物流运输兴趣浓厚。因为信息化起步较早，日本物流公司早已实现高度机械化、自动化和计算机化，拥有很强的国际运输实力。中日两国毗邻而居，两国的物流企业加强合作、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开辟的通道开展跨境运输，无疑能够增进双方乃至多方的共同利益。

在产能合作方面，中日企业也各有优势。如节能环保领域，日方有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中方有绿色装备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源，双方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就可以在清洁能源开发、装备制造绿色化等方面为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带去福音。此外，日本的企业早在数十年前就开始了开拓海外市场的努力，有一整套成熟的操作规范，且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为数众多的网点。比如日本的大型商社和银行等业务遍及全球，拥有丰富的海外业务经验。它们有强烈的意愿为“走出去”的中方企业提供第三国招标信息、介绍合作伙伴、提供法律咨询、建立分支机构等“一条龙”服务（日方称“代行”）。中资企业通过与之合作可以获得“走出去”所亟需的经验和信息。

另外，在融资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数额庞大，显然无法通过中国一家完成全部筹资。通过中日两国金融机构的合作，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之间的合作，融资目标将可以更快达成。目前，已有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瑞穗银行等日本主要商业银行承销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债券的案例。根据日方最新表态，日本官方的金融机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也将与中国金融机构合作，为“一带一路”项目开展融资。

总之，经过改革开放40年，在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际，中国与最重要的邻国日本，作为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终于实现了双边关系的转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开展务实合作已然具备了新的基础并获得新的推进契机。两国自当牢牢把握机会，以经促政、以政推经，争取早日形成经济深度融合、政治健康稳定、合作引领区域发展的双边关系新

局面，为战略互惠关系注入新能量。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清楚地看到，尽管面临合作机遇，中日开展务实合作仍然可能遭遇急流险滩。其中，政治互信仍然最为关键。迄今为止，日本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和中日两国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定位仍感到不确定，中国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限制、着力发展军事力量的动向也感到担忧，这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日务实合作的深度。比如，对于软银集团近年积极与中国企业开展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日本政府抱有警惕态度。显然，政府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他日本高科技公司的合作意愿产生影响。

日美同盟也仍将继续成为影响中日合作的重要第三方因素。当前，特朗普政府专注于削减美国贸易赤字，热衷通过双边贸易谈判压迫对手作出最大程度让步，对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开征高额关税以作为施压手段，引发多方强烈不满。日本社会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的不信任感弥漫。但日本政府仍将与美国的同盟确立为日本外交的基石，并跟随美国要求，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开展着眼于限制和规范中国崛起的军事合作，这不可避免会为中日政治互信的构建蒙上阴影。

还应该看到，中日务实合作的深化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两国政治家审时度势、发挥智慧，创造条件、悉心引导，也需要两国民间克服困难、精诚合作。只有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才可能实质性向前推进。

【收稿日期：2018-06-09】

## 新时代周边外交中的上海 合作组织再定位思考

许涛

【内容提要】上合组织成立 17 年来，由合作解决冷战后中国与原苏联相邻共和国边境军事安全问题起步，逐步向非传统安全、经济恢复与发展、人文交流与合作等重要领域延伸，成为中国外交在欧亚地区的重要支点。在 2017 年 6 月举行的阿斯塔纳峰会上，上合组织完成了历史上首次吸收新成员的组织行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更加丰富了上合大家庭的多样性，同时也使其组织发展与机制建设面临更复杂问题。中共十九大为中国外交提出了更具时代感的要求，在全球化不均衡发展使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背景下，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创造有利外部条件，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周边为重心，上合组织仍然将是不可替代的支点之一。

【关键词】新时代 周边外交 上合组织

【作者简介】许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上合组织国家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8) 03-0060-15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立 17 周年，是“上海五国”论坛正式确立 20 周年<sup>[1]</sup>，也是中国第四次以东道主身份主办上合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在 20 年的历史跨度中，上合组织的发展、完善及其对欧亚地区与世界产生的影响，成为中国外交、尤其是中国周边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后 20 年取得举世瞩目成就营造了必要的良好外部空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 40 个年头，不仅当今的中国和世界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上合组织自身也在成分、体量、影响力上与成立之初大不相同。习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概念，并系统阐释了新时代的中国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任务。面对全新的形势和任务，对上合组织的今后发展方向和功能创新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思考，显然十分必要。

### 一、上海合作组织对冷战后中国周边外交的贡献

20 世纪 90 年代，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戛然而终。苏联解体造成的中国东北、北部、西北周边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 18 世纪下半叶以来不曾有过的重大变化。原本依托于沙皇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治强权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萎缩和瓦解，长期存在于中国北方、西北方的强大政治意识形态压力和军事安全压力骤然下降。曾经以二战后世界上超级大国自恃的强大霸权中心碎片化为大小不等的新生民族国家政权，其影响力与沙俄和苏联时代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这场历史性巨变对当时中

---

[1] 冷战结束后，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5 国分别于 1996、1997 年在上海和莫斯科共同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后，5 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提议下于 1998 年在阿拉木图举行会晤，积极探讨共同面临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从此开启了被称为“上海进程”的地区合作早期阶段，这一定期的五国领导人会晤机制被称为“上海五国”。

国的影响既是宏观的、战略性的，也是具体的、战术性的。一方面，北方霸权的消失使持续威胁中国数十年的强大战略压力基本解除；另一方面，同样由于以莫斯科为核心的超级大国解体，原苏联地区内政治影响力和制度管控有效性大大下降，一些此前处于受压制状态的社会因素（如民族主义思潮、极端宗教情绪等）开始活跃起来，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甚至达到失控和蔓延的程度。这种正负效应叠加的形势对中国冷战后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时任中国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这一重要历史性变化对成功坚持改革开放的时代意义，以思路上的创新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指导外交战略转型，在中国主要的陆上疆域周边逐渐营造出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这一建立在冷战后对地区及全球局势清醒判断前提下的外交实践，在早期建立和经营上合组织的过程中有着充分体现。

#### （一）实现了传统安全观的及时转变，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众所周知，上合组织及其雏形“上海五国”的形成起源于中国与原苏联解决两国边境军事安全问题的谈判。其实，中苏双边谈判进程在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sup>[1]</sup>和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海参崴讲话”<sup>[2]</sup>后已经重启并逐步深入。尽管这一进程曾因边境驻军、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等重大问题受阻，但在10年间毕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尤其是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和1991年江泽民访苏时分别签署的《中苏联合公报》，定下了“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的双边关系发展基调。<sup>[3]</sup>然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于1991年底签署的《别洛韦日协定》宣告了苏联的解体。中苏边境谈判已取得的成

[1] 吴跃农：《从“塔什干讲话”到“海参崴讲话”：中苏关系正常化历程（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098926.html>。

[2] 周晓沛《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45页。

[3] 徐天新、梁志明、谭圣安《当代世界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98页。

果就此付诸东流还是积极扩展？这个问题考验着中国和解体后原苏联相关各国领导人的历史智慧和政治魄力。

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于1996、1997年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先后共同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两个文件不仅成功化解了5国由冷战时期继承的历史负遗产，而且标志着5国在共同的意愿下摈弃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和冷战零和理念，开创了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范例。面对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传统的军事安全问题基本解决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很快成为各国安全合作的中心话题。“上海五国”1998年的《阿拉木图联合声明》关于“携手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等地区恶势力的共同职责”的表述、5国安全执法部门领导人于1999年签署的《比什凯克合作与相互协作备忘录》，以及关于成立“比什凯克小组”的决定<sup>[1]</sup>，都表现出各国政府对合作安全转向更现实、更深入层面的迫切需求。而2001年上合组织正式成立时各成员国（除“上海五国”外，还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共同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和2004年成立的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则标志着这种从合作观念到合作方式的转变进入了机制化的阶段。

（二）通过合作安全建立起政治互信，为冷战后中国外交拓展必要的活动空间

在包括“上海五国”论坛和上合组织成立与发展的“上海进程”中，成员国之间经过签署和落实《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以及针对欧亚地区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的协商与合作，建立起一种政治上的互信和策略上的默契关系。这种政治信任关系的基础不是军事上的结盟与保护，也不是经济上的

---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144—145页。

分工与依附，而是在共同威胁面前的政策沟通和共同发展环境上的协商合作。2001年发表的《上合组织成立宣言》宣布，“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sup>[1]</sup>2002年公布的《上合组织宪章》在第一条“宗旨和任务”中又进一步明确和强调，“本组织的基本宗旨和任务是：加强成员国间的相互信任和睦邻友好；发展多领域合作，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平等伙伴关系基础上，通过联合行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均衡发展，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条件；在参与世界经济的进程中协调立场”。<sup>[2]</sup>

当我们回过头去观察十几年来的上合组织发展历史，仅从中国冷战后外交成就的角度来看，起码有三个对今天中国新时代外交依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建树：一是在冷战后力量对比发生颠覆性变化后的国际社会，凭依地缘关系建立起一个互信互利的朋友圈，通过这个国际合作平台在地区和全球性事务中集体发声，宣示存在的权力与发展的诉求；二是创立新型国际合作模式，探索21世纪人类社会国家关系避免重蹈二战和冷战覆辙的新思路，以组织发展和影响扩大的不争事实，证明无需结盟对抗的国家间合作亦能保障共同安全利益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三是针对冷战后国际政治体系存在的问题，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积极促进国际

---

[1]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4636.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zywj_683106/t4636.shtml)。

[2]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官方网站，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MicrosoftEdge\_8wekyb3d8bbwe/TempState/Downloads/SCO\_Charter.pdf



政治民主化。中国作为“上海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和上合组织的首创者之一，直接参与了上述组织的政治建设。毫无疑问，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特色与印记也鲜明地反映在上合组织的发展轨迹之中。

### （三）促进经济合作机制化建设，助力新世纪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发展方向上的深刻转变。生产关系的解放如春风唤雨般调动出了中国大地上压抑多年的生产能力，仅仅十多年的时间就使国内市场上食品、服装等消费品趋于饱和。但是，中国国内原材料和销售两个市场的资源不足也早已显露出来。中国经济走出国门势在必行。同时，俄罗斯及中亚各国刚刚经历苏联解体时旧有国民经济体系断裂的影响，不仅尚未建立起独立的产业体系，而且多数国家都未能从苏联强大的计划经济骤然崩塌的破坏性影响中走出来。面对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建立一个共同的、互补的、通畅的区域性经济活动空间是当时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明智选择。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支持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鼓励利用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改善成员国运输中转潜力；致力于发展能源体系、合理利用自然环境、共同制定环保方案；为逐步实现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创造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条件。对此，现任上合组织秘书长拉希德·阿里莫夫给予高度评价。在《宪章》的法律基础上，一系列文件为成员国在上合组织内部的经济合作提供保障<sup>[1]</sup>，其中包括2001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至2020年）》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落实措施计划》（2004年9月比什凯克）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推动项目合作的措施清

---

[1] Рашид Алимов: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17г. с. 175.

单》(2012年12月、2016年11月比什凯克)等。

上合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为组织所在地区营造了发展经济联系的广阔空间,使各成员国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彼此提供相对优化的经济发展环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功能的建设,在中国周边地区营造出一个可以平等协商、优势互补、平抑风险的共同发展空间。这对改革开放正在逐渐进入“深水区”的中国经济而言,无疑是周边经济外交的一大成功。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金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内政策中心主任阿姆列巴耶夫·艾达尔·摩尔达硕维奇(Амребаев Айдар Молдашович)认为,中国努力推动上合组织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主要完成了两大战略任务:“一是扩大了上合组织的‘经济篮子’,同时还为中国提升对外和周边影响力创造了机会;二是强化了中国在全球政治影响中所占比重,同时由于几个有分量的新成员的加入,上合组织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sup>[1]</sup>

回顾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中国经营这样一个由解决边境安全问题发展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为丰富和完善新世纪周边外交建立了支点,创造了机会,赢得了时空。当中国持续推动“上海进程”20多年后,一些早期的“红利”至今仍在延续和发酵。但必须看到的是,当今国际环境与上合组织自身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 二、国际环境与中国新时代周边外交任务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当今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世界形势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宏观判断,“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

---

[1] [哈]阿姆列巴耶夫:《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及面临问题》,贝文力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6),时事出版社,2017年8月,第327页。

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sup>[1]</sup>这一重要判断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它不仅涉及各国、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也将影响彼此间的关系和普遍规则的制订。然而，面对这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期，并非每个国际社会成员都是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时代观作出判断和应对，尤其在遭受全球性金融危机打击数年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消费、投资、出口这传统的“三驾马车”同时疲软的情况下。

源自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造成发展的空前不平衡，在相应的机制化保障还没有完善起来的阶段，时时处处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处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全球化进程不同地位上的国家与族群产生空前的危机感。首先感受到这种普遍的危机意识并做出超常反应的是处在时代边缘的国家与族群，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成为向忽略其存在的主流社会显示存在与诉求的方式。

由于冷战思维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仍保留着相当强大的影响力，试图借反恐合作使各国重新联合起来的努力付诸东流，严重的分歧甚至引发国际社会更加深刻的分裂。接下来是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能否在全球化时代共存？这些疑问已经不仅仅是学者和政治家们担忧的话题，而且在一些敏感地区成为民粹主义者采取极端行为的思想依据。最终是对现行体制和现有秩序的怀疑，以自由资本主义为经济基础的西方“民主政治”传统被粗暴抛弃，经长期磨合逐渐完善的精英政治在民众中失去信任，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反智主义推动着西方国家演绎着一出出“黑天鹅事件”。同时，也转向以封闭、甚至敌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视的心态看待其他力量的存在和发展。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大背景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复杂而严峻的外部环境变化，不仅是对中国全面决胜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考验，而且也是对曾经作为中国外交战略支点之一的上合组织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挑战。归纳起来主要包括这样几重压力：

一是发展定位上的压力。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不仅让世界瞠目结舌，也大大超过了中国人自己的预期。传统的守成大国们的反应越来越直接表现出不安、恐慌，甚至是敌意，而周边国家更是心态复杂，戒备、猜疑，甚至是抵制。首先，美国已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未来会挑战自己霸权地位的对手。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倡议”无意挑战美国的地位，中国不仅没有“称霸世界的计划，也无意用中国的‘新时代’取代美国的‘旧时代’”。<sup>[1]</sup>但在经济全球化同样给美国社会和精英阶层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之际，“鹰派”人物把控美国政府的话语权，“中国威胁论”再次甚嚣尘上。2017年12月出台的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不仅多次提到中国，而且将中国设为具有威胁的战略竞争对手。<sup>[2]</sup>同时，美智库欧亚集团发表报告，预测2018年全球十大风险，排名首位的便是中国崛起。<sup>[3]</sup>面对全球战略力量不均衡发展，守成大国又重拾零和博弈思维，这势必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阻力。

二是经济转型上的压力。中国经济虽然走上世界第二的位置，但发展模式正处在由传统模式向全面创新转变的关键期。2017年中国GDP达到

---

[1] 崔天凯：《我们无意用中国的“新时代”取代美国的“旧时代”》，中国新闻网，2018年4月20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8/04-20/8495716.shtml>。

[2] 《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多次提及中国 国防部回应》，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8/01-20/8429287.shtml>。

[3] 李勇、范凌志、张鑫、魏辉：《美国智库凭什么说，中国是2018全球最大风险？！》，环球网，<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8-01/11496260.html>。

82.7 万亿元，但人均水平仍很低。尤其中国制造业创造的产值虽已达世界第一，但仍处于产业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换代的艰难过程中，不仅与美国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而且连欧盟和日本的现阶段水平都未达到。特别是中国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南北之间无论是在发展水平方面还是在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差距还比较大。<sup>[1]</sup> 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主要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2]</sup>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全面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现实的世界经济关系变化并不尽如人意。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的内政外政策后，在 2018 年开春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 301 法案调查结果，宣布将对价值 600 亿美元的约 1,300 种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并购，由此挑起中美贸易争端。以此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行为使中国经济发展遭遇空前阻力。

三是组织建设上的压力。2017 年，阿斯塔纳峰会正式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为该组织的发展增添了新活力，不仅合作范围和影响力由以中亚为中心的欧亚地区扩大到南亚，而且也各成员国借助这一国际组织应对内外风险和实现既定发展战略提供了更大空间与可能。但同时，由于代表着不同于创始成员国的政治文化和国家体制的印、巴加入，组织内部差异性增大，原有的政治信任和默契关系水平下降，能否继续保持组织合作效率面临考验。

在这样多重叠加的压力面前，以上合组织为重要支点的中国周边外交能否继续有效发挥应有作用，为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拓展空间、化解阻力？根据新时代的形势变化和任务转型，有必要对上合组织当前及今后的功能定位作一番深入思考。

---

[1] 郑必坚：《新时代中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人民网，[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5/09/nw.D110000renmrb\\_20180509\\_1-07.htm](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5/09/nw.D110000renmrb_20180509_1-07.htm)。

[2] 新华社：《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18/c\\_1121819978.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18/c_1121819978.htm)。

### 三、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中上合组织定位思考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0年，也是中国第四次主场举办上合组织峰会和正式吸收印、巴后的第一次峰会。曾经作为中国周边外交重要支点的地区性合作机制，上合组织也进入了一个升级版的新周期。3月8日，王毅外长在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上，提出了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三大任务：增强凝聚力、提高行动力、扩大影响力。<sup>[1]</sup>4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集体会见来北京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的各国外长和上合组织秘书长、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主任时表示，“新形势下，我们一要不忘初心，坚定弘扬‘上海精神’；二要发挥优势，充分释放扩员潜力；三要开拓进取，锐意推进全面合作”。<sup>[2]</sup>鉴于地区与全球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上合组织自身发展，从承担中国新时代大国外交使命与继续经营外部周边有利环境目标出发，本文尝试就上合组织近期职能定位作以下思考。

（一）应成为加强成员国间政治互信的平台。针对全球和地区形势发生的急剧变化以及有影响的重大事件，各成员国领导人在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上协调立场、沟通意见已成为机制化传统。在经过2017年阿斯塔纳峰会正式完成扩大成员国工作后，青岛峰会面临的组织政治建设任务十分突出。印、巴两个新成员国的加入，客观上使原有的政治互信水平相对降低。同时，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急剧变化中也在发生着战略力量的重组。克服分歧和疑虑，是当前上合组织维护信任关系、增强凝聚力的关键步骤，也是进一步完善组织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利用新旧成员国地缘利益接近的特点，通过青岛峰会及其后一系列不同层级的活动，在元首间产生就重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进而为峰会后的

[1]《王毅谈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shipin/cns/2018/03-08/news759763.shtml>。

[2]《习近平集体会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外方代表团团长》，人民网，[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4/24/nw.D110000renmrb\\_20180424\\_3-01.htm](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4/24/nw.D110000renmrb_20180424_3-01.htm)。

上合组织活动奠定政治互信基础。

（二）应成为强化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平台。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向来是上合组织的重要方向，这一方面取得的合作成果和建设成就也是赢得各成员国和国际社会信任与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17年来，世界与周边地区出现过多次动荡与骚乱，而欧亚地区却基本能够保持稳定，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有效安全合作功不可没。作为这样一个高效的安全合作平台，上合组织在青岛峰会后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职能：一是针对地区安全形势新变化，就参与中东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人员回流、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跨国毒品走私、网络安全等问题进一步加强合作力度，协调成员国执法部门在情报信息、司法协助、执法标准等方面密切配合；二是推动安全合作向非传统领域转化，提高地区生态安全危机意识，在成员国合作关系中树立“生态友好”理念，将水资源、人口、粮食安全等问题纳入安全合作范畴；三是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的工作职能，在继续加强司法、情报、技术专家层面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健全打击毒品犯罪、信息安全合作等方面的专业化建设；四是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安全观弥合印巴加入后出现的安全观差异，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理念指导未来地区安全合作，在维护地区稳定发展环境的一致需求前提下形成最大“公约数”。

（三）应成为对接不同经济发展方案的平台。

上合组织现任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先生指出，“为了不断提高和改善各成员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条件，基于权力平等的伙伴关系，通过联合行动，促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也要在与世界经济接轨过程中协调立场”。<sup>[1]</sup>的确，上合组织在经济领域的成就不仅仅在于直接促成或指导完成本区域内具体的多边及双边合作项目，更重要的作用是在于为所有成

---

[1] Рашид Алимов: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17г. с. 83.

员国经济发展和相互间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氛围。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区域或次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合作模式和发展方案普遍出现。在上合组织空间里，已有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组织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2018年3月，首届中亚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阿斯塔纳举行，新版“中亚经济一体化”愿景和方案呼之欲出。<sup>[1]</sup>随着印、巴的加入，极有可能在上合组织空间里出现带有南亚特色的一体化方案或经济联通倡议。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方案多元化的趋势已经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地区显现，协调和对接这些不同取向、不同组合、不同类型的多边经济活动，将成为上合组织未来在经济合作领域中的又一重要职能。2015年，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签署联合声明，表示“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确保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双方将秉持透明、相互尊重、平等、各种一体化机制相互补充、向亚洲和欧洲各有关方开放等原则，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平台开展合作”。<sup>[2]</sup>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工作正在不断深入。这一过程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将为上合组织空间内其他经济活动的协调与对接提供借鉴。

（四）应成为实现多样文明包容与繁荣的平台。从欧亚地区到南亚地区，上合组织包含了世界上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2018年3月，上合组织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在参加“新时代上合组织新发展”国际智库论坛时引用哈萨克斯坦国家通讯社的报道称，目前上合组织成员国覆盖了欧亚大陆

---

[1] Виктория Панфилова: Центральнoазиатский саммит пройдет без России: Лидеры стран региона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 разницу между кооперацией и интеграцие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5.03.2018. [http://www.ng.ru/cis/2018-03-15/6\\_7190\\_sammit.html](http://www.ng.ru/cis/2018-03-15/6_7190_sammit.html).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全文）》，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09/c\\_127780866.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09/c_127780866.htm)。



领土的 60% 和世界人口的 40%。<sup>[1]</sup> 在这样一个广袤地区生活着 200 个以上的民族和族群，使用的语言超过 100 种，信奉着 10 种以上的宗教。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空间推动合作，弘扬“上海精神”中“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内涵，在文化上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的人文环境就显得尤其重要。2017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演讲中建议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成“文明之路”，并提出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智库多层次合作方向。<sup>[2]</sup> 这不仅仅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促成民心相通的基本任务，也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巩固政治、安全、经济等政府间合作的重要民间基础。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积极促进各成员国人文合作和文化交流，必将是本组织青岛峰会后的重点发展方向。

（五）应成为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和推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平台。上合组织完成扩员后，其成员基本是由发展中国家构成，中国、俄罗斯、印度又占了代表新兴经济体的“金砖五国”（BRICS）的 3/5。面对目前世界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各成员国普遍有优化发展环境的共同需要，有参与国际社会基本关系规则制定的诉求。以上合组织为平台反映各成员国呼声，并作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积极参与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新秩序建设，通过集体行动促进共同发展环境的改善。同时，携手各成员国，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共生、共治、共荣大趋势形成主流意识，以积极态度迎接“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第四轮经济全球化”。<sup>[3]</sup> 并充分重视各成员国均为中国周边邻国的双重身份，以上合组织为团结周边国家的平台，“讲好中国故

[1] 《上合组织秘书长：欧亚正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重要力量》，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80327/2259767.shtml>。

[2]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

[3] 郑必坚：《新时代中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载《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9 日，第 7 版。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sup>[1]</sup>并借助于上合组织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中已经形成的成熟合作机制，促成更多体现成员国间“和衷共济”“亲诚惠容”精神的合作成果，将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地区打造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期示范区。

总之，17年的历史可以看作一个人接近青年的准成熟期，但用同样的时间段考察一个国际组织就显得短暂。从这个意义上看，上合这个年轻的组织身上仍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坚持协商一致原则与提高效率的矛盾、成员国承担义务不同与大小成员国一律平等的矛盾、成员国之间因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分歧产生的矛盾等等。对于一个不同于以往国际组织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而言，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妨碍其凝聚力、行动力、影响力的继续建设和发展。只要各成员国坚持弘扬“上海精神”，秉持《上合组织宪章》规定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认真执行《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条约》规定的内部关系准则，青岛峰会将成为上合组织扩容后重振精神、理顺关系、再度扬帆的集结号。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实践而言，中国周边将是立足点，发展中国家是基本力量，新时代上合组织将以发展中国家为依托，从中国周边起步，承载起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使命。

【收稿日期：2018-05-17】

---

[1]《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_2.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_2.htm)。

##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战的走势与对策

全 毅

【内容提要】特朗普执政后，对美国外贸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2018年以来，随着中美关系进入多事之秋，两国贸易摩擦有演变成贸易战的风险。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经济战，既有中美两国经济长期失衡需要解决贸易平衡问题的经济逻辑，更有中国迅速崛起致使中美实力对比失衡引起美国朝野恐慌的非经济逻辑。针对美国发起的单边行动，中国应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争取协商解决两国的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针对美国发出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稳住阵脚，深化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加强相互沟通，减少战略误判，维持中美竞争与合作的格局，避免滑向全面冷战。

【关键词】贸易摩擦 经济战 “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威胁综合症”

【作者简介】全毅，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常委，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8) 03-0075-14

## 一、中美经济摩擦加剧及其背景

特朗普执政后，对美国外贸政策进行大幅调整，包括上任伊始就签署行政法令使美国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定”(TPP)；就北美自由贸易区进行重新谈判；寻求双边贸易协定，包括重新谈判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提请对货币操纵进行立法，审查美国的贸易伙伴是否存在“有害”行为，对来自中国、墨西哥的产品分别征收45%和35%的进口关税；促进美国企业回流，对美国公司在海外代工并回售美国的产品征收35%关税；调整移民政策，禁止非法移民，包括穆斯林移民以及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等。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顺差，毫无疑问就成了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牺牲品。

实际上，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就进入多事之秋。3月9日，美国宣布对进口的钢和铝分别加增25%和10%的关税，4月2日生效；但同时豁免韩国、加拿大与欧盟等多数国家，而只针对中国、日本和俄罗斯。接着，在3月23日宣布对因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遭受损失的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增25%的关税，这些产品包括航空产品、高铁装备、新能源汽车和高技术产品等1,300多个税项；同时，要求2018年中国削减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相隔10小时，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加征25%的关税，涉及106个税号，总计500亿美元。4月2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美国产的干鲜水果、葡萄酒、花旗参、改性乙醇、无缝钢管等产品加征15%的关税，对美国的猪肉及制品、回收铝等产品加征25%关税，总计约30亿美元，即日生效。在中国做出对美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后，特朗普又宣布将对中国1,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增关税，遭到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的怒斥和反击，不仅表示要奉陪到底，还首次使用“不惜任何代价”的强硬措辞。中美贸易摩擦有演变成贸易战的风险。

此次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既有经济的逻辑，更有非经济的逻辑。从

经济逻辑来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高速发展，迅速崛起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出口从 2000 年的 2,492 亿美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22,749.5 亿美元（占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 13.2%），在 2009/2010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出口国。作为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见表 1）。美国 2015 年对华贸易逆差达到 3,656 亿美元（中国的数据为 2,600 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近 50%。2017 年，中国依然是美国最大的产品进口国，全年美国自中国的进口额高达 5,056.0 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 1,303.7 亿美元，贸易逆差高达 3,752.3 亿美元（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为 2,76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美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逆差的 47%。

历史的经验证明，两国经济长期失衡最终会转化为政治问题，前车之鉴就是美国对日本发动的贸易战。现在，美国同样指责中国对其进行经济侵略，赚取美国的财富。在竞选时，特朗普就在两方面大力攻击中国：首先，他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者”，声称自己将在入主白宫 100 天内，命令财政部长把中国如此定位；其次，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抢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特朗普认为，其前任领导人犯了战略性错误。而其在贸易上打击中国的威胁，获得多数美国人的支持。美国后悔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让中国迅速成长壮大；指责中国未遵守 WTO 规则，对国有企业给予政府支持，并拒绝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从非经济逻辑来看，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战，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造成的国际力量对比失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6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2.75 万亿美元，美国同年的 GDP 为 13.86 万亿美元；2017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2.20 万亿美元，美国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 19.13 万亿美元。10 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从占美国的 19.8% 迅速增长到 63.7%，经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变得更加奋发有为，在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对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等美国主导的金融

机构构成挑战，而美元的霸权地位也受到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中美实力对比上的迅速变化，影响着美国战略精英对外部威胁的判断。当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日本名列第一》和石原慎太郎叫喊《日本可以说不》后，引起了美国警觉；2012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写出《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新世界秩序的诞生》一书后，也引起西方世界的震惊。因此，特朗普和美国政府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是美国发展战略及其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表1 中美贸易十数年来数据一览表<sup>[1]</sup>

年份	中美贸易总额	同比增长	顺差	同比增长	美国总逆差	同比增长	中国占比
2005	2853.0	23.3	2616.3	24.5	7665.6		26.30
2006	3430.0	20.2	2325.5	15.4	8179.8	6.7	28.40
2007	3866.8	12.8	2562.1	10.2	7945.0	-2.8	32.20
2008	4092.5	5.8	2663.3	4.0	8000.0	0.7	33.30
2009	3659.8	-10.2	2268.3	-15.4	5009.0	-37.4	45.27
2010	4568.2	24.9	2730.7	20.4	6346.0	26.7	43.00
2011	5032.1	10.2	2954.6	8.2	7264.0	14.5	40.60
2012	5362.3	6.5	3150.5	6.7	7289.0	0.34	43.20
2013	5821.0	4.9	3381.0	1.2	6880.0	-5.6	49.10
2014	5906.0	5.1	3426.3	7.5	7217.0	4.9	47.50
2015	5980.7	1.3	3656.9	6.6	7371.0	2.1	49.60
2016	5785.9	-3.5	3470.4	-5.5	7368.0	-0.04	47.10
2017	6359.7	10.0	3752.3	8.1	7962.0	8.1	47.12

[1] 表中中方与美方统计存在出入，此处尽量以美国商务部统计口径（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index.asp>。

2017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认为世界进入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将中国、俄罗斯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宣告以往美国对华战略失败。2018年1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声称，美国安全的首要关切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中俄首当其冲。《核态势评估》报告则将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并列，视为美国核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将中国定义为：(1)修正主义国家；(2)战略竞争对手；(3)经济侵略者。美国官方权威报告如此高密度、赤裸裸地将中国列为主要挑战，甚至威胁，对塑造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的环境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这不难让人联想起美国在1985年将日本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后，调动一切资源进行打压的先例。据此，美国将会调动一切资源来遏制和打压中国，中美关系的性质正在经历历史性转折，即中美关系将由过去的“接触+遏制”，转变为“竞争+遏制”。当然，正如特朗普所言，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并非没有合作，但未来竞争和对抗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

当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后，两国将不可避免地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中国海洋研究所教授莱尔·J·戈德斯坦指出，近来美国政治生活中充斥着“中国威胁综合症”——中国正在蚕食美国的产业竞争力；中国间谍渗透进美国的科技教育系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为基于秩序规则的朝贡体系，正威胁着基于规则秩序的现有世界体系；中国在南海造岛将威胁美国的贸易通道安全，等等。<sup>[1]</sup>为何美国的“恐华症”严重到如此程度，或许修昔底德提供了答案。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sup>[2]</sup>20世纪80年代，当日本的经济实力在全球独领风骚、开始挑战美国利益时，美国发动了一场贸易战，使日本陷入长达30年的衰退。进入21世纪，中国的快速崛起也引起美国社会的恐惧，核时代对中国发动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很困难，但是

[1]《美媒：美国没必要患上“恐华症” 要中国妥协也不难》，新浪网，<http://mil.news.sina.com.cn/2018-04-27/doc-ifztkpip3485606.shtml>。

[2] 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中美两国在舆论、经济、科技、外交等领域交战的硝烟正在弥漫。

为打经济战、贸易战、货币战、网络战，甚至为军事行动升级做准备，特朗普组建了新一届“战斗内阁”。尽管政治盟友班农被踢出白宫，但特朗普提名的美国国务院、中情局、经济委员会、国家安全顾问等安全、外交、经济领域决策层几乎都是鹰派人物。目前，美国主管贸易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包括商务部长罗斯、美国总统助理兼贸易谈判办公室主任纳瓦罗和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都是对华强硬派，而对华强硬成为如今美国政治正确新的衡量标准。在边缘化一年后，纳瓦罗被特朗普重新请回，任总统助理，负责贸易事务。他曾推出《致命中国》和《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等极端的研究成果，把矛头对准中国，提出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打汇率战的主张。特朗普对其主张十分推崇。莱特希泽则是当年与日本打贸易战的操盘手和谈判代表。最近，特朗普任命美国太平洋总司令哈里斯为驻韩国大使，他是军队中强硬的对华主战鹰派。至此，特朗普政府决策层的核心成员大部分已经换为鹰派。国防部长等建制派军人、谋士和操盘手，大部分也都抱持着冷战思维。特朗普周围这些人的对华战略和政策主张，对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成为其政府战略选择的主导力量。在对华强硬的战略转向下，社会舆论正在从文明冲突转向大国竞争。<sup>[1]</sup>

## 二、中美经济摩擦的性质及走势

特朗普此次发动的贸易战，不能简单地视作只为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是具有深刻战略谋划的全面遏制与竞争。因此，这次中美经济摩擦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全面性和溢出性，其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多边影响大于双边影响。

### （一）中美经济摩擦具有长期性

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中国发起多起“301”调查，打击中国的盗版光盘；

[1] 陈文玲：《特朗普战略转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北京时间网，[https://item.btime.com/m\\_965818b6a4fe9a7a9](https://item.btime.com/m_965818b6a4fe9a7a9)。



中国为加入 WTO 配合美国，加强了对贸易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入 WTO 后，美国计划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将中国变为美国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这种模式延续至 2005 年，中国经济一直沿着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模式快速发展，因而未被美国视为威胁。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原材料需求与日俱增，中国开始不知不觉地对美国未来霸权构成威胁，尤其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2005 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 1 万亿美元。因此，从这一年开始，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企图用“慢火煮蛙”的策略来对付中国，并且逐渐把火调大，妄图重创直至扼杀中国发展。<sup>[1]</sup>此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就一直未平息。

而此次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根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直指“中国制造 2025”和金融市场开放，着眼于阻止中国未来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美国关注的并非贸易逆差，而是中国的科技创新得到政府支持。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直言，中国要投入几千亿元来实现自主研制和应用“中国制造 2025”计划发展的主要产业，到 2025 年基本上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这对美国是不利的。<sup>[2]</sup>因此，中美贸易战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现在绝对不能对对手的残酷和意愿抱有些许幻想，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 （二）中美贸易战具有复杂性

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以及国际影响力增强，使得中美两国不仅在贸易、科技领域，而且在发展模式与政治外交领域也存在竞争，这更使这次贸易摩擦具有复杂性；美方从政治到经济层面遏制中国的战略图谋日益清晰，也折射出美国内利益集团在此问题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过去当中美关系出现裂痕时，美国的一些与中国相关的利益集团就会出面游说，缓解中美

---

[1] [美]威廉·恩道尔著：《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戴健等译，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13 年版。

[2] 钟声：《“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毫无战略眼光》，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330/c1002-29897492.html>。

紧张关系。但这次美国两党各派在国内政治议题上虽然争议颇多，甚至泾渭分明，但在对华问题上则异口同声，出发点虽有不同，但指向却高度一致。<sup>[1]</sup> 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正与中国打一场生死攸关的经济战。2018年5月2日，莱特希泽在美国商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直接挑战；改变中国的体制不是我们的目标，但必须让美国可以应对它，不能让美国成为其受害者。<sup>[2]</sup> 显然，中美贸易战必然涉及到更深层的体制问题。美国为消除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污名化为“陷阱”，提出“印太战略”，组织美、日、印、澳四国“亚洲版经济北约”，希望用“印太地区基础设施计划”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同时，美国挑起贸易战，很可能伴随其他手段，比如巧打南海牌、台独牌、朝核牌、伊核牌等，多方牵制中国，让其周边充满不确定性，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国际资本流向。即便特朗普在经济政策上被捆住手脚，他也可能从地缘政治上寻求突破，最有可能的是在伊朗核武及台湾问题上发难，通过石油危机和地缘危机冲击中国。

### （三）中美贸易战具有全面性

美国擅长从多维度打击竞争对手。以贸易不平衡为幌子，将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市场规制、汇率政策等引入战场，对中国发动舆论战、贸易战、科技战和货币战等多维度战争。在发动对华贸易战之前，美国已经在国内外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在国际上也展开舆论战，指责中国未履行加入WTO承诺和义务。除关税战外，对中国进口商品发起“301调查”，美国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不公平做法有四种：一是中国强制要求美国企

---

[1] 袁鹏：《从大辩论看美国对华战略走向》，参考消息网，[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8/0315/2258596\\_2.shtml](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8/0315/2258596_2.shtml)。

[2] [英]肖恩·唐南：《特朗普的贸易代表团能与中国谈成什么？》，《金融时报》2018年5月2日华盛顿报道。

业进行技术转让；二是在技术许可过程中对美国企业有歧视；三是中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对美投资；四是中国企业运用网络手段，窃取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因此，美国要在世贸组织起诉中国，对中国相关进口产品加征25%关税，以及严格限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钢、铝等产品发起“232调查”（1962年贸易扩展法对威胁美国经济安全的特定产品）；对中国出口的洗衣机与光伏产品发起“201调查”，并对洗衣机征收3年高达50%的保护性关税，对光伏产品征收4年高达30%的保护性关税。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通讯”的制裁措施：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期限为7年。4月25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华为”发起是否向伊朗出口产品的违规司法调查。同时，对中国理工类留学生进行数量限制，对中国访学科技人员进入美国实验室等科研机构的交流活动进行限制。虽然，美国声明这些制裁与贸易战无关，但很难排除科技战的嫌疑。

美国要求削减1,000亿美元贸易顺差的目标是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最终可能导致货币战。美国一再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如果中国不提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增45%的关税，旨在削弱中国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力。对美贸易顺差是中国发行货币的基础。中国进入WTO后，美元成为人民币的发行之锚，也就是人民币对美元信用的依附。一旦失去每年美国的贸易顺差，基础货币投放就失去了依附之锚，人民币稳定就会受到强烈冲击。美国剪中国的羊毛就顺理成章了。

#### （四）中美贸易战具有溢出性

作为位居世界第一、二的经济大国，中美关系会牵动世界各国的神经，中美贸易战会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首先，中美贸易战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美国发动贸易战必然引起中国的反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报告分析称，特朗普“301调查”将使美国40个产业、234项商品可能遭到中国关税影响。该报告着重指出，如果中国“火力全开”，美国将有超过210万个工作岗位受到影响；如果针对1,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增关税，可能会

使美国失去 45.5 万个就业岗位。<sup>[1]</sup> 如果贸易战打响，中国将有数千家企业和近千万个就业岗位会受到直接冲击，而贸易战造成的不确定性将对中国投资产生负面冲击。

其次，贸易战不再局限于双边利益，而是会使整个产业链上的国家和民众都受到影响。中美贸易是整个东亚价值链生产网络的组成部分，中国出口美国的许多产品都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台湾地区出口的电子元件或是在中国大陆的生产基地组装的，美国对华贸易限制会波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对大陆的或在此的生产网络，将对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冲击。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对中国进口减少 10%，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就有可能减少 19.9%。<sup>[2]</sup>

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对以自由贸易为主线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带来冲击，影响二次大战后形成的多边贸易体制。目前，美国绕开多边贸易体制、另起炉灶处理经贸关系的倾向比较明显。比如，美国的“232 措施”和“301 调查”，实质上绕开了现有的多边协商机制，发起单方面贸易制裁，使得传统的多边机制边缘化。美国还可能在某些领域联合欧盟，共同发起对华贸易挑战，强化经济压力，对我“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动形成障碍。

中美贸易争端将何去何从？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对抗或成定局。特朗普认为，打贸易战美国虽然会有些损失，但终归会赢，也会变得更好。美国的底气来自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科技优势与美元霸权。中国对美贸易高达 3,700 多亿美元的顺差背后是成千上万家企业和 5,000-7,000 万就业人员，中国依靠美国生活的人口远比美国依靠中国生活的要多得多。这意味着中美是一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特朗普会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平衡中美贸易。而对于非对称性依赖的中国来说，只能采取如下的政策组合：要么降低关税和开放更多的市场领域以增加进口，减少出口退税或者让人民币

[1] 《中美贸易磋商引发全球关注》，《环球时报》2018 年 5 月 3 日报道。

[2] 张茉楠：《中国产业升级不可避免与美国短兵相接》，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8-04-01/doc-ifysuxis6472208.shtml>。

升值以减少出口。如果中国在前三个选项上不发力，则人民币国际化、变成硬通货将遥遥无期；如果发力，则人民币可以解套。无论怎样选择，美国都将获利。中美贸易摩擦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边打边谈或谈谈打打的过程。对中国来说，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中国应以斗争求和平。经过两轮谈判，中美就扩大从美国进口以实质性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美国停止对中国出口商品增加关税及制裁中兴通讯等达成协议。相对来说，中国扩大从美国进口来减少贸易失衡是最优选择。中国制造的崛起和高技术领域与美国差距的缩小，已引起美国的警觉。此次中美协议并未提及“中国制造 2025”，意味着贸易战虽可暂时避免，但更广泛的冲突难以有实质性改变。实际上，6月15日美国还是决定对“301”调查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只是打响贸易战的发令枪，因为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是制度摩擦；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市场竞争而是战略竞争。中美贸易战可能经历不断升级的三个回合，即关税战（初级阶段）——规制战（中级阶段）——金融货币战（终极阶段），最终决出胜负。因此，中国不能指望一劳永逸地通过谈判、妥协或者反击解决问题，必须以底线思维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历史上，美国在与英国、苏联、日本、欧盟的博弈中都是赢家，在中美不对称的博弈过程中，如何立于不败之地，将考验中国领导人和智库的智慧。

### 三、中国应对美国对华经济战的举措

一是强化沟通、减少误判，防止滑向全面冷战。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华盛顿州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演讲时指出，“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

昔底德陷阱’”。<sup>[1]</sup> 习近平主席提倡，中美建立一种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将中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认为有一千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坏。美国是多元化的社会，要加强与美国利益团体、华人社团（受到损失的企业、协会、智库和游说团体）交流合作，影响美国舆论或游说国会，从美国内部向政府施压，防止中美贸易摩擦滑向全面对抗。

二是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念、稳住阵脚。中国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必须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全球产业链中向顶端攀升，这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特朗普“重振制造业”的主张产生激烈冲突。在中美第三次国运交锋之际，中国要以“发展实体经济+稳定资本市场”双支柱为核心，一方面要持续扩大内需，大幅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稳定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另一方面需要兼顾“软、硬实力”。软实力上要注质量发展、制度建设，硬实力上要狠抓2025年核心技术攻关，加强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改进与落实，加快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只有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或可求胜。

三是要坚持底线思维，以斗争求合作。面对美国的贸易制裁，中国具有很强的反制裁能力。比如，中国可以停止进口美国的飞机、原材料和农产品，停止购买甚至抛售美国国债。但是，中国必须认识到目前还难以离开美国市场和技术。因此，要按照底线思维积极做好各种应对准备。一是要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反对单边主义，对美国违反规则的做法要诉诸WTO，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二是在态度上放低姿态，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对自身问题要认真解决，进行危机公关处理，通过谈判争取将损失降到最低。对美国威胁中国发展权和经济安全的无理要求应坚决还击。要细分相关行业领域，做好应对性和报复性措施的研判，提前制

[1]《图解：习近平提过的三个“陷阱定律”都是啥？》，人民网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6/0518/c385474-28359130.html>。

定精准报复清单，击中要害。三是对美国贸易平衡要求应主动调整，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对美贸易双向开放对称程度，主动化解摩擦风险。加快推进国内自由贸易区与自由港的建设。

表 2 逐年上升的出口退税负担<sup>[1]</sup>

年份	出口额	出口退税	财政收入	占财政收入比重
2007	93627	5635	51321	11.0%
2008	100394	5865	61330	9.6%
2009	82029	6486	68518	9.5%
2010	107022	7328	83101	8.8%
2011	123240	9205	103874	8.9%
2012	129359	10429	117254	8.9%
2013	137131	10519	129210	8.1%
2014	143883	11356	140370	8.1%
2015	141166	12867	152269	8.5%
2016	138419	12154	159605	7.6%

四是持续扩大内需，全力开发农村市场。2018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内需，振兴实体经济，实现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要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中国出口退税额每年增加1,000亿元的国家财税负担。要为遭遇美国相关举措冲击的行业与企业提供降落伞，提供贸易调整援助或帮助拓展新市场。以出口退税补贴

[1] 中国出口退税额每年增加约1,000亿元。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单位：亿元），<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80401&sj=2016>。

力度（每年增加 1,000 亿元）对农村消费实现退税和补贴政策，将 10% 的出口能力转向国内消费，中国经济发展将无惧美国贸易战的威胁。<sup>[1]</sup> 其实，对农民购买农机、汽车、家电以及住房进行补贴，提高农村购买力和生活水平，比补贴外国消费者更能让国民得到实惠。

五是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将更多产能转向其沿线国家，将对外经贸关系更多转向新兴经济体，实际上是一个培育新国际市场的过程，但需要时间。目前，很难替代美国市场的 3,000 亿美元顺差。因此，为缓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应积极指导企业通过投资方式绕开壁垒，如直接在美国本土生产并销售，或加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生产，利用其与美国的自贸协定或优惠关税安排，进入美国市场。

六是中国应将稳定人民币汇率视为优先考量。虽然中美之间存在巨大贸易顺差，但中国外贸近年来持续下行，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压力。要继续实行渐进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在汇率问题上应避免对美亦步亦趋，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留下余地。面对美国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对中国维持出口竞争力意义重大，而且对维持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金融市场开放与资本账户开放领域，应坚守底线，构建股权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和国际资本无偿准备金制度（要求其将 20% 的资金无偿存入中国人民银行 1 年）等防火墙，防止国际资本控制国内金融机构，以及投机资本大规模自由进出。

【收稿日期：2018-06-10】

---

[1] 根据摩根斯坦利与兴业证券的测算，如果美国对中国征收 15%、30% 和 45% 的关税，中国对美国出口分别会下降 21%、46% 和 72%，中国总出口会对应下降的幅度分别为 4%、8% 和 13%。美国不大可能征税 45%，在中级关税 30% 假设下，中国对外出口总量降幅为 8% 左右，应当可以承受。



## “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的进展、 前景及推进思路

陈 长 楚树龙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和发展新动力，是中国对外开发和中外合作的新发展，覆盖从中国周边由近及远世界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家和地区。中亚地区是亚欧大陆的腹心区域，是中国最直接的邻近地区之一，也是亚欧陆路交通的要冲和多种文化的交汇口，与南亚、东南亚一起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最直接接壤、项目最多、力度最大的“重点地区”。中国应与中亚相关国家持续努力推进，力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取得更多、更大、更显著的发展及合作成果。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中亚地区 中国与中亚关系 前景挑战

【作者简介】陈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8) 03-0089-13

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推进，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机遇和动力；世界全球化的新发展，对中国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召开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指出，“一带一路”要聚焦重点国家和地区。从中国的地缘经济、政治、安全和近几年的实践上看，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是与中国最直接接壤的三个“一带一路”邻近地区，已成为“一带一路”推进项目最多、进展较快、效果最明显以及继续推进的“重点地区”，具有进一步推进、建设、取得更大成就的良好前景。

### 一、中亚地区的特点及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

中亚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战略性意义。中亚五国毗邻中国西北地区，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出的核心区域，是其建设的关键战略支点和首要目标区<sup>[1]</sup>，对带动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亚五国为中国西部近邻，同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密切，是“一带一路”倡议迄今成果较多、推进较好的地区之一，也是未来发展最具有潜力的地区之一。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南欧等其他地区相比，中亚最有可能和条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在整个区域推进上，取得成效的“重点区”和“成效区”，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密切的“西部睦邻友好区”。

（一）中亚是中国最直接的毗邻区之一。在参与“一带一路”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俄罗斯、蒙古与中国为邻，但是单个国家，不成为一个区域；东中南欧、东非、西亚、澳洲及太平洋岛国地区等与中国距离较远。中亚、南亚、东南亚是与中国最直接接壤的地区，也是与中国各方面关系最密切的地区。整个中亚地区地理连片集中，在很多方面成为一体，适于整体推进。

（二）中亚地区发展具有潜力。中亚五国的领土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接近中国的一半；人口2015年为6,916万，相当于是欧洲人口第一大国德

---

[1] 袁胜育、汪伟民：《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中亚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21—41页。

国的规模；2015年经济总量3,390亿美元，是当年中国新疆地区的2倍多；经济处于需要发展、提升的起飞阶段，对于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迫切的需求，对参与“一带一路”的态度一直都较为积极。

（三）中亚地区政治相对稳定，与中国没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中亚五国均为前苏联地区，独立后政权由前苏联执政力量转换而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近年来，有的国家曾一度出现政治变化和一定程度的动荡，但现在也都进入稳定状态。与南亚、东南亚等其他与中国毗邻地区不同，中亚五国与中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领海争议问题，也不存在其他任何突出的矛盾、冲突。“一带一路”推进受政治、安全问题干扰的可能性较小。

## 二、“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的推进情况

中亚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总体态度积极，倡议由点及面，稳步推进，在“五通”领域取得一些早期收获清单。中亚是“一带一路”迄今进展较多、成效较大的地区之一。

### （一）中亚地区“五通”推进情况

1. 政策沟通效果良好，达成广泛共识。中国与中亚五国均达成多层次的合作文件（备忘录、协议、联合声明、联合宣言等，见表1），这些文件推动了合作构想的落实，明确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框架下的沟通方式、合作领域和实施方案。政策沟通的顺畅为进一步推动沿线投资、基建、经贸、旅游等领域合作提供了保障。

2. 设施联通一些重大项目先后落地。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有助于建设高水平经贸合作网络。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发展迅速，推动了彼此的发展战略对接，相关国家的重大跨境项目持续推进或完成，其中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卡姆奇克”隧道、塔吉克斯坦“瓦赫达特—亚湾”铁路、吉尔吉斯斯坦“达特卡克明”变电站、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热肯特”铁路，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管道、中哈物流场站、中欧班列等。

表 1 中国与中亚国家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各层次双边协议

国家	签署时间	协议名称	来源
哈萨克斯坦	2014-12-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a href="http://news.163.com/14/1225/17/AEB1AODF00014JB5.html">http://news.163.com/14/1225/17/AEB1AODF00014JB5.html</a>
	2014-12-14	《中哈产能合作框架协议》	<a href="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2-26/6916347.shtm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2-26/6916347.shtml</a>
	2015-08-31	《中哈政府关于将强工业与投资领域合作的框架协议》	<a href="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1509/20150901102970.shtml">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1509/20150901102970.shtml</a>
	2016-09-02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	<a href="http://www.cnca.gov.cn/rdzt/2017/ydyl/qwfb/201705/t20170531_54409.shtml">http://www.cnca.gov.cn/rdzt/2017/ydyl/qwfb/201705/t20170531_54409.shtml</a>
乌兹别克斯坦	2014-08-19	《中乌联合宣言》	<a href="http://news.china.com.cn/2014-08/20/content_33283894.htm">http://news.china.com.cn/2014-08/20/content_33283894.htm</a>
	2015-06-15	《关于在落实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框架下扩大互利经贸合作的协议书》	<a href="http://www.gov.cn/xinwen/2015-06/17/content_2880473.htm">http://www.gov.cn/xinwen/2015-06/17/content_2880473.htm</a>
	2016-06-22	《中乌联合声明》	<a href="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622/c1001-28470347.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622/c1001-28470347.html</a>
塔吉克斯坦	2014-09-13	《中塔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a href="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13/c1001-25655418.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13/c1001-25655418.html</a>
吉尔吉斯斯坦	2014-05-18	《中吉关于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a href="http://news.ifeng.com/a/20140518/40350528_0.shtml">http://news.ifeng.com/a/20140518/40350528_0.shtml</a>
	2015-09-02	《中吉政府关于两国毗邻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15—2020)》	<a href="http://www.ndrc.gov.cn/fzgggz/dqjj/zhdt/201509/t20150906_750142.html">http://www.ndrc.gov.cn/fzgggz/dqjj/zhdt/201509/t20150906_750142.html</a>
土库曼斯坦	2014-05-12	《中土关于发展和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a href="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2/c_1110652783.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2/c_1110652783.htm</a>

3. 贸易畅通和金融通持续深化。截至 2016 年底，中国分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直接投资来源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来源国；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四大投资来源国。<sup>[1]</sup>截至 2016 年 12 月，在中亚各国注册的中资企业约有 3,356 家，投资领域主要分布于采矿、建筑、制造、金融、航空运输、农业等行业。其中，对油气、采矿业的直接投资居首要地位，各种投资项目落地、产能合作深化和经贸合作园区发展迅速。<sup>[2]</sup>同时，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 110 亿元人民币。

4. 民心相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中国与中亚各国政府、相关企业都在积极推动民心相通，人文交流日趋密切，在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领域深入合作。例如：中国已在中亚地区开设 10 家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在中亚地区获得极大关注；中哈吉三国联合的“丝绸之路项目”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sup>[3]</sup>

## （二）“一带一路”在中亚各国具体实施情况

中亚各国文化、制度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既要打造互利互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也要贯彻“一国一策”的方针，即在制定政策前应充分了解所在国实际情况。下面按国别对目前中亚五国的“一带一路”推进情况做分析。

1. 哈萨克斯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通向中亚和西亚的门户，是中国与沿线各国进行产能合作和发展战略对接的第一个对象国。哈萨克斯坦是中亚经济规模最大、最先进发达的国家，也是到目前为止中亚地区中“一

[1] 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16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哈萨克斯坦》《2016 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乌兹别克斯坦》《2016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吉尔吉斯斯坦》《2016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塔吉克斯坦》《2016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土库曼斯坦》所提供的数据整理所得。

[2] 韩璐：《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的推进：成就与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108—124 页。

[3] 《丝绸之路成功申遗 由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gn/201406/t20140622\\_5402576.htm](http://news.youth.cn/gn/201406/t20140622_5402576.htm)。

带一路”推进规模最大的国家。目前，在哈国运营的中资企业有2,600家，资金有400多亿美元，是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投入资金较多的国家之一。“一带一路”在哈萨克斯坦的进展主要是能源和产能合作两个领域，农业合作、农产品加工领域也逐渐涉及。

哈萨克斯坦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其国家发展规划是《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和“光明之路”新经济计划。2015年8月31日，两国签署了《关于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并建立了工作机制。2016年9月，中哈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sup>[1]</sup>截至2017年3月，双方共举行11轮对话，编制产能合作规划，跟踪项目清单，提供后勤保障，设立初期规模为20亿美元的产能合作基金。最终，中哈之间形成51个项目、总投资为268亿美元的产能合作，并有一批企业开始启动。<sup>[2]</sup>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以来，中哈产能合作框架确立并为相关国家提供了重要示范。中国在哈国注册各类企业的经营领域主要集中在油气、石化、电力、金融、通讯、工程机械、建筑、电子、汽车、建材、物流和商贸等行业。中哈合作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从大型油气项目积极向非资源领域合作扩展，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重要项目包括中哈原油管道和中哈天然气管道扩建、中哈天然气管道（别伊涅乌—巴佐伊—奇姆肯特）项目、中哈谢米兹拜伊铀矿开发、阿特劳炼油厂深加工项目，马伊纳克水电站、阿克套沥青厂、巴夏库铜矿、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华为公司4G网络覆盖哈国等项目。2017年7月举办的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以“未来的能源”为主题，成为中哈两国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契机。<sup>[3]</sup>中哈产能合作采取“政策沟通与实业项目”双向推动的新合作模式，直接投资规模逐步扩大。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哈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http://www.gov.cn/xinwen/2016-09/05/content\\_5105546.htm](http://www.gov.cn/xinwen/2016-09/05/content_5105546.htm)。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4/c\\_1117457856.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4/c_1117457856.htm)。

[3] 《2017年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迎来中国国家馆日》，2017年世博会官网：<http://expo2017.ynet.com/2017/07/06/266552t1724.htm>。

2. 乌兹别克斯坦是“丝绸之路”古国，地处中亚交通要冲的十字路口，也是中亚人口第一大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乌国对华贸易稳中有升，中国对乌投资持续增长。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中资企业主要从事油气勘探、煤矿、电站、泵站、化工、制革、制鞋、陶瓷、农产品种植、畜牧养殖、餐饮服务等业务。

近年来，中乌两国间的重大项目进展顺利，例如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吉扎克工业园等，涵盖能源、交通、化工等领域，已完成项目包括中国保利公司轮胎厂项目、纳沃伊氮肥股份公司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共建聚氯乙烯厂项目、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碱厂项目等。华为、中石油、中兴等中国企业积极投资乌兹别克斯坦，为所在国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其中，成果最为突出的是鹏盛工业园项目，成为中乌产能合作的样板。鹏盛工业园由民营企业温州市金盛贸易有限公司投资建设，2016年被中国商务部确认为国家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园区企业主要从事瓷砖、鞋类、龙头阀门等<sup>[1]</sup>，为所在国提供了性价比高的产品，填补了乌国工业体系中的空白，实现互利共赢和优势互补。目前，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产能合作和文化教育交流是未来开展区域合作的主要方向。

3. 土库曼斯坦资源丰富，主要产业是油气工业。中资企业与当地合作的重要项目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承建的中土天然气管道项目、中石化胜利石油公司承建当地油井修复和钻井项目、中国石油技术开发公司油气设备项目、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铁路客车厢项目、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通讯设备项目、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土库曼斯坦钻井总包项目、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承建南约洛坦 100 亿产能建设项目和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土库曼巴格德亚雷克钻井项目等。“一带一路”项目在土库曼斯坦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石油、天然气）领域，结构较为单一。

4. 塔吉克斯坦为内陆国家，境内多山，约占国土面积的 93%，有“高

[1]《鹏盛工业园在乌获得良好口碑》，载《经济日报》，2017年05月30日。

山国”之称，以发展“能源、交通、粮食”为三大兴国战略。在中国信贷资金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对接矿产资源勘探、天然气管道铺设、火电站建设、石油冶炼、水泥生产等领域的项目，例如特变电工公司承建的塔吉克斯坦杜尚别首都热电厂二期项目、“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项目、中国在塔吉克斯坦北部投资2亿美元建造的大型钢铁厂项目等。基础设施方面，瓦亚铁路于2016年8月完工，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框架内首个开工并建成的项目。<sup>[1]</sup>中塔可合作领域较多，拓展空间较大。

5. 吉尔吉斯斯坦地处中亚腹地，采矿业、加工业、能源与农业是其主要产业。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最多的是有色金属、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具体项目包括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实施的总发电量为1,160兆瓦的卡扎尔曼梯级水电站项目、中国特变电工公司承建比什凯克热电站厂改造项目、托克马克实业炼油厂等。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吉西南部和南北公路交通干线建设项目，中国路桥公司企业承建“奥什—萨雷塔什—伊尔克什坦”公路、“比什凯克—纳伦—吐尔杂特”公路等项目。总体来看，中吉经贸合作有待发展。

###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发展面临的挑战

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地区的推进取得很多实质性成果，但在进一步扩大成果规模和深化务实合作方面，依然存在贸易投资、国内政局、地缘政治、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的挑战。

（一）在“政策沟通”方面，观念、法律、制度方面差异较大。中亚各国对“一带一路”接受、认可、支持等“政策沟通”的初级阶段已经完成，今后的政策沟通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对接发展战略，达成更多的共识，签订更多的协议并积极落实；进一步在法规、政策、措施层面上采取行动和具体措施，与国际规则 and 标准接轨，促进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的便利

---

[1] 韩璐：《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的推进：成就与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8—124页。



化。这将大大推进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社会交流与合作，促进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亚和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客观上有这样的政策需求。

（二）贸易投资规模较小且政策干预性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中亚各国最大或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的日用品在中亚已占有一定市场份额，机电、机械产品将成为今后出口贸易的潜力领域，这包括手机、电脑、家用电器、机车、工程机械等产品和服务。但同时也要看到，中亚各国政策调整频繁且人为因素大，在对外资的审批、注册、签证、能源开采权和劳动力雇佣方面有较大限制。海关、检疫、关税审批手续复杂，通关效率低，且存在多重征税问题。据中国驻哈大使馆统计，外国劳务许可和签证办理需要4—5个月且办理成本高；塔吉克斯坦实行工作许可和签证双重制度。

（三）设施联通难度很大。除哈萨克斯坦外，中亚各国基础设施普遍落后，急需现代化。但中亚各国资金、技术缺乏，改善基础设施面临较大的资金和技术困难。中国与中亚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和需求。中亚各国需要基础设施现代化，建立现代化交通网络；中国需要打通中亚地区交通通道，以便进一步发展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互联互通。中亚地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交通运输布局不平衡、通信设施覆盖率低及航空线全球辐射力不足，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目前尚无高速公路。特别是铁路运输存在技术标准问题，在铁路轨宽问题上，中亚国家采用俄罗斯标准的1,521毫米，中国采用欧洲标准的1,435毫米，这容易造成转轨时的换装问题，导致物流运力效率低，成本高。

（四）金融体制有待完善且资金来源缺口较大。从地区各国的能力和规划来看，哈国、土库曼斯坦具有一定的财力从事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的合作可以在提供技术和工程能力方面大有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规划目前是集中城市及郊区的道路改善，然后再进行全国性的高速公路建设，中国可以配合该国规划的实施。塔、吉两国国小人少，资金、技术都不具备，迫切需要外部支持。但中亚五国普遍存在金融体制落后的问题，其表现为：一方面，中亚地区的项目资金需求大而所在国偿还能力弱，投资风险高；另一方面，中亚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差异大，汇率不稳定，特别是黑市汇

率浮动很大。例如哈萨克斯坦的坚戈对美元汇率两次大规模贬值，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 150 : 1 跌到 350 : 1。<sup>[1]</sup>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官方、黑市和交易所三种汇率差别巨大。同时，中亚部分国家对国外资本投资心存一定防备。部分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影响，容易造成当地民众与投资者矛盾激化。例如中哈在农业土地租赁上阻碍重重，2016年4月底—5月初，哈萨克斯坦部分民众举行集会，抗议该国即将生效的《土地法修正案》。集会者担心该修正案可能让外国人控制大量土地资源，少数抗议者甚至将矛头对准中国。<sup>[2]</sup>其他项目，例如伊犁河上游水坝和额尔齐斯河南水北调项目，也都存在一定程度反对与阻挠。

（五）民心相通面临语言、文化、签证等方面的障碍。中亚五国与中国距离较近，人口加一起有 6,000 多万，相当于法国或英国的规模；地区各国处于现代化初期，与中国的人文交流大有潜力，可以大有作为。在留学生交流、孔子学院、双向旅游、媒体合作、智库交流等方面，各国政府和民间都有扩大交流的意愿，而且中亚各国的意愿相对强于中国民间和地方。中亚国家与中国历史、宗教、文化背景不同，宗教规范和要求多、工作习惯和效率差别大。例如，中国企业初期都会遇到高度集体化的公司治理方式与当地劳动力较散漫的工作习惯磨合的过程。

（六）国际政治的影响。中亚地处欧亚中枢，作为“欧亚大陆走廊”，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作为世界“能源储备库”，又被赋予重要的地缘经济影响力。中亚五国是多个国际组织（上合组织、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等）的成员国，这一地区成为大国和集团进行政治、经济利益博弈的舞台：俄国把中亚地区看作其传统势力范围，力推“欧亚经济联盟”；美日等大国从各自利益出发，提出相应的中亚战略规划，造成中亚有些国家利用大国之间的分歧来平衡自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国际形势中有时左右摇摆，政策变化大。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哈萨克斯坦本币坚戈汇率变化情况》，<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ae/201409/20140900742000.shtml>。

[2] 《杂音难阻中哈农业合作大势》，<http://www.fx361.com/page/2016/0518/181640.shtml>。

#### 四、中亚地区“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与思路

中亚是中国的近邻地区，在该地区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符合中亚和中国的共同利益，是双方的共同的战略和需求：中亚地区全部为发展中国家，处在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对发展与中国的经济、技术、政治和社会合作有强烈的意愿和需求；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密切中国与中亚各邻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联系，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外交全局和国家安全，对中国具有长远战略意义。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亚地区有可能成为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密切的“西部睦邻友好区域”，成为中国对外合作、发挥国际作用影响的“基地”之一。进一步在中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仍需围绕习主席提出的“五通”方面展开。

##### （一）“政策沟通”方面需向观念、法规、制度接近方向发展

中亚五国为前苏联国家，独立后多数时期为前苏联领导人执政，虽有发展本国经济社会的战略意识，但思维、观念比较陈旧，很多方面沿袭前苏联的制度和规定，不利于本国发展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推进。我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可在今后与中亚国家各个层次会谈、商谈等接触中，特别是在政府间年度联合委员会机制范围内，根据对方国家发展战略和需求，着重促进中亚各国的改革开放，逐步改变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旧的观点、体制和规章制度，确立符合世贸组织等国际规则的观念、法规和制度。

具体包括交流各自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措施，增加对彼此政策和法规、观念的了解；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扩大贸易便利化；简化签证制度，便于商业旅行、考察、谈判等活动；提高通关、口岸列车、车辆和人员通行效率，缩短时间。中方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要增加对中亚各国及“欧亚经济联盟”法规的了解，更好地利用“欧亚经济联盟”的区域一体化优惠措施，采取相应的投资和贸易活动。

##### （二）“贸易畅通”与投资共同推进

扩大出口方面可着重中亚各国较为缺乏的机电等产品。目前，中亚机

电产品主要还是日本、韩国和欧美产品占主导地位。总体上，中国产品在中亚各国的市场占有率不高，可见度较低，经济和社会影响仍然较小。中国企业应该加大在中亚投资和开展贸易的力度，扩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扩大中国在中亚各国的经济、社会影响。

进口方面可加大从中亚各国进口农牧产品的规模。中亚农牧产品自给有余，质量较好，有扩大对中国出口的强烈意愿。中国农牧产品的需求呈长期上升趋势，可以把中亚作为农牧产品主要海外来源地区，使周边国家成为中国的粮油海外储备和来源基地。新疆、西北等西部省区的政府和企业宜努力扩大与中亚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互通有无，共同发展，推进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经济的一体化建设。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全国各个州都建立了经济特区，希望模仿中国发展特区经济，中国企业和地方应抓住这一发展机遇。

中亚各国处在产能建设初期，制造业缺乏，劳动力相对充足和便宜，有近 7,000 万人的市场，还有与俄、白共 2 亿人的共同市场。中国企业应抓住这一产能合作和走出去的历史机遇，在充分了解市场和法规的基础上扩大对中亚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

### （三）“设施联通”方面注重电力、通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中亚地区多数国家电力、电信设施落后，需要升级换代，中资企业可以大有作为。根据中亚地广人稀的特点，“一带一路”交通建设宜以公路为主。中亚各国基本上还没有建立现代化高速公路系统，中方可根据中亚各国的发展规划，协助各国逐步建立中亚地区高速公路网络。中欧铁路运输绝大多数经过中亚地区。在铁路较发达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可在现有铁路的改造、提速方面。中吉乌铁路推进要解决吉尔吉斯的关切问题，并研究解决吉乌两国的资金问题。

### （四）“资金融通”需争取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加大我对贫穷国家外援力度

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经济较为发达，财政能力较强，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一定的融资能力，对此在“资金融通”方面中方可以以双

边合作为重点。对经济较为落后、财政能力较弱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世界级贫穷落后的国家，中方除进行双边合作融资外，还应共同努力争取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持。对塔、吉两个小国穷国，中方需要较多的提供、使用发展援助支持。

（五）“人心相通”努力扩大规模，形成气候，构成网络，构筑纽带

中亚各国与中国在教育、文化、体育、媒体、智库、旅游等方面已有些交流，但规模较小，尚没有形成气候，远远落后于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的各方面交流活动，这是迫切需要加强和改变的领域。中亚各国的学校有强烈的与中方学校合作的意愿和需求，中国西北地区的高校对外交流合作宜以中亚地区为重点，扩大合作规模，提高质量。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对外奖学金、特别是西部省区的要有一定比例支持中亚年轻人来华留学。孔子学院在中亚各国的数量、质量都发展较好，应继续发展。欧美、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的高校在哈、乌等中亚国家都建有大学或分校，中国驻中亚各国使馆希望国内高校积极考虑在中亚国家办学，扩大与当地的联系和影响。此外，中国与中亚各国双向旅游规模很小，与邻国身份不相称。原因主要是了解和签证问题。中国各省，尤其是西部省区旅游部门可与中亚各国旅游部门加强合作机制建设，扩大各自在对方的旅游宣传、促进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对方的旅游资源。目前，双向旅游团签困难较小，但个人、家庭自由行难度极大。

（六）持续努力做好与俄罗斯的“政策沟通”，与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弱化俄对中国在中亚地区战略目标的警惕、怀疑及竞争，切实做好与俄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在中亚的对接。可以与俄一起联合在中亚地区推进一些能源、基础设施及产能合作等项目。最近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达成的全面合作协议，是对中国、中亚、俄罗斯等国相互合作的有利促进。中国、中亚可以利用这一合作机制，扩大中国、中亚、俄罗斯三边的合作发展。

【收稿日期：2018-05-18】

## 论韩国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战略应对<sup>[1]</sup>

吕春燕

【内容提要】韩国如何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韩两国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面临的重要议题。在韩国国内，虽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有多元化的认知态度，但以积极、肯定者为主。为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半岛局势与拓展国际空间等战略目标，韩国将主要通过加入国际机制、对接发展战略与深化经济合作等路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中韩两国将加强区域间互联互通，促进和深化与有关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合作框架，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韩国外交 中韩关系 地区合作

【作者简介】吕春燕，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8) 03-0102-14

---

[1] 本文系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 2017 年度校区科研基金项目“萨德入韩的影响及我方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7KYY15)阶段性成果。

自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作为周边近邻的韩国一直表示高度关注，且整体上持积极、肯定的认知态度。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韩国采取了加入国际机制、对接发展战略及深化经济合作的实施路径。对于韩国政府而言，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半岛局势与拓展国际空间。显然，中韩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如何互动，已成为双方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面临的重要议题。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的基本认知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韩国政府及社会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并不断通过民间及政界人士前往中国询问相关事项。特别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韩国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关注与研究更加深入。例如，2015年4月12日—5月1日，韩国《中央日报》和韩国贸易协会组成4人特别采访组，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路线，探访了中国的连云港、郑州、兰州、乌鲁木齐、霍尔果斯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共计4个国家8个城市。这是韩国首次专门就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展开调研采访。采访结束后，韩国《中央日报》推出了7篇系列文章，集中报道了“一带一路”建设对韩国的积极影响。<sup>[1]</sup>2018年2月5日，韩国民间主导创立的社团法人“一带一路研究院”正式成立，拟通过发行学术期刊《一带一路》积极促进韩国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协作。整体上看，韩国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肯定的认知态度，并赞同政府参与其建设的立场。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韩国国内大多认为该倡议是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实施改革开放的“2.0版”，是中国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有利于解决

[1]《“一带一路”建设带给韩国机遇》，载《人民日报》2015年6月4日，第3版。

中国现存的结构性问题并扩展战略空间。<sup>[1]</sup>例如,2015年3月,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秘书长、原韩国驻华大使馆首席(政务)公使石东演指出:“一带一路”是和平时代追求双赢的卓越战略设想,不仅具有促进各国间的经济合作、构筑巨大经济圈的意义,同时具有交流民心、体现开放与包容的人文精神的战略构想,将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推进经济一体化和均衡发展。<sup>[2]</sup>但是,韩国国内的亲美派保守人士则对“一带一路”倡议抱有疑虑,认为参与其建设政治风险太高,担心“一带一路”最终变成排挤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的一个手段,中国将成为本地区唯一有决定性影响的大国。<sup>[3]</sup>因此,韩国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性质的认知是多元化的,其中不乏观点对立者,这也是韩国多元化社会的必然体现。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韩国国内大多认为是切实可行的宏伟计划并将进入实施黄金期,能够全面客观地评估“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风险。例如,有韩国学者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行,中国企业将加大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力度,并促进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些地区的贸易额和投资机会都将大幅增加。<sup>[4]</sup>也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在推进过程中也会遇到大国关系、周边国家的疑虑及其内政问题、恐怖主义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sup>[5]</sup>

关于“一带一路”与韩国的关系,其国内大多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符合韩国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和实现半岛统一的诉求,希望借助其建设来

[1] 《일대일로 2.0》, 김창도, 이현주, 유경완, 《친디아플러스》 vol.124, 2017.07.26.

[2] 《韩国专家:“一带一路”是追求双赢的卓越战略设想》,环球网, <http://lianghui.huanqiu.com/2015/foreigner/2015-03/5892363.html>.

[3] [韩]尹锡俊:《“一带一路”对韩国与朝鲜有哪些潜在困难》,李骁译,中国改革论坛网, [http://www.chinareform.org.cn/open/view/201506/t20150605\\_226955.htm](http://www.chinareform.org.cn/open/view/201506/t20150605_226955.htm).

[4] 《韩国专家期待“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带来巨大机遇》,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515/c1002-29276738.html>.

[5] 王维伟:《中韩应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窗口期》,载《公共外交季刊》2017年夏季号。



促进贸易及经济发展和半岛的和平稳定。例如，2017年6月，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表示，“一带一路”给韩国等中国周边国家提供了新的合作机遇。<sup>[1]</sup>此外，由于韩国并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韩国国内存有将其延伸至东北亚的呼声，主张把朝鲜半岛地区也囊括进去，带有较强的政治安全考量。例如，有韩国学者指出：“现在‘一带一路’向东发展在朝鲜半岛仍然存在一定的阻力。从当前情况看，让朝鲜主动打开国门与世界联通的可能性并不大，而如果中国能够说服朝鲜一起加入‘一带一路’，那么朝鲜和韩国的紧张局势也将大大缓和，这对于东亚整体和平稳定也是大功一件。”<sup>[2]</sup>

以国内上述积极、肯定的主流认知态度为基础，韩国政府一直秉持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立场。对此，韩国朝野政党之间的政策分歧较小，社会传媒及学者等也都表示赞同，支持韩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政府决定。在2017年5月韩国政府换届后，文在寅政府派代表团出席了于同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表明新政府愿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立场。同年12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次重申了上述立场。

##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韩国参与路径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展开，韩国的参与路径主要体现在加入国际机制、对接发展战略与深化经济合作三个方面。

### （一）韩国加入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际机制

2015年3月26日，韩国政府宣布决定加入亚投行。亚投行是韩国以创

---

[1]《专家称一带一路给中国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载《人民日报》2017年06月14日22版。

[2]金仁洙：《让“一带一路”经由朝鲜半岛把东亚连在一起》，每经网，<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10-09/951846.html>。

始成员国身份加入的首个国际金融机构，这不仅有助于韩国扩大其金融外交的影响力，也有助于其国内的建筑、交通、电信等行业企业参与相关建设项目。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正式成立。

除加入亚投行外，韩国政府注重与中国“一带一路”对接的国际机制建设。例如，2017年11月8日，韩国“黄海经济自由区”厅长李花顺与“丝绸之路国际文化经贸合作交流组织”（简称“丝合组织”，SICO）达成合作协议，决定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设立“丝合组织”东北亚中心。作为与联合国建立合作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丝合组织”主要从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间文化与经贸交流事务。根据上述协议，“丝合组织”吸引的“一带一路”配套项目将享受黄海厅的优待政策和一站式行政服务，“丝合组织”则将向会员机构及伙伴国家积极推介京畿道的招商引资政策。

另外，在诸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等多边合作框架下，有关“一带一路”的对话与建设机制，韩国也都积极参与其中。同时，韩国还努力打造各种民间国际交流机制，通过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方式开展对话交流。

## （二）韩国对接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发展战略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不久，2013年10月18日，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首尔举行的“欧亚时代的国际合作大会”上提出了“欧亚倡议”，旨在通过与欧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形成“团结的、创造性的、和平的大陆”，以实现欧亚地区的可持续繁荣与和平。显然，朴槿惠政府的“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区域、理念、内容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契合与互补，二者均以提升区域、国家间的互联互通为核心，加强区域间的合作成为中韩两国共同的经济诉求，从而为二者实现战略对接奠定了基础。

2015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韩经济部长会议上，两国达成共识：将对“一带一路”与“欧亚倡议”之间的合作进行研究与讨论。经过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同年10月31日，中韩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及“欧亚倡议”方面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其他一系列文件。双方将共同挖掘“一带一路”“欧亚倡议”与两国自身发展的契合点，共同推进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投资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人员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在同年底举行的东亚三国领导人峰会期间，中韩两国又就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达成共识，其亮点包括以中韩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为契机，加强创新、智能制造、高端技术研发等合作，助推两国经济转型升级。在2016年5月举行的中韩经济部长会议上，韩国政府决定与中国在金融投资、共同研究、企业合作等4项内容上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建立“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系平台。但是，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受“萨德”入韩事件的影响，朴槿惠政府时期的“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对接并未能获得实质性进展。

此后，2017年9月，新上台执政的文在寅总统在海参崴出席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时提出了“新北方政策”，并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其核心内涵之一。11月在访问印尼时，文在寅总统又提出了针对东盟国家的“新南方政策”。在2018年2月2日举行的第15次中韩经济部长会议上，双方决定，将对接中方“一带一路”与韩方“欧亚倡议”的谅解备忘录修改为对接“一带一路”与“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sup>[1]</sup>同年4月，韩国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首任委员长宋永吉作为总统特使访华，就推动“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对接，同中方展开了协商。对接发展战略，不仅意味着中韩两国已着手共建“一带一路”，也将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助推中韩两国更加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融合发展，并激活欧亚大陆的经济增长潜力。

### （三）韩国深化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经济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韩经济合作及韩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新

---

[1] 《롯데 ‘사드표적’ 벗을 듯…한중, 상호진출기업 여건 개선키로》, 연합뉴스, <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8/02/02/0200000000AKR20180202175200002.HTML?from=search>.

机遇。特别是其框架下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韩国的对外贸易提供了便捷通道，也为中韩企业合作与金融合作提供了发展空间。例如，2015年底，韩国SK建设就与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石油化学、发电、铁路等主营业务领域开展海外工程合作。SK建设由此打通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关口。在2016年5月举行的中韩经济部长会议上，两国公布了参与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试点项目的两国企业配对结果；韩方还提出，在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地区及基建、信息通信技术、能源、钢铁领域展开联合调研，促成两国企业配对合作。2017年7月13日，韩国产业银行表示，在韩国通过私募基金（PEF）已募集1.3亿美元，将用于投资中国海南省海口国际机场扩建项目，该项目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组成部分；还计划与亚投行合作，以便协助韩国企业参与更多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另外，受“一带一路”倡议牵引，韩国企业近年来不断加强同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合作，陕西省、四川省等相继成为与韩国政府签署经贸合作备忘录的中国地方政府。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中韩两国于2015年6月1日正式签署中韩自贸协定。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对外签署的覆盖议题范围最广的高标准自贸协定。根据协定，在开放水平方面，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均超过税目的90%、贸易额的85%；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17个领域，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21世纪经贸议题”。该协定自2015年12月正式生效以来，至2017年底双方已实施了三轮降税，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不利形势下，对深化中韩双边经贸合作、促进两国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17年12月，由韩国贸易协会在中国重庆主办的中韩产业合作论坛上，来华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了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具体合作方案。其包括：加强韩国与中国以及区域内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亚欧大陆的陆海空交通与运输畅通；加强能源领域合作，推动IT技术发展；推动韩

中两国企业携手开拓第三国市场；加强区域内贸易投资合作。<sup>[1]</sup> 具体而言，文在寅政府将以建立陆海互联互通的物流网络为优先发展方向，积极探讨重启此前停滞不前的罗津—哈桑—珲春物流项目，计划建设朝韩俄输气管道及东北亚超级电网，并希望以造船业为基础参与北极资源开发，以及重启西伯利亚铁路计划等。

### 三、“一带一路”建设与韩国的战略目标

#### （一）促进经济增长是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战略目标

近年来，韩国经济在遭受次贷危机的严重打击后停滞不前，陷入困境。同时，由于日本政府推行“安倍经济学”引发日元贬值，导致韩国商品对外出口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韩国对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性产生了一定质疑，这与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是一脉相承的。目前，中韩两国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则是单一国别层次上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为提振经济，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期冀就是将其作为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源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尝试，主要提供具有很强跨国界性的商品、资源、服务及规章、政策体制。由于韩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已超过100%，因此，韩国希望借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来寻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例如，“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从连云港出发经由郑州—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等地抵达欧洲的“新亚欧大

---

[1] 《문 대통령 “중일대일로 빈 곳 있어…한반도와 연결해야”》，연합뉴스，<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7/12/16/0200000000AKR20171216032600001.HTML?from=search>。

陆桥”建设计划，将为韩国货物运往欧洲提供更加便捷的通道，有利于韩国企业对外贸易的增长。

## （二）稳定半岛局势是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战略目标

韩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安全动力，就是要借此解决好朝鲜半岛问题，朝鲜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定位也关系到中韩战略对接的质量与高度。如前所述，在韩国，存有期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向北延伸至东北亚地区的呼声，并期待韩国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找到同朝鲜改善关系的契机。例如，韩国汉阳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文兴镐指出，如果朝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一带一路”项目，那么韩国就有望找到与朝鲜展开经济领域合作的新路径。<sup>[1]</sup>

仅就韩国政府而言，一直存有通过经济合作来解决朝鲜核导问题的战略构想。例如，2017年7月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德国柏林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指出，韩朝开展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是朝鲜半岛和平的重要基础，并提出一系列东北亚经济合作项目，包括建设韩朝经济带、打造经济共同体、开通韩朝跨境铁路、开通朝韩俄天然气管道等。<sup>[2]</sup>9月7日，文在寅又表示，东北亚国家合作开发远东地区可以成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又一个治本之策，东北亚跨国经济合作的成功可以让朝鲜认识到参与其中有利可图。<sup>[3]</sup>需要指出的是，与朴槿惠政府不同，文在寅政府的“新北方政策”更加重视与朝鲜之间的合作，其提出的“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计划在东海、

[1]《财经观察：韩国迎接“一带一路”东向暖风》，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5/c\\_127840263.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5/c_127840263.htm)。

[2]《文대통령 ‘베를린 구상’ … 항구적 평화체제 위에 신경제 지도 (종합)》，연합뉴스，<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7/07/06/0200000000AKR20170706191551001.HTML?from=search>。

[3]《文대통령 “극동개발, 북핵 해결하는 또 하나의 근원적 해법”》，연합뉴스，<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7/09/07/0200000000AKR20170907100200001.HTML?from=search>。

西海等地区建立朝韩合作带，构建连接半岛东西方的“H型经济带”，力图通过经济合作带动朝鲜开放门户，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 （三）拓展国际空间是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外交战略目标

长期以来，韩国历届政府均奉行强化韩美同盟的外交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兼顾发展中韩关系。在韩美同盟框架下，韩国往往依赖美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其付出的成本代价则是韩美关系的不平衡及对美国东亚政策的严重依附。另一方面，据统计，中韩两国双边贸易额已从1992年建交时的63.7亿美元大幅增至2016年的2,114亿美元，增长了33.2倍，而同时期内的韩日和韩美的双边贸易额分别仅增长了2.3倍和3倍。<sup>[1]</sup>也就是说，在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中，中国在经济上虽已成为韩国的第一大伙伴国，但安保上韩国却严重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此种处境使得韩国很难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政策，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与韩国的外交战略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一带一路”倡议促使韩国面临更多的选项与更大的机遇。对于韩国而言，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除了可为物流、金融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产业带来商机，更可与其“中等强国外交”相结合，打造一个更独立且更平衡的外交战略，并在此过程中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中美两国间的竞合关系正在重塑未来的国际秩序，双方在全球治理领域存在诸多共同利益，并可通过建立对话机制来管控传统风险。因此，韩国更有必要与中国一道推动全球治理格局的建立，将以往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塑造，进而大幅拓展韩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国际空间。例如，2017年12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其举行的首次驻外公使馆负责人晚宴上表示，应该开展多元化外交，希望尽快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加速拓展韩国的对外合作领域。

---

[1] 《한중 수교 25년...교역 33 배로 증가 · 수출 경쟁도 치열》，연합뉴스, <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7/08/17/0200000000AKR20170817026000003.HTML?from=search>。

#### 四、“一带一路”与中韩关系互动

周边地区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起点；周边外交是中国实施对外战略的核心内涵。在中国周边地区，韩国显示出重要的战略存在，且朝核问题也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态势的热点问题。因此，“一带一路”必将与中韩关系的发展产生互动态势。

##### （一）韩国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相关国家

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性，主张各国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合作框架，不搞“小圈子”与零和博弈。根据2015年3月中国政府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重点区域界定，韩国虽并非“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方向的沿线国家，但作为周边近邻与发达国家，韩国显然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的相关国家。

事实上，韩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例如，有中国学者认为，“韩国与中国经济上交往密切，人文上互动频繁，贸易上互补性强，然而在政治、安全上韩国与美国更为接近。与其他周边国家相比，除共性外，韩国还有着鲜明的个性，将之纳入‘一带一路’构想中有着典型的样本特征”。<sup>[1]</sup>还有中国学者主张：“实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韩国‘欧亚计划’战略的对接，已经成为中韩两国全面提升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紧迫目标。推动韩国成为‘一带一路’沿线战略支点国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不可或缺的作用。”<sup>[2]</sup>

---

[1] 郑继永：《韩国式“一带一路”中隐含的安全内涵》，凤凰国际智库，[http://pit.ifeng.com/a/20160107/46974569\\_0.shtml](http://pit.ifeng.com/a/20160107/46974569_0.shtml)。

[2] 石源华：《推动韩国成为“一带一路”沿线战略支点国家》，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23期。



## (二)“一带一路”有助于中韩关系突破东北亚地缘政治局限

在东北亚地区，中韩关系的发展往往受朝鲜核导问题及半岛局势影响，韩国的对外战略抉择亦受到韩美同盟框架的制约。近年来，美国奥巴马政府深入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通过巩固与日本、韩国等国的盟友关系来构筑遏制中国的“联合阵线”，中美两国围绕国际机制、发展模式的博弈较前突出。奥巴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总体上较为消极，并对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采取了明显的抵制姿态。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也抱有较强的戒备与防范心理，并加大在其重要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安保、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战略布局，与中国形成战略竞争态势<sup>[1]</sup>，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

与美、日两国不同，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韩国与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战略竞争的结构矛盾。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有助于中韩关系突破东北亚地缘政治局限，但在现阶段仍不时受到中韩关系发展走向的制约。一方面，在亚投行的创立过程中，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等以亚投行达不到管理和贷款方面的“全球最高标准”为借口，多次劝说盟友韩国不要加入，但最终韩国政府不顾美国阻力，决意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另一方面，受到半岛局势、美韩关系及韩国内政等因素影响，韩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变数。2016年7月8日，美韩宣布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来，中韩关系曾一度趋紧。这些对中韩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韩国政府无法制定具体、系统的“一带一路”参与战略。

2018年以来，半岛局势出现缓和动向：3月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中国；4月27日，南北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12日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半岛局势的改善，将为“一带一路”

---

[1] 杨伯江、刘瑞主编：《“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日本因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与“新北方政策”的对接创造更为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对此，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金振杓表示：“平昌冬奥会以后，韩朝关系的巨大转机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东亚地区的延伸提供了新的契机。如果朝核问题得以解决，‘一带一路’将打通东向之路，韩国的参与度也将随之扩大。”<sup>[1]</sup>

无论如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可以把中韩关系的发展延伸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广大沿线地域去，有助于突破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局限，为两国关系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 （三）中韩两国应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多层次合作

仅就中韩双边经贸合作而言，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及中国增长方式转变，中韩两国之间的进出口结构和产业合作内容也需要发生变化。通过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中韩两国可以超越现有的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双边合作，进一步在服务、能源、新兴产业等领域开展多元化、高水平的合作，实现彼此产业结构的优化。

除双边合作以外，中韩两国还应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与第三方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既为中韩双边经贸合作的深化搭建了平台，也为韩国企业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中国企业和沿线国家出售设备、技术和服 务提供了机遇。对于韩国文在寅政府而言，除了提出“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之外，还提出了旨在向南拓展多元外交空间的“新南方政策”。2017年11月，文在寅在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出席APEC峰会及东亚合作系列会议期间，系统阐明了划时代地加大力度发展对东盟关系的“韩国-东盟未来共同体”倡议，力争到2020年实现2,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sup>[2]</sup>众所周知，东南亚地区是中国政府

[1] 《“북핵 해결시 中 일대일로에 새 활로…한국 참여도 확대”》，연합뉴스，<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8/04/18/0200000000AKR20180418130800089.HTML?from=search>。

[2] 《详讯：文在寅倡议发展韩国—东盟未来共同体》，<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 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111300260088>。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方向，韩国也在该地区展开经济外交新布局，这将为两国企业的“与第三方合作”开辟新空间。

随着“一带一路”框架下双边及多边经贸合作的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也将得到有力支撑。2017年11月，中国外长王毅就指出，希望中韩加强沟通与交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一步强化战略接触和实务合作，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sup>[1]</sup>

此外，“一带一路”建设虽然不是以安全为导向的，但却面临导致其“被安全化”的课题。不仅“一带一路”建设的部分沿线地域风险评估度较高，且某些大国会从地缘安全角度审视这一倡议，部分中小国家也担心自身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受到不利影响。因此，中韩两国也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探索如何推进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应对恐怖袭击、暴力极端主义、网络攻击等复杂的安全风险。

总之，韩国虽然是基于自身的基本认知与战略目标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韩关系实质上具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通过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中韩两国将加强区域间互联互通，促进和深化与有关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合作框架，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

【收稿日期：2018-04-20】

---

[1] 《中외교부 “한중 관계개선 방안 · 한반도 정세 충분히 의견교환”(종합)》, 연합뉴스, <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7/11/23/0200000000AKR20171123142800083.HTML?from=search>.

##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高杨予兮

【内容提要】2009年以来，为应对日趋复杂的太空环境，美国开始调整其太空威慑战略，强调通过太空弹性能力、太空系统防御能力和太空国际合作，以增强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拒止性威慑。美国在太空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对太空的依赖性造成其太空资产的脆弱性，以及报复性威慑在太空难以实施等因素，是美国进行太空威慑战略调整的原因。然而，由于太空领域具有各方脆弱性不平衡、太空攻击难以归因、容易引发其他领域对抗和战争升级的特点，太空威慑相较于传统威慑在实力、决心和信息传递三要素上都存在差异，在目前太空国际规则尚不清晰的情况下更加难以实现。因此，美国的太空威慑战略会造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引发战略误判、挤压中国太空活动空间等影响，最终不利于维护和平的太空环境。

【关键词】美国 太空威慑 军事战略 军备竞赛 太空弹性能力

【作者简介】高杨予兮，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8) 03-0116-15

太空威慑，是指通过威胁使用或有限使用实力，使敌人确信无法通过打击我方太空能力而获取不对称优势、也无法利用太空系统和服务达成敌对目的。<sup>[1]</sup>美国的太空威慑战略从属于美国的威慑战略和太空安全战略，并最终受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在冷战时期，太空威慑思想已经出现在美国的各项战略文件中。随着太空力量的发展，1989年和1996年两版《美国国家太空政策》都明确将“威慑、警告、抵御来自敌方的攻击”作为太空安全活动的任务。2009年以来，面对新的太空战略环境，太空威慑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美国为确保其对太空领域的绝对控制，维护其太空霸权地位，又对太空威慑战略进行了更加深刻的调整变革，先后出台《国家安全太空战略》、《国防部太空威慑战略》，修订3100.10号国防部指令《太空政策》、联合出版物JP3-14《太空作战》等文件，将太空威慑战略的重点转移到拒止性威慑上来，力图通过展现美国太空能力的抗毁性，使对手认识到发动攻击将无法达成目的，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目前，作为太空军事竞争的最前沿，太空威慑已经成为美国战略司令部重点研究的方向之一，其战略已成为美国未来太空军事发展的重要指引。奥巴马及继任的特朗普政府对美太空威慑战略进行了怎样的调整，调整的原因和影响又有哪些？本文试图从威慑理论出发，通过研究太空威慑的作用机理和固有特点，探讨美国太空威慑战略调整的原因，分析其具体举措，并探究其带来的影响和面临的困境。

## 一、美国对太空威慑战略的调整

强大的太空实力是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基石，也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基本条件。然而，美国既是太空实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太空脆弱性最大的国家——不管是对手发起的太空攻击还是太空环境的恶化，都会对

---

[1]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 3100.10: Space Policy*, July 9, 1999, p.2

美国的太空资产构成威胁。特朗普的太空政策顾问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和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比我们的政府更明白美国在太空的弱点，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现在将攻击目标直指我们的卫星网络”。<sup>[1]</sup>美国战略司令部现任司令约翰·海腾（John Hyten）在一次演讲中声称，“美国对手们正在制造太空武器，这些武器从地面发射，攻击处于近地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太空设备”。<sup>[2]</sup>为了避免遭遇“太空珍珠港事件”，美国对太空威慑战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更加强调通过拒止性威慑确保其太空作战能力，维护其太空优势，具体有以下措施。

### （一）强化太空系统弹性（resilience）能力

所谓“弹性能力”，指的是即便在敌对活动和不利条件下，太空系统也能够以更大的可能成功完成任务，缩短无法正常发挥能力的时间，应对更广泛的情境、条件和威胁。<sup>[3]</sup>2014年，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威廉·谢尔顿（William Shelton）在参加大西洋理事会座谈时指出，能力、弹性和可承受性是美国今后发展太空力量的三大方向。<sup>[4]</sup>2016年10月，特朗普的太空政策顾问罗伯特·沃克在出席商业太空运输咨询委员会会议时表示，美国政府需要一个“有远见的、颠覆性的、协调的、有弹性的”太空政策。<sup>[5]</sup>

2018年，美参联会修订的联合出版物JP3-14《太空作战》将“弹性”

---

[1] Robert S. Walker and Peter Navarro, “Donald Trump'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Space Vision,” *Space News*, October 24, 2016, <http://spacenews.com/op-ed-donald-trumps-peace-through-strength-space-doctrine/>.

[2] John Hyten, “Gen. John Hyten on ‘U.S. Strategic Command Perspectives on Deterrence and Assurance’ (transcript),”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January 24, 2017, [http://cisac.fsi.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transcript\\_stratcom\\_-\\_hyten\\_160125\\_no\\_qa.pdf](http://cisac.fsi.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transcript_stratcom_-_hyten_160125_no_qa.pdf).

[3]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2 DoD Space Policy Directive (DoDD 3100.10)*, October 18, 2012, p.14.

[4] “Transcript: The U.S. Future in Space,” Atlantic Council, July 23, 2014,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the-us-future-in-space/>.

[5] Jeff Foust, “What a Trump Administration Means for Space,” *Space News*, November 9, 2016, <http://spacenews.com/what-a-trump-administration-means-for-space/>.

作为保证太空任务实施的三大措施之一，具体手段包括能力分解、分散式部署、多样化、防护、扩增式部署和欺骗。<sup>[1]</sup>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是作战响应太空卫星系统（Operationally Responsive Space, ORS）。2011年6月29日，美空军发射了第一颗具有完全运行能力的ORS-1卫星。<sup>[2]</sup>卫星研发历时30个月，耗资2.26亿美元，打破了军事航天项目成本高昂、研发周期长的传统模式。<sup>[3]</sup>目前，ORS-5卫星已于2017年8月发射<sup>[4]</sup>，威廉·谢尔顿司令宣称它是当前的“天基太空监视”卫星（Space Based Space Surveillance, SBSS）到未来小型太空监视星座之间的过渡，前者在2017年后逐渐结束寿命，而后者预计要在2021年之后才能发射。<sup>[5]</sup>

美国还积极准备太空威慑失败后的替代方案。在导航定位方面，将重点放在可替代GPS定位的系统研发上。2012年，美国空军授权澳大利亚Locata公司为其研制的Locata地基伪卫星定位系统在美白沙靶场进行了实地测试。<sup>[6]</sup>测试结果表明该系统已经可以与GPS系统联合运行，并能在GPS功能受阻的情况下独立运行，满足军用导航定位需求。

## （二）强化太空系统防御能力

“太空系统防御能力”是指通过行动打断敌方的杀伤链，或通过侦

---

[1]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April 10, 2018, p.I-8.

[2] William Graham, “Orbital Minotaur I launches with ORS-1 following eventful count,” NASASpaceFlight.com, June 29, 2011, <https://www.nasaspaceflight.com/2011/06/live-orbital-minotaur-i-launch-ors-1/>.

[3] Stephen Clark, “Tactical spy satellite streaks into space on Minotaur rocket,” Spaceflight Now, June 30, 2011, <http://www.spaceflightnow.com/minotaur/ors1/>.

[4] “ORS-5 (Operationally Responsive Space-5) / SensorSat,” eoPortal Directory, <https://directory.eoportal.org/web/eoportal/satellite-missions/o/ors-5>.

[5] Mike Gruss, “Shelton Touts ORS-5 Satellite as Space Surveillance Gap Filler,” Space News, April 4, 2014, <http://spacenews.com/40119shelton-touts-ors-5-satellite-as-space-surveillance-gap-filler/>.

[6] “White Sands Missile Range LocataNet,” Locata, August 27, 2013, <http://www.locata.com/article/white-sands-missile-range-locatanet-new/>.

查、预警等方式为保护太空系统提供支持的能力。<sup>[1]</sup>美国防部披露,将在2016—2020年增加50亿美元用于太空保护项目,包括建设增强太空态势感知能力的“太空篱笆”(Space Fence)雷达监视系统、联合太空作战中心任务系统(Joint Space Operations Center Missions System, JMS)、地球同步轨道太空态势感知计划(Geosynchronous 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 Program)<sup>[2]</sup>等,以及用于卫星机动的相关技术。此外,政府还将为情报部门提供至少10亿美元用于研发间谍卫星。<sup>[3]</sup>

2015年9月,美国政府正式批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其研发新型的“太空篱笆”系统。<sup>[4]</sup>“太空篱笆”是由多个地基相控阵雷达构成的太空监视系统,预计将于2019年前基本建成,届时将能够监控太空中20万个直径大于2厘米的物体。这将大幅提升美国的太空监视能力,不仅有助于监控日益增多的太空垃圾,更能强化战略预警能力,为美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资源。该系统预计将花费61亿美元,这也是美国空军在太空态势感知方面最大的一笔投资。<sup>[5]</sup>

2013年以来,美国大力推进联合太空作战中心任务系统,它将取代先前的太空防御作战中心系统(Space Defense Operations Center)和部分星历网络的关联、分析和验证系统(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Verification of

---

[1] Air Force Space Command, *Resiliency and Disaggregated Space Architectures*, 24 April 2013, p.3.

[2] “Transcript: The U.S. Future in Space,” Atlantic Council, July 23, 2014,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the-us-future-in-space>.

[3] Mike Gruss, “U.S. Spending on Space Protection Could Hit \$8 Billion through 2020,” Space News, July 2, 2015, <http://spacenews.com/u-s-spending-on-space-protection-could-hit-8-billion-through-2020/>.

[4] “Lockheed Martin’s Space Fence Program Completes Critical Design Review,” Lockheed Martin, Sept. 28, 2015, <http://www.lockheedmartin.com/us/news/press-releases/2015/september/150928-mst-space-fence-program-completes-critical-design-review.html>, 2017-1-27.

[5] “Don’t Touch Their Junk: USAF’s SSA Tracking Space Debris,” Defense Industry Daily, September 30, 2015, <http://www.defenseindustrydaily.com/air-force-awards-first-phase-of-next-generation-space-fence-05511/>



Ephemerides Network), 统筹各方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 为美太空部队指挥与控制提供所需的软硬件。主要任务包括太空物体识别、电磁光谱识别、航天器发射/再入支援、联合部队支援和应急作战支援等。<sup>[1]</sup>

2016年8月19日, 美国在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了地球同步轨道空间态势感知计划中的2颗卫星——GSSAP3和GSSAP4。<sup>[2]</sup>这标志着该系统所需的全部4颗卫星均已发射完毕, 将对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太空目标进行监视。该系统还具备开展交会接近行动(Rendezvous and Proximity Operations, RPO)的能力, 可以通过卫星机动近距离监视观察相关目标。<sup>[3]</sup>

### (三) 倡导国际太空合作

强化国际太空合作也是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一部分。一是通过国际太空合作, 将美国的太空能力分散到其他国家, 保证美国在自身太空资产受到破坏时仍可依靠盟国的太空能力; 二是通过建立国际太空规则, 向对手明确导致太空领域战争升级的条件, 同时增大对手发动攻击的舆论成本; 三是使对手因为忌惮太空资产为多国所有而放弃攻击, 避免引发与更多国家的冲突。

在导航定位系统方面, 美日联合打造的“准天顶”卫星导航定位系统(QZSS)预计将于2018年完成全部在轨测试。将“准天顶”系统与美国的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协同运作, 不仅可以显著提升美日安保体系在亚太地区的作战打击精度, 还能在盟友分担研发经费的同时推进美国太空能力的分散化。在太空情报共享方面, 2011年, 美日举办首次部长级会议, 将共享太空资源相关的合作列入“美日联盟共同战略目标”(Common strategic

---

[1]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perational Test and Evaluation, *DOT&E FY 2013 Annual Report*, January 2014, p.281 - 282.

[2] Mike Wall, “US Air Force Launches 2 Military Surveillance Satellites,” *Space.com*, August 19, 2016, <http://www.space.com/33800-air-force-surveillance-satellites-launch-afspc-6.html>.

[3] “U.S. Air Force Fact Sheet, Geosynchronous 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 Program (GSSAP),” *Air Force Space Command*, April 15, 2015, <http://www.afspc.af.mil/About-Us/Fact-Sheets/Article/730802/geosynchronous-space-situational-awareness-program-gssap>.

Objectives of the Alliance)。2013年3月,美日在东京举办首次“全面太空对话”会议,并签署了太空态势感知合作框架。<sup>[1]</sup>2014年9月,美国国防部与韩国国防部通过磋商会谈,达成《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共享太空态势感知数据。<sup>[2]</sup>截至2018年4月,美国战略司令部已经与14个国家(英国、韩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以色列、西班牙、德国、澳大利亚、阿联酋、比利时、挪威和丹麦)、2个政府间组织(欧空局和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超过65个商业卫星所有方/运营方/发射方签署了太空态势感知数据共享协议。<sup>[3]</sup>

## 二、美国太空威慑战略调整的原因

2009年以后,美国调整太空威慑战略,进一步突出了拒止性威慑的作用,强调使敌方认识到无法达成目的而放弃攻击。这是由太空威慑的基本原理和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的。

### (一) 美国太空战略地位相对下降

美国一直将太空领域作为拓展霸权的“高边疆”,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予以发展,甚至明确提出过“太空控制”这样的战略目标,力图确保美国在这一新兴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然而,2008年以后,美国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活力大不如前,难以继续维持对太空事业的大规模投入。而欧盟、中国、日本等则你追我赶,努力发展自主太空产业,太空领域的多极化趋势愈发明显,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太空的优势差距也在逐渐缩小。这主要体

---

[1]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Japan - US Comprehensive Dialogue on Space*, March 11, 2013, p.1.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Agree to Share Space Data with South Korea,” September 5, 2014,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23097>.

[3]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Command Public Affairs, “USSTRATCOM, Denmark sign agreement to share space services, data,” April 25, 2018, <http://www.afspc.af.mil/News/Article-Display/Article/1503357/usstratcom-denmark-sign-agreement-to-share-space-services-data/>.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太空行为体和竞争者的增加。在2010年版的《美国国家太空政策》和2011年版的《国家太空安全战略》中都提到了当前太空“拥挤”(congested)、“对抗”(contested)和“竞争”(competitive)的“3C”战略环境。目前,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在太空拥有资产。<sup>[1]</sup>俄罗斯、欧盟、日本等依然保持较强的太空实力,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也在太空技术的研发和利用上不断取得进展,太空领域日益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二是美国太空产业的竞争力相对下降。自1999年后,美国开始对卫星及其相关物项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将商业卫星划入《美国军火清单》(U.S. Munitions List, USML),受《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 ITAR)的管制。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严重束缚了国内太空产业的发展,不仅使美国太空企业在难以对外出口的情况下日益失去国际市场、丧失技术优势,更造成太空产业的人才流失和规模缩减。美国卫星制造所获得利润从90年代的占世界60%—70%,下降为21世纪初的40%,目前基本稳定在44%左右。<sup>[2]</sup>三是太空军事化和进攻性太空能力的扩散。从1961年7月到2018年4月,全世界一共登记发射了571颗军用卫星,其中仅在2010年—2018年4月就发射了128颗。而在2017年发射的12颗军用卫星中,美国仅占1/6。<sup>[3]</sup>电磁干扰这样技术门槛较低的软杀伤手段更是广泛扩散。只需7,500美元就可研制出一台针对超高频卫星的干扰机。<sup>[4]</sup>俄罗斯、中国、欧洲空间局都在对航天器自主交会和贴近能力进行研究,印度也在谋求研制反卫星武器。

美国的太空实力优势正在缩小,而竞争对手却不断增多,太空威慑的对象由过去的一方变为多方,确定变为不确定。这使得威慑成功所需要的

[1]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UCS Satellite Database,” September 1, 2017, [https://www.ucsusa.org/nuclear-weapons/space-weapons/satellite-database#.Ws7Lw\\_ns4ZQ](https://www.ucsusa.org/nuclear-weapons/space-weapons/satellite-database#.Ws7Lw_ns4ZQ).

[2] Satellite Industry Association, *2017 State of the Satellite Industry Report*, October 2017, <https://www.sia.org/wp-content/uploads/2017/07/SIA-SSIR-2017.pdf>.

[3] “Military Satellites,” April 15, 2018, <http://www.n2yo.com/satellites/?c=30>.

[4] Paul Marks, “Wanna jam it?” *New Scientist*, April 22, 2000,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16622351.400-wanna-jam-it/>, 2017-2-6.

三个要素——实力、决心和信息的传递都在不同方面受到了削弱。实力方面，美国的出口管制和财政紧缩无法给太空产业提供足够的资源进行项目研发，美国的技术优势将在其他国家的你追我赶中不再绝对领先。威慑的决心方面，由于太空对抗的非致命性，民众和各政治团体对太空威胁敏感度不高，对如何应对太空这一全球公域中存在的威胁也争议颇多，这就造成美国政府难以凝聚太空威慑的决心。信息的传递方面，威慑对象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美国很难有针对性地发出威慑信号，明确让对手感知到损害美国的利益将得不偿失。

## （二）依赖性加剧太空资产脆弱性

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先不仅意味着其在太空领域拥有更多权力，也意味着美国对太空系统的高度依赖。在军事领域，太空装备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首次大规模投入战场应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动用了数十颗卫星，为美军赢得战争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援。1998年科索沃战争中，在太空力量的支援下，空中力量首次不依赖陆军、海军就实现了作战目的。<sup>[1]</sup>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美军70%的情报、80%的通信、100%的气象信息都是通过太空系统获得或传输的。<sup>[2]</sup>卫星系统在获取战场信息优势、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提高武器装备性能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民用领域，对太空的商业和科学利用更涉及到千家万户。仅在2003—2012年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455项衍生品就创造了1.8万多个就业机会，直接经济收益高达51亿美元。<sup>[3]</sup>美国对太空系统的依赖性与日俱增。

由于航天器自重和轨道的限制，运行在太空中的航天器往往难以进行防御，因此航天器越多、太空实力越强的国家遭受太空攻击时所遭受的损失越大，其太空资产的脆弱性越明显，这也就是太空领域存在的“脆弱性差距”(Vulnerability Gap)。在传统威慑中，威慑双方实力比较对称，互相拥

[1] 李向阳等编《美军“施里弗”空间战演习解读》，国防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2] 李大光等编《美俄太空军事力量及其作战运用》，武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8页。

[3] Office of the Chief Technologist, NASA, *Spinoff 2013*, p. 27, <http://spinoff.nasa.gov/Spinoff2013/pdf/Spinoff2013.pdf>.

有向对方发起第二次攻击的能力，双方通过“相互确保摧毁”或“相互确保生存”保持对等的威慑。而在太空威慑中，威慑双方的实力往往不对称，太空实力更强的一方在遭受攻击时受到的损失更大，因此促使太空实力偏弱的一方倾向于率先发动攻击，由此即便会带来报复，相对来说受到的损失也比太空实力强的一方要小。

在“攻击占优”的太空环境中，高度依赖太空的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具脆弱性。随着美国对太空能力的持续利用和日益依赖，太空资产作为美国的“阿基里斯之踵”，更容易招致敌对国家的首发攻击，以求对高度依赖太空能力的美国地面部队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因此，美国虽仍是太空领域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却也是太空资产最易受干扰攻击的国家；美国既是最能够利用太空能力增强作战效能的国家，也是太空能力一旦被削弱就将丧失最多军事优势的国家。这种强大与脆弱的悖论在如今太空攻击门槛不断降低的国际环境中更加突出。

### （三）报复性威慑难以在太空实施

太空战略环境的特殊性使得传统的报复性威慑难以发挥作用。在传统威慑理论中，威慑信息的传递需要由威慑方对被威慑方的不当行为作出可信的报复承诺。这一承诺的可信度又取决于威慑方对被威慑方身份、行为和意图的准确掌握。由于太空攻击手段多样和太空环境的复杂，对攻击的归因存在很大难度，难以及时判断造成太空系统故障的原因到底是人为还是自然条件、对手又来自何方。即使通过多方排查明确了对手，对手也可能早已利用这段被拖延的时间达成了目的。在获知对手的意图方面，太空威慑不像传统威慑中那样目的明确，即通过武力摧毁对方的某些资产以使自身占据优势。在太空威慑中，由于太空对抗对整体局势并无决定性作用，发动攻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夺取太空优势，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显示实力、支援地面作战、掩盖自身行动等，这就使威慑方对被威慑方的意图判断更加复杂。

此外，报复的具体实施也存在困难。传统威慑可通过设定战争“红线”的方式向敌方明确，一旦其行为跨过“红线”就将遭到报复。但太空威慑目

前由于缺少太空行为准则而难以明确“红线”。即使一国单方面设立了“红线”，也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在“红线”以内肆意妄为。在传统威慑中所威胁采取的报复措施通常是对等的报复，即通过同样的手段在同样的作战领域进行同等伤害的报复。但在太空领域，各国的太空资产遭受攻击的脆弱性不同，太空攻击所造成的损失也不局限于太空领域，所以难以实施对等的报复，这也使威胁报复的可信性大打折扣。

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的副部长道格拉斯·洛韦罗（Douglas Loverro）表示，美国更需要依赖防御手段，而不是进攻手段来慑止太空战争。2016年10月，在一次与学术界的早餐会上，洛韦罗提出美国“更应该使对手无法从攻击中获得利益，并提高太空攻击的政治难度，而不是依赖报复手段”。<sup>[1]</sup>美国在构想太空威慑手段时最大的困难，在于报复性打击的时机和程度是否合适。如果敌人攻击的是美国甚至都没有承认过的卫星，美国很难以此为理由对其展开报复。对敌人太空资产的攻击不足以产生足够的震慑，而对地面设施的攻击又可能产生伤亡，使战争迅速升级。

### 三、美国太空威慑战略调整的影响

由于太空技术在攻击和防御上缺乏明显的界限，美国对太空威慑战略进行调整的名义虽然是保护其太空资产，其实质却是借助防御和自卫的名义发展太空军事实力，途径是利用拒止性威慑确保美国的太空优势，目的仍是维护太空霸权。根据太空威慑的作用机理和美国的战略意图，美太空威慑战略调整将会产生以下影响。

#### （一）拒止性手段加剧军备竞赛

美国将其太空威慑战略调整标榜为“拒止性”“防卫性”，强调以威慑阻

---

[1] Phillip Swarts, “Loverro: defense is the best deterrent against a war in space,” Spacenews, October 14, 2016, <http://spacenews.com/loverro-defense-is-the-best-deterrent-against-a-war-in-space/>.

止对手的挑战行为。然而，这种对太空资产弹性和防御能力的建设本质上是对美国太空军事实力的强化，是在美国太空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绝对安全和太空霸权。这样的战略目标在当前呈现多极化的国际太空领域不但难以实现，更会引发其他国家对太空安全的忧虑和军备竞赛。

首先，太空领域进行军备控制的条件先天不足。从战略环境来说，冷战时期，核威慑之所以能够成为限制美苏双方擦枪走火乃至军备扩张的因素，一是由于核武器无与伦比的巨大杀伤力，二是这种杀伤力所带来的战略等效性（即假设 2,000 枚核武器能够摧毁任何一方的全部城市，那么一方拥有 2,000 枚核武器，与另一方拥有 6,000 枚核武器的意义是一样的）。<sup>[1]</sup>然而这两个条件在当前的太空威慑中并不存在，“相互确保摧毁”或“相互确保生存”的战略平衡并没有建立，自然也无法像核威慑一样有效遏制军备竞赛。从国家决策来说，太空军事对抗目前还不会直接对地面构成杀伤，其破坏力的不足很难使决策者主动规避太空军事化、武器化的发展。太空与网络相互交织，缺少通用的行为规范，本身就难以进行军备控制。在“攻击占优”的太空环境中，攻击比防御要容易的多，门槛也更低，美国的拒止性手段只会引发更多攻击手法的出现，而无助于打消其他国家加入太空竞争的念头。

其次，美国太空军事实力的增强激发了更多国家对太空军事领域的渴望。拒止性手段从本质来说也是美国增强太空实力的方式，而美国对太空军事能力的强化向其他国家传递了一条信息——太空已经成为需要加紧争夺的战场。于是，俄罗斯、印度等有能力的大国纷纷加速自身太空军事实力的提升。到 2017 年 8 月，俄罗斯正常运行的卫星共有 142 颗，其中军事卫星 85 颗。<sup>[2]</sup>印度国防部于 2013 年公布的《技术展望与能力路线图》

---

[1] Bernard Brodie, *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6, p.76-91.

[2]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UCS Satellite Database,” September 1, 2017, [https://www.ucsusa.org/nuclear-weapons/space-weapons/satellite-database#.Ws7Lw\\_ns4ZQ](https://www.ucsusa.org/nuclear-weapons/space-weapons/satellite-database#.Ws7Lw_ns4ZQ).

则提出要研发小型卫星，以提高对地球和太空的情报监测能力。<sup>[1]</sup>在可预见的未来，太空军事资源的争夺和太空军事技术的竞争都将成为国际社会难以回避的话题。

## （二）打破战略平衡更易引发误判

太空威慑首先是以太空实力为基础的，在美国单方面加强太空实力、试图向对手传递其维护太空霸权地位的信息时，更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误判，激化太空局势紧张。威慑理论认为，任何一方防御能力的提高都会使另一方变得更易受攻击，为了避免这种更易受到攻击的状态，实力较弱的一方往往会首先寻求发动攻击。也就是说，加强防御会使威慑双方都倾向于首先发动攻击——不仅加强了防御的一方会更希望利用自身优势夺取先机，其对手为了避免处于被动也会铤而走险，试图首先发动攻击。<sup>[2]</sup>这将降低太空领域的“首攻稳定性”，更易导致太空冲突的发生。

当前的太空技术难以明确区分到底是加强了防御能力，还是进攻能力。无论是太空弹性能力，还是强化太空防御的态势感知能力，都可为美国今后对其他国家开展太空攻击服务。实际上，美国加强的所谓太空防御能力甚至能够帮助美国实现对现有太空资产的更新换代，进一步在太空实力上超越其他国家，强化美国在太空的军事存在。这种打破力量平衡的行为将会加剧太空行为体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导致太空威慑的互动更加脆弱和复杂。

美国加强太空防卫能力的目的不是威慑，而是胁迫（coercion）。参考核威慑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美国发展防卫力量并不是为了威慑对手放弃行动，而是胁迫其按照美国的意愿去行动。“星球大战计划”就为美在美苏军备谈判中增加了强有力的筹码。而在美国当前的太空威慑战略调整中，看似是通过加强拒止性威慑促使对手放弃进攻，实际是通过强化太空霸权逼

---

[1] Ministry of Defense of India, *Technology Perspective and Capability Roadmap*, April 2013, p.10.

[2] 张曙光：《威慑理论：美国国际战略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载《美国研究》1990年第4期，第51页。



迫对手按照美国控制的太空秩序活动。美大力发展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即“萨德”系统）看似是提高反导能力的防御性武器，实际上其地基雷达不但可监测 2,000 公里范围内的目标，其拦截方式还采用先进的动能杀伤技术（Hit-to-Kill），增加了导弹拦截高度，为二次拦截提供了可能，完全能够打破现有的地区军事力量平衡。正是自恃拥有这样的技术，美国在韩部署“萨德”时反复拿捏其利益需求，要求韩国在政治、外交方面不顾自身实际，做出有利于美国的选择。然而，这种损害战略稳定性的做法只会加剧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

### （三）太空结盟挤压中国活动空间

美国开展太空合作的本质并不是为了真正促进太空的和平利用，而是为了维护其太空霸权，这一方面体现在美国对其太空实力的追求，另一方面体现在美国对其他国家利用太空环境的排挤。虽然美国在各个场合都强调要制定太空行为准则，促进太空和平利用，但美国要制定的是完全符合美国利益、实现“太空控制”的行为准则。在否决了欧盟提出的太空行为准则方案后，美国试图与欧盟合作制定有利于其自身的太空秩序，但遭到了俄罗斯、中国、巴西、南非、印度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抵制，要求今后所有关于太空行为规则的协商进程都需要在开放的联合国框架内进行。<sup>[1]</sup>作为报复，2015 年 12 月 7 日在联合国第 70 届大会上，美国带头对中俄等国提交的“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决议案投了反对票。2016 年 2 月，美国再次拒绝了中俄禁止太空军事化的相关倡议。由此可见，美国所要求的太空行为准则是不约束美国太空军事能力发展的准则，是以保障美太空绝对安全为前提的。这样的霸权主义行径无疑挤压了中国在太空领域发挥作用的空间。

为了强化太空领域的拒止性威慑，美国通过“太空联盟”的方式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合作，以期分散美国的太空资源。但这种太空联盟仍然会面临

[1] Theresa Hitchens, “A Pause Button for Militarizing Space,” *Aerospace America*, April 2016, p.42.

“联盟困境”——所有成员都试图尽可能地减少对其他盟友承担的安全义务，同时又希望自身在联盟中的影响力能实现最大化。<sup>[1]</sup>对美国而言，希望借助盟友的力量确保自身在太空领域的霸权；对其盟友而言，则希望美国承担更多责任，以扩大自身的地区利益。因此，美国与盟友的太空合作不仅对外会影响地缘安全格局，也会给联盟内部的国家发出不同的信号，导致这些国家的战略误判。目前，国际太空合作已呈现相当程度的碎片化趋势。政治因素仍是能否合作的主要考量，国家的太空活动更多是出于相互竞争的需要。而美国的太空结盟更是激化了这一趋势，使得美国阵营和非美国阵营的太空竞争更加明显——美国开展的太空合作是有条件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这就让一些本来和中国不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譬如韩国、澳大利亚，也被迫加入了美国的反华阵营，拒绝与中国开展太空合作，加剧了国际太空合作格局的分裂。

中国历来倡导太空的和平利用。随着中国经济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中国也日益成为不可小觑的太空大国。展望未来，美国在太空领域针对中国的围堵和制衡不会停止，而中国太空事业走向世界的道路仍然艰险重重。中国可以从构建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天基丝路”着手，突破美国及其盟友的太空围堵；不断促进国际太空透明和信任建设机制的发展，努力控制因互相猜忌和互不信任引发的地区局势紧张；建立自己的太空威慑体系，在强化实力的基础上保护中国的太空利益，在增强太空地位的同时与美国开展对话；在保卫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倡导真正平等、互利的国际太空合作，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共同繁荣。

【收稿日期：2018-03-10】

---

[1]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1, January 2009, p.116.

## ABSTRACTS

- 01 The Current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and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 (Editor's note) On May 8 of 2018, the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penned an article for the Asahi Shimbun, entitled Restart the Cause of China-Japan Peaceful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At the historic juncture when the Chinese premier paid a visit to Japan in 8 years and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is improving, the CPDS believed tha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not onl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but also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people in East Asia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t large, to sort out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in over 4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m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look into the future of its development, and review the gains and losses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erefore, the CPDS organized a workshop in the name of "the Current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and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 on the 10th of May in Beijing, inviting relevant scholars and specialists to discuss such topics a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Treaty as well as the current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and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 in the future",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factor on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and Japan's role in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Japan's strategic trend and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es in Japan's domestic politics", "the impact of CPTPP coming into force o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hina's response", and "reflections on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Now, we publish some of the contents of their speeches for the readers.
- 30 The Reform of Japan's Security Law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Japan-US Alliance**, by Li Shuo, Doctoral Student from the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here exist complica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reform of Japan's security laws and the vision, approach and efficiency

of the Japan-US alliance.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Japan respectively carried out systematic reforms of its security laws in the early post-Cold War period and the during the Abe's second cabinet, since Japan established its security legal basis in the wak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Meanwhile, the Japan-US alliance has undergone two major chang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2015, as a vis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Japan-US alliance for the present phase, highly agrees with the reforms of the security laws promoted by the Abe administration strategically, while deepening the military integration as a way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the alliance is in a mutually dependent relationship with Japan's reform of its security laws, which will jointly boost the roles of the Japan-US alliance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 46 Deepening the Sino-Japanes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Strategic Reciprocal” Relations**, by Zhang Weiwe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from the Department for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Studies, CIIS. Establishing the Sino-Japanese “strategic reciprocal” relations was proposed by Shinzo Abe in 2006, and the two countries signed the Sino-Japanese Joint Statement on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Strategic Reciprocal Relations in 2008. However, since 2010, such incidents as ship collision an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Diaoyu Islands occurred, which much worsen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t the end of 2014, the two countries reached a four-point principle consensus on improving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ith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entering a period of slow improvement. Since 2017,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continued to show its will to improv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oncrete actions, making such relationship warm up again. Last May, Premier Li Keqiang paid an official visit to Japan, bringing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 back on the normal development track. On the new historic starting point, a new basis and driving force have been obtained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engage in practical cooperation. Nevertheless,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lacks political mutual trust, while the US-Japan alliance will continue to influenc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the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in a third market may also be obstructed by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and customs of the two countries.

- 60 Reflections on Re-positioning the SCO in China's Peripheral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by Xu Tao, Research Fellow of CICIR and Guest Researcher of CPD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peripheral diplomacy has been a diplomatic focus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aiming at creating a benign external environment. During the 17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SCO has expanded its realm of work gradually from resolving the military and security issues at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neighboring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in the wake of the Cold War to cooperation over issues related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economic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ulcrum for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Eurasia. At the Astana summit held in June of 2017, the SCO completed its first admission of new members in history. The admiss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into the SCO has greatly enriched and diversified the big family, while putting the organization in the face of more complicated issues of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 building.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has raised demands with more sense of the time for China's diplomacy to create a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realizing China's comprehensive rejuvenation,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ep focused on peripheral diplomacy, and forge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neven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at has put the world in a period of great development, great transformation and great adjustment. In that sense, the SCO remains an irreplaceable fulcrum for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
- 75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War Wag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gainst China and China's Counter Measures**, by Quan Yi, Permanent Member of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and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for Asia-Pacific Economic Studies,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ging an economic war against China follows not only the economic logic that the US wants to resolve the long existing economic and trade imbalance with

China, but also the non-economic logic that China's rapid rise has upset the power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made both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ublic frightened. Faced with the unilateral act of the US, China should confront the US in a rational and disciplined way, strive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rough consult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China Threat" hyped up by the US, China should maintain its strategic resolution, stay calm, deepen its reforms and opening up, and does its own things well;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 mutu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US to reduce strategic misjudgment, preserve the pattern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keep the situation from sliding to an all-out cold war.

- 89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Central Asia and Some Thoughts on Further Promoting Its Development**, by Chen Chang, Doctoral Student from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Chu Shulong, Professor from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d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development provided by China to the world, featuring a new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covering about one third of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the world spreading afar from China's periphery. Central Asia is at the heart of Eurasia, one of the regions directly adjacent to China, and also the hub of the land routes on the landmass of Eurasia and where different cultures meet. Moreover, Central Asia is one of the major regions where the "Belt and Road" passes; a "major region" boarding on China together with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where there are the most cooperation projects with the greatest momentum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framework. Therefore, it calls China and countries concerned to make joint and sustainable effor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strive for more, bigger and more outstanding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outcomes.

- 102 On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ROK's Strategic Response**, by Lyu Chunyan,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tudent Supervisor from Luoyang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PLA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ow the ROK would respond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deepening the bilater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by China and the ROK. Although there are diversified cognitions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in the ROK, the positive attitude prevails. The ROK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mainly through joining relevant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synergizing it with its ow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deepen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a hope to realize its strategic goals of promoting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stabiliz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situation and expanding its international spac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and the ROK interact in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on multiple levels, such as geo-politics and regional economy.

- 116 The Adjustment of US Space Deterrence Strategy and Its Impact**, by Gao Yangyuxi, Doctoral Student from Luoyang School, PLA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Since 2009, the US has begun to adjust its space deterrence strategy in response to the growing perplexity of the space environment, so as to increase its denial deterrence in the space through strengthening its capacity in space resilience, space system defens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pace. The relative declining of the US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space, its reliance on the space making its space assets vulnerable, and the difficulty to apply retaliatory deterrence in the space compris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US to make adjustment to its space deterrence strategy. However, space deterrence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deterrence in strength, resolution and message passing, as the space is characterized by unbalanced vulnerability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difficulty to trace the attacker, and easily triggering off confrontation in other areas and escalation of war. Moreover,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space deterrence to be effective in the absence of clear international rules governing the space. Therefore, the US space deterrence strategy could do nothing but intensifying the arms race in the space, giving rise to strategic misjudgment, and compressing the space of China’s space activities, which in the end would damage the peace in the space.

#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y Yuan Zheng*

Premier Li Keqiang paid a visit to Japan recently, the first visit made by a Chinese premier to Japan in 8 years, which indicates the gradual improving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At the time whe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returned to normal, this paper intends to elaborate on the US factor i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 **I.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The alliance system is the “wing of hegemony” of the US, and the major pillar of the American power.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US has been trying to enhance its multilateral alliance system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 give a bigger role to the off-shore balancer: in the past, there were bilateral alliances like the US-Japan, the US-ROK and the US-Australia alliances, and now the US is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forge multilateral alliances like the US-Japan-ROK, the US-Japan-Australia or the US-Japan-India-Australia alliances.

The US-Japan allian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lliances of the US, which came into existence during the Cold War, mainly intended to confront the threats from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wake of the Cold War, as its chief rival had gone collapsed, the US-Japan alliance was once in a state of “drifting”, but soon found a new target.



Although going through twists and turns,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on the whole been steadily strengthened. In fact,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relatively simple military pact in the past to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nstitution now. During the Clinton, Bush and Obama administrations, the US-Japan alliance experienced three adjustments, with the US-Japan security system expanding from “purely defensive defense” to “responding to peripheral emergencies” and further to “facing global challenges”, and the Japanese Self-Defense Forces extending their missions overseas, which, as a matter of fact, has broken through the limits of its Pacifist Constitution. Till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trengthen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had become the priority among the priorities in the U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Especially after Abe came once again into power, the US and Japan stepped up the pace of their cooperation. The New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Guideline issued in 2015 has further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ir cooperation, demanding the alliance to realize “seamless, mighty, flexible and efficient” coordination and response either in peace or at war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responding to the rise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adjustment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as the US and Japan share common needs to contain Chin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faced with the continuous rising of China and the need to maintain its dominan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the US has kept strengthening the alliance through various means, and even gone so far as to “let Japan out of the cage”, give consent to and encourage Japan’s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and permit Japan to send its self-defense force overseas, in order to make up the “short slabs” long existing in the alliance and make the alliance more efficient and deterrent. Meanwhile, Japan has taken the alliance as a springboard to seek for the support from the US in its bid to become a “normal state” and realize its ambition to become a “major power”, by trying to revise its Pacifist Constitution and raise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so as to reach the goal of self-defense.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is bound to affect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bring effects that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on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China.

## **II. The US-Japa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n Indo-Pacific Strategy**

Since taking office, Trump has definitely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attaching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India.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propos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not something new. As a matter of fact, since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the US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ts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India's unique position in geopolitics. During the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US-India relationship was getting strengthened. In the later time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US-India relationship was rather hot. The informal US-Japan-India-Australia meeting held last November at Da Nang in Vietnam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 countries to forge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mong them.

From the earlier concept of "Indo-Pacific" to the proposal of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Japan has been an active builder and promoter.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Japan proposed the policy much earlier and has remained more active. In fact, some of the concepts proposed by Japan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reason why Japan has so actively promote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is not very complicated: first,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its lifeline on the sea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the Indian Ocean and to the Western Pacific; second, to support its maritime strategy of going to high seas militarily as a "normal state"; third, to join other countries in containing the rise of China; and fourth, to hedge against China'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So to speak, Japan's active promoting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is connected with its own strategic objectives, such as responding to the change of geostrategic structure, containing the rise of China as an emerging major power, and achieving self-reliance in defense.

There is a tendency that the US and Japan are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on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In addition to security cooperation, Japan is presently trying to mak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s part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rump is pursuing an "America First" policy and focusing most of his energy on domestic development, Japan

hopes to undertake more responsibilities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mong the four nations. It is likely that the US will play a leadership role in the future, while Japan will contribute both money and manpower with an intention to mak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mong the four countries more solid and bigger as well as keep pushing it forward.

### **III. The Attitude of Trump Administration on the US-Japan Alliance**

When Trump came into power, Japan was given a sigh of relief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of the US still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alliance system and underlines the role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Whether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r the U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they have all emphasized that the US alliance and partnership systems are still pillars of American global security.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ointed out, the U.S. allies are critical to responding to mutual threats, such as North Korea, and preserving the mutual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e report also made it clear, “we welcome and support the strong leadership role of our critical ally, Japan.”

However, Trump coming into power has brought quite a number of uncertainties of American attitude to its allies. The “America First” policy pursued by Trump demands its allies including Japan and the ROK bear more of the costs for their defense. The U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pointed o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tressed America’s alliance is based on free will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the US will take its responsibilities, while wishing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to fairly sh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ciprocal collective security. Trump once expressed openly, if Japan and the ROK could not undertake mor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ir self-defense, the US would consider pulling out its troops from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made Japan much worried and forced Prime Minister Abe rushing to Washington D.C., as soon as Trump getting into office.

On trade issues, despite Japan’s opposition, Trump declared the US withdrawal from the TPP soon after coming to power, which made Japan feel much frustrated. There is also the issue of trade deficits, over which Trump put

pressures not only on China, but also on Japan. Trade frictions have caused great concerns in Japan: first, there is the trade friction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 Reducing trade deficit was one of the major campaign promises made by Trump.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US trade deficit toward Japan in 2017 was US\$ 68.85 billion, ranking Japan the third largest trade surplus country to the US. Not long ago, when Abe paid a visit to the US,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agreed to start a new round of consultation for a “free, fair and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Nonetheless, Trump was not interested in returning to the TPP, but was more willing to start negotiations on bilateral trade to reduce the “huge trade deficit” of the US toward Japan. The hopeful Abe failed in the end to talk Trump to “be lenient to” Japan on the issue of high tariffs on steel and aluminum products. Second, the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ave also made Japan much concerned. After all, China is the biggest trade partner of Japan,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twenty thousand Japanese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China. The China-Japan bilateral trade once peaked at more than US\$ 340 billion, and remained at US\$ 270 billion annually in the last two years. Once a trade war erup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exports of the Japanese enterprises in China to the US would be greatly affected, as their products are marked “Made in China” and on the bill for the trade surplus of China to the US.

On the one hand, China is getting more powerful with each passing day, with its influence rising in East Asia;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self-concerned and ignores the appeals of its allies. Such a circumstance has forced the Abe administration to make some adjustment to its China policy, which is the deep-rooted reason that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has been improving since 2017.

#### **IV.The US Factor i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s the US-Japan alliance is strengthening, the US factor has become an external factor that affects or even determines to some extent Japan’s China policy. Currently, there are four major issues affecting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which the US factor more or less plays a role.

First, there is the historical issue. China upholds the idea of “past experience, if not forgotten, is a guide for the future”, while Japan is inconsistent in its words and afraid of facing the history of aggression. On the historical issue, the attitude of the US is rather dubious. On the one hand, Japan has remained vague on the historical issue, which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US not making a thorough settlement with Japan. Out of the needs to wage a Cold War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US did not make a thorough settlement of Japan’s aggres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cannot tolerate Japan going too far on the issues of Japan’s aggression and “comfort women” (or forced prostitution). The general attitude of the US is trying to minimize the US-Japan war, and stressing on reconciliation. However, the US would not tolerate Japan to deny its history of aggression in an all-round way, and at the same time set a bottom line for Japan’s military development, namely not tolerating Japan to possess nuclear weapons, while providing nuclear umbrella for Japan. Meanwhile, the US is also trying to increase its influence and control over Japan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to prevent Japan from running loose. From this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have some intersection of interests on certain issues with regard to Japan.

Second, there is the issue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 ownership of the Diaoyu Islands is an issue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ith the two countries confronting each other in recent years over the issue, which tends to intensify. Although the US has never recognized the Diaoyu Islands belonging to Japan, and the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Bureau even issued a report to affirm that the Diaoyu Islands belonged to China in history, the US administration expressed on different occasions “the Diaoyu Islands and its affiliated islands are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apan, applicable to Article V of the Japan-US Security Treaty, and the US opposes any unilateral action that tries to undermine (Japan’s) administration over the Diaoyu Islands and its affiliated islands.” Moreover, the US and Japan have increased military deployment toward the Diaoyu Islands. On the issue of Taiwan, the US would respond to the changes of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together with Japan, and

insist on developing relations with Taiwan, which is in fact no less than setting obstacles to the great cause of China's reunification.

Third, there is the issue of geo-security. For some time, Japan was contending for dominance with China in East Asia, with Japan hyping up the so-called "China Threat Theory". One of its purposes is to find an excuse for increasing its military capacity and lifting bans on its self-defense forces. In strategic layout, Japan has also placed its focus of defense on China. The US and Japan have common interests in jointly containing the rise of China. The US is interested in giving Japan a role to hamper China, while Japan intends to realize its own security appeal by relying on the US-Japan alliance. The US has stationed troops in Japan, which has made the US intention to strengthen its forward military presence come true. It can be said,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to some extent, compressed the strategic space for China's rise.

Fourth, there is the issue of strategic mutual trust. When the three abovementioned issues got intertwined, it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China and Japan to establish strategic mutual trust. The existence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incorporated Japan into the track of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y, while Japan is also interested in containing China's rise and realizing its "normal state" statu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US. As a result,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already beset with the frictions brought about by historical and territorial dispute issues, has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In sum, it is very hard for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o get substantially improved in a short-run. Therefore, we cannot pin hopes too high on only one top-level visit. Nonetheless, China and Japan are close neighbors after all, so that a stable and improved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conducive not only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f the two countries, but also to peace and stability of East Asia, and in line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author is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American Diplomacy,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ASS. This article was received on May 15, 2018.)